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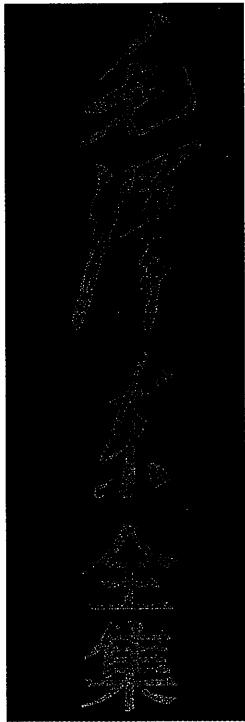
毛
泽
东
全
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3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策 编
任：流 星
划：树 旺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莘 杨健桉 听 杨 泽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胡禹颐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马豪帅
孟宪纲 张清斌 李美艳 赵道洽
王中阳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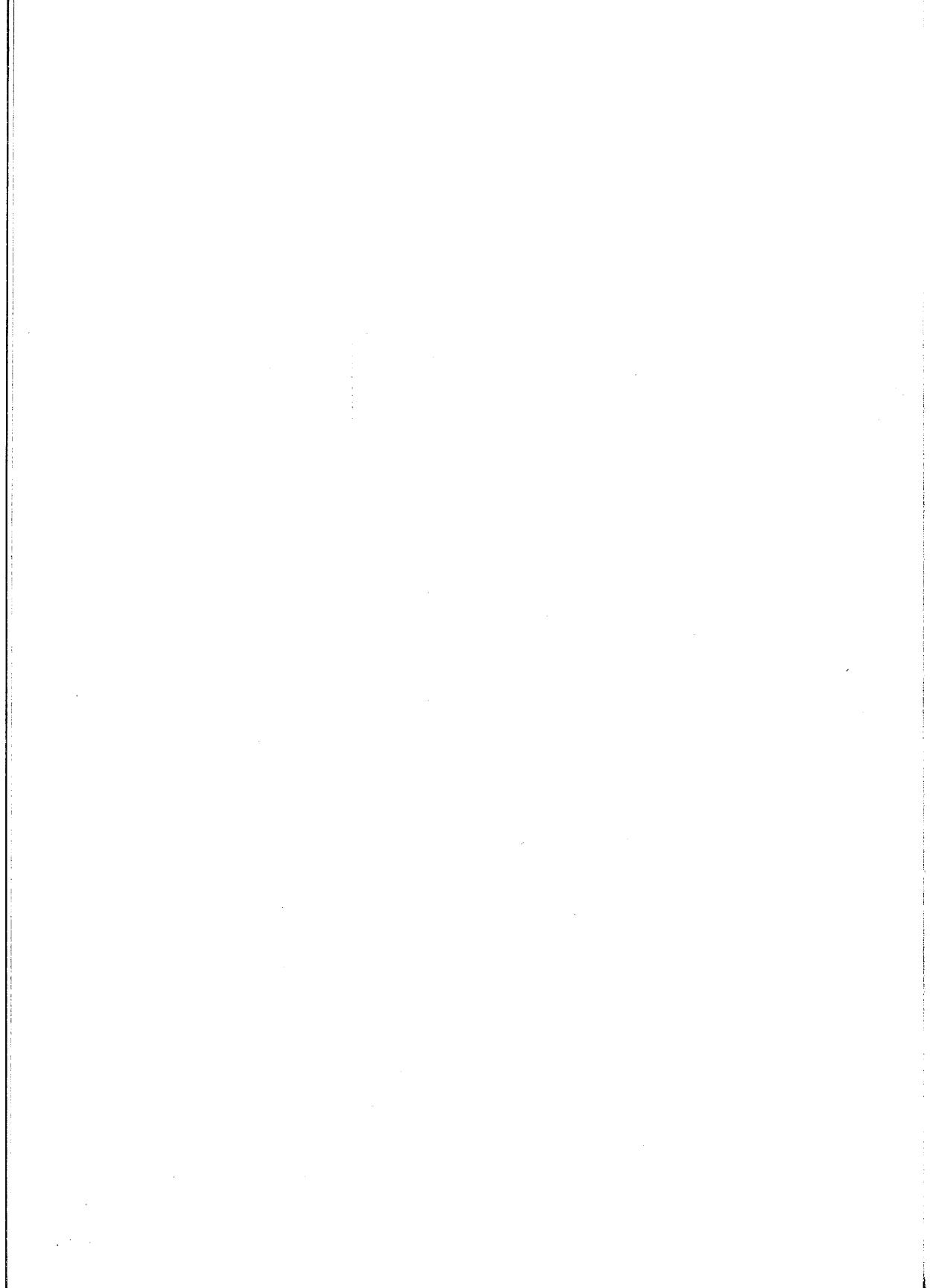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长期艰苦奋斗创造冀热察根据地	1
(1938年10月15日)	
致周恩来电	3
(1938年10月16日)	
为延安《山脉文学》杂志题写刊头	4
(1938年10月27日)	
对鹿钟麟应注意的问题	6
(1938年10月27日)	
给柳夷的信	7
(1938年10月30日)	
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	9
(1938年10月)	
为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题名	11
(1938年10月)	
为杨兰史题词	12
(1938年10月)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13
(1938年11月5日)	
战争和战略问题	19
(1938年11月6日)	

张云逸可率两三个营过江活动	36
(1938年11月10日)	
在抗大女生大队成立典礼上的讲话	37
(1938年11月13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	38
(1938年11月24日)	
在大青山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39
(1938年11月24日)	
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	42
(1938年11月24日)	
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陈光旅主力去山东淮北为宜	43
(1938年11月25日)	
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	45
(1938年11月25日)	
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题词	49
(1938年11月)	
关于坚决拒绝国民党派高桂滋部来陕甘宁边区的指示	51
(1938年12月1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	52
(1938年12月1日)	
给邓宝珊的信	53
(1938年12月5日)	
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报告	54
(1938年12月8日)	
关于对待土匪的政策问题的指示	55
(1938年12月9日)	

在抗大干部晚会上的讲话	56
(1938年12月12日)	
在抗大的讲话	57
(1938年12月13日)	
在延安党政军及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的讲话	60
(1938年12月13日)	
致朱德等电	62
(1938年12月13日)	
给杨令德的信	63
(1938年12月14日)	
政治上的持久战	65
(1938年12月15日)	
复张经武等电	66
(1938年12月27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67
(1938年12月28日)	
致彭雪枫电	68
(1938年12月30日)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	69
(1938年12月30日)	
为抗大《检查工作特刊》题词	70
(1938年12月)	
为宁都起义部分同志合影题词	71
(1938年12月)	
谈抗大民主问题(摘录)	73
(1938年)	

和警卫营二连战士的谈话	75
(1938年)	
为抗大学员王承骏题词	76
(1938年)	
为艾生题词	79
(1938年)	
为董柏成题词	81
(1938年)	
励志联	83
(1938年)	
在延安为井冈山时期的的部分同志合影题字	85
(1938年)	
为张声良题词	87
(1938年)	
为延安《中国文化》题词	88
(1938年)	
为抗大题词	90
(1938年)	
为于江题词	92
(1938年)	
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	93
(1938年)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145
(1939年1月2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150
(1939年1月5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151
(1939年1月12日)	
致周恩来等电	152
(1939年1月13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题词	153
(1939年1月15日)	
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	155
(1939年1月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	158
(1939年1月18日)	
抗战与外援的关系	159
(1939年1月20日)	
给鲁迅艺术学院文学团体“路社”的信	161
(1939年1月21日)	
给周扬的信	162
(1939年1月22日)	
给杨令德的信	163
(1939年1月22日)	
在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上的讲话	164
(1939年1月25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165
(1939年1月26日)	
致周子昆、赖传珠、袁国平电	166
(1939年1月27日)	
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的讲话	167
(1939年1月27日)	

致周恩来等电	168
(1939年1月27日)	
给炮兵团全体官兵的信	169
(1939年1月28日)	
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	170
(1939年1月28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讲话	178
(1939年1月至2月)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182
(1939年2月1日)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	183
(1939年2月1日)	
为杨海泉题词	186
(1939年2月2日)	
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88
(1939年2月2日)	
反对投降主义	190
(1939年2月5日)	
又团结，又斗争	192
(1939年2月5日)	
为《新中华报》题词	195
(1939年2月7日)	
为《新中华报》题词	197
(1939年2月7日)	
在延安职工纪念二七罢工十六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9
(1939年2月7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00
(1939年2月8日)	
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	201
(1939年2月10日)	
为冯福新题词	203
(1939年2月11日)	
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电	205
(1939年2月12日)	
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	206
(1939年2月16日)	
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	209
(1939年2月18日)	
各级政治机关主要工作者必须是党员	210
(1939年2月19日)	
致各部队电	211
(1939年2月19日)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	212
(1939年2月20日、22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18
(1939年2月中旬)	
在延安召开的第一次技术人员晚会上的讲话	219
(1939年2月25日)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220
(1939年2月28日)	
和美国记者罗伯特·马丁的谈话	222
(1939年2月)	

和鲁艺美术系两个申请入党教师的谈话	223
(1939年2月)	
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	224
(1939年3月1日)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序	226
(1939年3月2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28
(1939年3月4日)	
改进抗大分校教育计划的意见	229
(1939年3月6日)	
妇女们团结起来	232
(1939年3月8日)	
在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上的讲话	238
(1939年3月12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的谈话	239
(1939年3月15日)	
对新四军参谋会议的意见	242
(1939年3月16日)	
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	244
(1939年3月18日)	
给聂荣臻的信	245
(1939年3月18日)	
在“三一八”纪念晚会上的演讲	246
(1939年3月18日)	
巩固着重于华北发展着重于鲁苏皖豫鄂	247
(1939年3月19日)	

为梁毅题词	249
(1939年3月23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50
(1939年3月29日)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	251
(1939年4月1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52
(1939年4月5日)	
致朱德、彭德怀电	253
(1939年4月8日)	
在抗大检查工作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254
(1939年4月8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55
(1939年4月12日)	
为陈醒民题词	256
(1939年4月18日)	
继续开办训练班	258
(1939年4月19日)	
为消灭文盲运动题词	259
(1939年4月19日)	
为抗大题词	261
(1939年4月19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63
(1939年4月19日)	
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264
(1939年4月24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65
(1939年4月26日)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266
(1939年4月29日)	
在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67
(1939年4月29日)	
为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题词	268
(1939年4月)	
为吕炎同志题词	270
(1939年4月)	
为陈彪雄题词	272
(1939年4月)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	274
(1939年5月1日)	
五四运动	283
(1939年5月1日)	
青年运动的方向	286
(1939年5月4日)	
对晋西北工作和河北磨擦问题的指示	295
(1939年5月4日)	
和萧三的谈话	296
(1939年5月5日)	
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的讲话	303
(1939年5月5日)	
为鲁迅艺术学院建院一周年纪念大会题词	304
(1939年5月10日)	

给潘梓年的信	305
(1939年5月11日)	
关于阎锡山问题的讲话	306
(1939年5月11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308
(1939年5月17日)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09
(1939年5月20日)	
抗大三周年纪念	319
(1939年5月26日)	
永久奋斗	325
(1939年5月30日)	
读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的批注	331
(1938年12月以后至1939年5月以前)	
为缪敏题词	336
(1939年春)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批注	338
(1939年5月以后)	
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389
(1939年6月1日)	
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	391
(1939年6月1日)	
为《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	394
(1939年6月1日)	
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名	396
(1939年6月1日)	

在延安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397
(1939年6月6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398
(1939年6月7日)	
反投降提纲	399
(1939年6月)	
对八路军参谋会议的意见	439
(1939年6月12日)	
给萧三的信	442
(1939年6月17日)	
在鲁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444
(1939年6月21日)	
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	445
(1939年6月24日)	
反对投降活动	446
(1939年6月30日)	
为陈黄英题词	451
(1939年6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53
(1939年7月3日)	
关于反“扫荡”等问题给李井泉等的指示	454
(1939年7月3日)	
在华北联合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55
(1939年7月7日)	
为戴镜元题词	456
(1939年7月7日)	

坚持国共长期合作	457
(1939年7月9日)	
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464
(1939年7月12日)	
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65
(1939年7月20日)	
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	466
(1939年7月25日)	
就学习六届六中全会文件给林彪校长的信	468
(1939年7月29日)	
为蒋灿题词	469
(1939年7月)	
四言诗·戏改江淹《别赋》	471
(1939年7月)	
挽郭沫若父郭朝沛先生联	472
(1939年7月)	
为中国女子大学成立题词	473
(1939年7月)	
必须制裁反动派	474
(1939年8月1日)	
挽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联	479
(1939年8月1日)	
代中共中央撰挽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联	480
(1939年8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81
(1939年8月2日)	

致八路军总部和一二〇师电	482
(1939年8月7日)	
在陕甘宁边区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83
(1939年8月13日)	
致朱德等电	484
(1939年8月21日)	
为谢子长烈士题词及碑文	485
(1939年8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87
(1939年8月24日)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489
(1939年8月26日)	
欢迎尼赫鲁先生来延安	491
(1939年8月27日)	
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492
(1939年8月29日)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493
(1939年9月1日)	
为延安新华书店题名	500
(1939年9月1日)	
给向隅的信	501
(1939年9月5日)	
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	502
(1939年9月7日)	

长期艰苦奋斗创造冀热察根据地^[1]

(1938年10月15日)

冀热区委同志，并告宋、邓^[2]同志：

甲、你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准备持久，以最大决心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为着上述任务的完成而奋斗到底。

乙、巩固部队，用一切有效办法提高部队持久抗战胜利信心，提高政治自觉的纪律，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建立救亡室工作，并加强其领导，吸收连队全体战斗员参加，帮助管理教育，检查纪律，洗刷坏分子等工作。

丙、大量地发展党，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连队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为领导连队斗争的核心。一切忽视党的发展与工作，是目前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最有害的。

丁、在干部缺乏的目前情况下，可以三分之一以上的新部队转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给中共冀热边区委的电报。

[2] 宋、邓，指宋时轮、邓华，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归晋察冀军区指挥）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移到东西斋^[1]、蔚县地域，分归杨成武王震两部^[2]负责帮助整理或改编之。在转移时由聂^[3]指定杨王两部负责掩护，宋邓派队掩护护送。

戊、宋邓两部及冀东所余留之地方军，统归宋邓指挥统率。按照上述任务及整理原则，坚持冀热察边长期的艰苦奋斗，创造根据地。营团两级干部可派数个，连级可派十个到你处工作。

毛 朱 彭 王 胡

十五日

[1] 东西斋，指东斋堂和西斋堂，在今北京市门头沟区境内。

[2] 杨成武、王震两部，指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和王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

[3]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致周恩来电^[1]

(1938年10月16日)

为着直接有力地配合支持武汉以及武汉失守后滞阻敌人继续前进，以八路军一部进至鄂豫皖地区活动为有利。在朱德到武汉见蒋介石之前，请向陈诚^[2]、白崇禧透露此意，让蒋知道。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武汉卫戍总司令。

为延安《山脉文学》杂志题写刊头^[1]

(1938年10月27日)

山脉文学

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

名称似以“山头文学”为好。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七日

[1] 1938年10月下旬成立的群众性的“山脉文学社”，提出“十大文艺活动方式”，筹备出版一个以发表青年文艺爱好者诗文习作为主的《山脉文学》不定期刊。奚定怀给毛泽东写信，向他报告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抗战文艺活动的打算，并请他为《山脉文学》题写刊头。毛泽东为其题写了刊头。后来，由于印刷条件未获解决，《山脉文学》未能出版，而是改出了油印的《山脉诗歌》。这样，便出现了“山脉诗歌社”。而山脉文学社的活动则持续到1940年9月。



毛泽东给山脉文学社的复信和为《山脉文学》题写的刊头。

对鹿钟麟应注意的问题^[1]

(1938年10月27日)

对鹿钟麟应注意以下几点：坚持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能取消；极力向鹿钟麟说明，目前形势严重，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实行肃清华北的计划，各方只有依靠已取得的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困难的局面，否则只有失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冀南军区，应与鹿钟麟建立密切关系，向其征求意见，并表示凡有利于抗战的工作，一定要努力完成。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等致朱瑞、徐向前、宋任穷电的主要内容。

给柳夷^[1]的信

(1938年10月30日)

柳夷同志：

还是八月间的你的信，今天才复你，不知对于你的问题还有帮助否？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我因忙，积累至今才复，对你不起！

你的意思是恳切的，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此事解决办法，可持此信与三大队负责同志商酌，你的原信也随同交给他们看，要求他们最后考虑你的问题。如尚不能解决，可持此信到抗大政治部张主任^[2]处。你所指出的几个缺点是有理由的，你的信可送给政治部参考。最后告你的，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能进去。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卅日

[1] 柳夷（1913—1996），浙江慈溪人。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第一支队政治教育干事。

[2] 指张际春（1900—1968），湖南宜章人。当时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高英

四處「問」的問題，多
半是「假作」，20%的事件是「真作」，
有帮助嗎？不知道也說三長兩短。
我們把「假作」歸為「真作」，那會怎樣
？那個立場應該動搖，又不會使
公眾大驚小怪。所以這條新聞要取勝於上
述資料，得：(一)增加些根據。(二)用個意
思，使人以為「真作」，而你說「不
是」，那就更妙了。(三)方法不外乎是
說「我聽來的」，但說「我所見到的」

太陽與太陽系的，他們有他們的風
之後他們有，專主他們彼此的運動
問題。因為他們快，所以他們的運動
大概是都無往來。他們的運動
整個都是在那裡的，所以他們的運動
就是那樣的。那麼，他們，則
子孫本源是從太陽那裏來的，即
然。以後，可以

卷之三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毛泽东致柳夷信的手稿。

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

(1938年10月)

抗大是八路军的干部学校，它的精神，它的作风，都是八路军的。学习八路军的精神与作风，是抗大同志们应该注意的。

抗大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军校，他们精神，譬如
风，如火如荼。如雨，如
雷，如电。如山，如海。
希望你们的精神，永
远如此，永远抗大之们
这样前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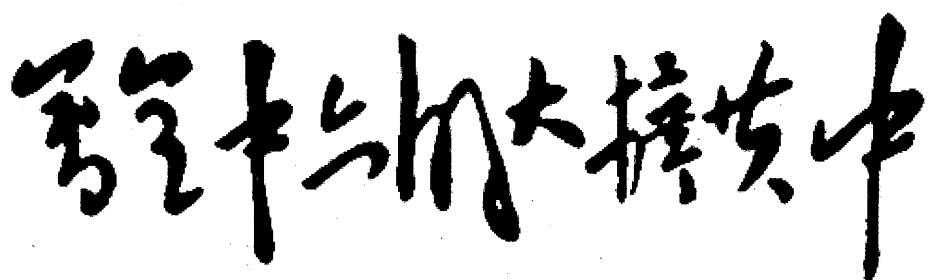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

为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题名

(1938年10月)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

A large-scale calligraphic work in cursive script, featuring bold and expressive strokes. The characters are fluid and dynamic, capturing the essence of Mao Zedong's handwriting style.

毛泽东为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题写的会名。

为杨兰史题词

(1938年10月)

哀悼我们教育战线上的勇士。杨兰史同志永远不死。

毛泽东书

哀悼我們教育戰線
上的勇士楊蘭史同志永遠不死
毛澤東

毛泽东为杨兰史的题词。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

(1938年11月5日)

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结论是在1938年11月5日和6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在5日讲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当时毛泽东同陈绍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突出问题之一。这在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关于这种意见分歧，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曾作了以下简要的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同时也应赞助友党友军的巩固和扩大；人民要求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给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于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厂主改良待遇，同时积极作工以利抗日；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团结对外。这些都是互助的原则和方针，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消极的片面的方针。互让也是如此。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1]，正是这种情形。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2]，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3]，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1] 参见《孟子·离娄下》。原文是：“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2] 参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

[3] “劳资合作论”，是第二国际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反动理论。

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

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战争和战略问题^[1]

(1938年11月6日)

一 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结论是在1938年11月5日和6日作的，这一部分是6日讲的。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文中，已经解决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问题。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此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也采取了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为着克服党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而使全党更明确地了解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首要地位，并动员全党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又从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方面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同时说明我们的军事工作的发展和战略方针的具体变化的过程，从而取得了全党在领导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

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1]。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

[1] 参见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9、163~169、297~303页）和《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5页）。列宁这些著作是在1914年至1915年间针对着当时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写的。并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六章第三节《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192页）。

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即《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手稿。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没有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广东战争^[1]和北伐战争；或者是联合

[1] 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革命军讨伐广东境内军阀买办势力的革命战争。1924年10月，革命军歼灭了勾结英帝国主义在广州发动叛乱的买办豪绅武装——“商团”。1925年2月至3月，革命军从广州东征，打败了盘据东江的军阀陈炯明部队的主力。6月，回师消灭了盘据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部队。10月至11月，举行第二次东征，最后消灭了陈炯明的军队。同时，革命军分兵南征，讨伐盘据广东西南部的军阀邓本殷。在上述这些战役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都英勇地站在战斗的前列，并且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热烈地支援革命军。这些战役的胜利造成了当时广东统一的局面，为北伐战争建立了后方基地。

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同样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的时候，则是联合国内一切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阶级和阶层，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例如现在的抗日战争。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例如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军后方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北洋军阀统治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又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再如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后方的和敌军占领地的一切组织和斗争，也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

[1] 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国内战争，或者是民族战争；或者是共产党单独进行的战争，或者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战争。当然，这些区别是重要的。这些表示了战争主体有广狭的区别（工农联合，或工农资产阶级联合），战争对象有内外的区别（反对国内敌人，或反对国外敌人；国内敌人又分北洋军阀或国民党），表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一论断，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认识这一点，对于今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益的。抗日战争中全民武装反抗的具体事实，将教育全党进一步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我们这次会议又决定党的主要

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更给了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对于有些党员愿作党的组织工作，愿作民众运动的工作，而不愿研究战争和参加战争，有些学校没有注意鼓励学生上前线，等等现象，还是一剂对症的良药。大部分中国领土内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的，没有也不能有单独的孤立的党的工作或民众运动。一部分距离战区较远的后方（如云南、贵州、四川）和一部分敌人控制的地区（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二 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

我们来看一看国民党的历史，看一看它是如何地注意于战争，是有益处的。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1]。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2]，直至辛亥革

[1]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了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小团体，叫做兴中会。1895年清朝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以后，孙中山依靠兴中会联络民间秘密团体会党的力量，在广东组织过两次反对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即1895年的广州之役和1900年的惠州之役。

[2] 1905年，兴中会同其他的反清团体华兴会等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采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纲。在同盟会的领导与影响下，革命党人联合会党、新军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主要的是：1906年的萍乡浏阳醴陵之役，1907年的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钦（州）廉（州）之役和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之役，1908年钦（州）廉（州）上思之役和云南河口之役，1910年的广州之役，1911年的广州之役和武昌起义。

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1]。后来的海军南下^[2]，桂林北伐^[3]和创设黄埔^[4]，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1]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同当时北洋军阀袁世凯的统治实行妥协。1913年，袁世凯派军队南下，企图消灭在江西、安徽、广东等省的国民党势力，孙中山曾经发动武装的反抗，但是不久就失败了。1914年，孙中山鉴于对袁世凯妥协的失策，在日本东京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以表示同当时的国民党相区别。中华革命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积极开展武装的反袁运动，主要的有：1914年湖南郴县、桂阳等地的起义，广东惠州、顺德等地的起义和1915年上海肇和军舰的起义。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反袁势力在云南发动讨袁战争。孙中山是当时武装反袁的积极鼓吹者和活动者，他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又在广东、山东等地发动了反袁的武装起义。

[2] 1917年孙中山和在他影响下的海军由上海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联合当时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西南军阀，组织反段的军政府。

[3] 1921年，孙中山在广西桂林进行北伐的准备工作。1922年移驻广东韶关，正式出师北伐。由于部下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举行叛变，这次北伐没有取得成果。

[4]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通称黄埔军校。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以及其他同志，曾经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谭延闿^[1]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2]，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段祺瑞^[3]、蒋介石（附蒋的是进步党之一部转变而成的政学系^[4]）就成了它的靠山。

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5]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

[1] 谭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清末翰林。原主张君主立宪，后附和辛亥革命。他在1912年参加国民党的阵营，反映了湖南地方势力同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在1911年至1920年期间，他先后当过湖南省的都督，省长兼署督军，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等职。

[2] 进步党是1913年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党，当时它在政治上依附当权的袁世凯，曾经组织过内阁。1916年，进步党演变为“研究系”，又依附当权的段祺瑞，在1917年参加了段祺瑞组织的内阁。

[3]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他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在袁世凯死后曾经几度把持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

[4] 政学系原是对1916年由一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及进步党分子组成的官僚政客集团——政学会的通称。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它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该系一部分成员先后投靠蒋介石，帮助蒋介石建立和维持反革命统治，又成为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一，其主要成员有黄郛、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

[5] 青年党，即“国家主义派”的中国青年党。

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三 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

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1]。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

[1] 这里主要是指以共产党员叶挺为首的独立团，以贺龙为首的第二十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还只有苏联、中国、西班牙三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三个军队，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国的党都还没有军事经验，所以我们的军队和军事经验特别值得宝贵。

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四 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问题，值得给以研究。分为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来说。

国内战争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不能和外国军队一概而论，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同。因此，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

但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和国内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因为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上）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也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这是设想在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而说的。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这将是战略反攻阶段中的事业。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

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卢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

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可能发生的，一方面是轻敌倾向，又一方面是恐日病，这些在国民党中都是发生了的。国民党当它从国内战争的战场向民族战争的战场转变时，主要由于轻敌，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恐日病(以韩复榘、刘峙^[1]为代表)，而遭受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然而我们却相当顺利地执行了这个转变，不但未遭挫败，反而大大地胜利了。这是由于广大的干部适时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指导和灵活地观察情况而获得的，虽然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也是空前的。

至于由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第三个转变，则属于战争发展的将来，估计那时又将发生新的情况和新的困难，现在可以不去说它。

[1] 韩复榘，原来是长期统治山东的国民党军阀，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刘峙，蒋介石的嫡系，原来在河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御河北省境内平汉铁路沿线地区。这两人在日本侵略军进攻的时候都不战而逃。韩复榘于1938年1月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处死。

五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故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

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又一方面。

游击战争的可能，只要具备大国这个条件就存在的，因此古代也有游击战争。但是游击战争的坚持，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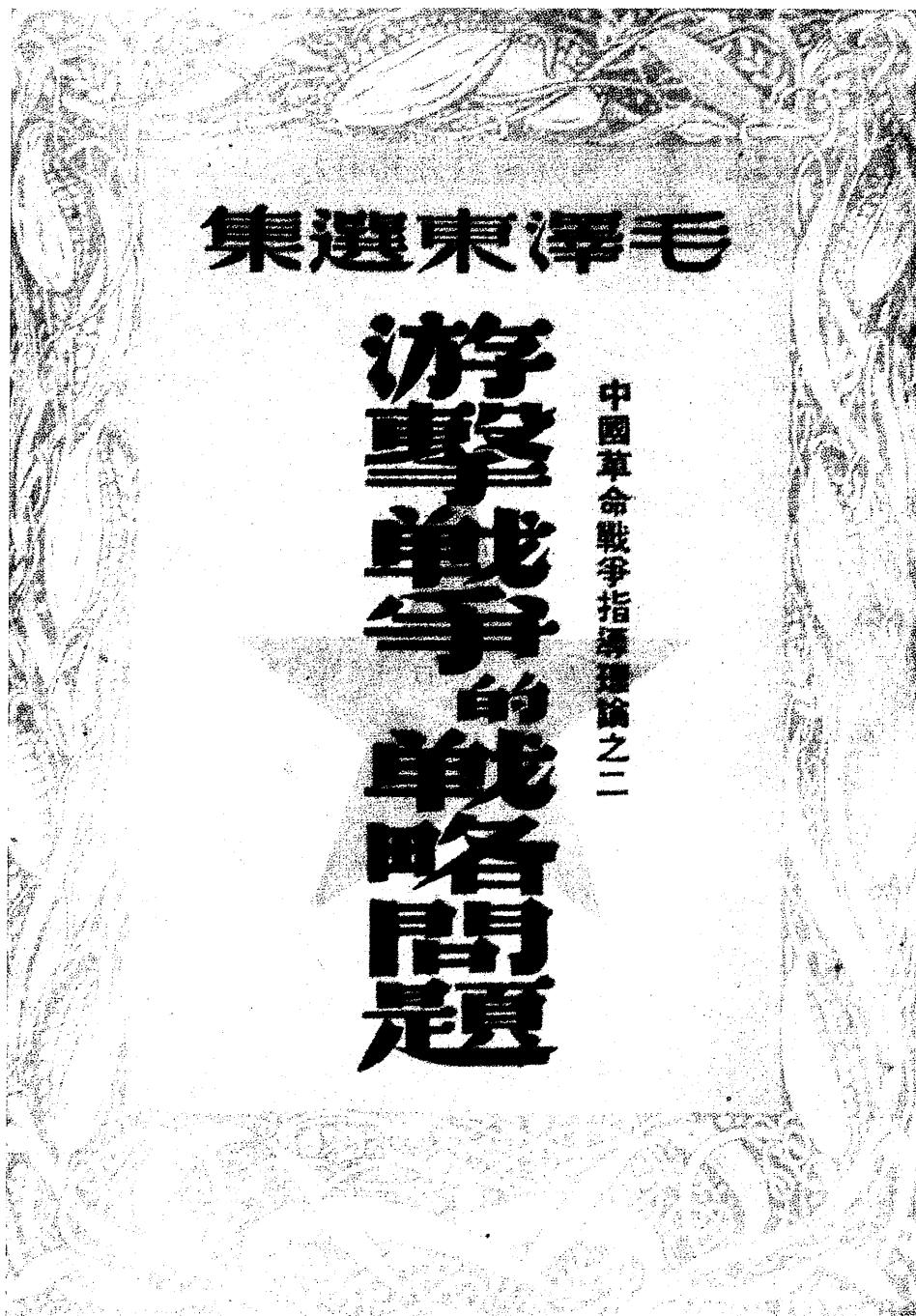
能出现。故古代的游击战争大都是失败的游击战争，只有现代有了共产党的大国，如像内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胜利的游击战争。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由此可以懂得，我们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重要和必要的了。综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项：（一）缩小敌军的占领地；（二）扩大我军的根据地；（三）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四）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五）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七）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八）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十四）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十五）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十六）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的领导干部；（十八）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

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六 注意研究军事问题

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战术的研究虽然不足，但十年来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们已有很多的成绩，已有很多根据中国条件而提出的新东西，缺点在于没有总结起来。战略问题和战争理论问题的研究，至今还只限于极少数人的工作。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为了全党和全国的需要，军事知识的通俗化，成为迫切的任务。所有这些，今后都应该注意，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必要的。



1948年1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张云逸可率两三个营过江活动^[1]

(1938年11月10日)

项，并转周、叶^[2]：

一、白崇禧^[3]已允新四军张云逸^[4]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

二、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二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三、四支队及八团队的经费以后归何处发给，如何转交他们，归何处指挥，与中原局^[5]关系如何。

以上均望电复。

毛 王 胡

十日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周、叶，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叶剑英。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4] 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5] 中共中央中原局于1938年11月9日组成，刘少奇为书记。

在抗大女生大队成立典礼上的讲话^[1]

(1938年11月13日)

妇女同胞所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尤甚，我们反对一切对于妇女的压迫，尤其是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妇女的侮辱。我们抗日，不仅为求得民族平等，而且要求得妇女的地位平等。只有中华民族解放，才能有妇女的解放。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女生大队（八大队）成立典礼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38年11月24日)

应用一切办法团结与巩固范筑先领导的抗日部队，并实际帮助鲁西北地区抗战。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杨尚昆、滕代远关于山东聊城地区抗日领导人范筑先牺牲一事致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徐向前、朱瑞电的主要内容。

在大青山坚持长期游击战争^[1]

(1938年11月24日)

周、甘转李井泉：

(一) 大青山^[2]北靠外蒙，敌正重视，察热^[3]游击战争尚未开展，又形孤立，欲在那里建立冀察晋型的根据地，在今天则不可能，但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完全可能，而且是中心任务。

(二) 故那里一切政策应以长期游击战争性质为出发点。

甲、组织伪军反正应避免过早不必要的零散爆发，惟须估计到反正情绪不可抑制时或已爆发以及军事上必要时，则毅然行之。但一般的工作，应适应长期性这一原则。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给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转大青山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李井泉的电报。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7月底第一二〇师以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李井泉率大青山支队由晋西北北进，9月到达大青山地区，开展绥远中部的抗日游击战争。

[2] 大青山，在内蒙古自治区土默川平原以北，属阴山山脉中段。

[3] 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1952年撤销。热，指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乙、反正前后应使其意识到物质条件的困难与斗争的艰苦性。反正后一般地应争取属于八路军指挥的名义，在斗争过程中改造或改编之，最好争取它靠近晋西北或晋察冀边区，但不勉强。为人作嫁，反增以后困难。

丙、对大股土匪或半土匪性质的自发抗日武装，应采取上层联络与影响推动和帮助它进步，勿造成对立以增加我们游击队和地方工作的困难。对零星土匪则可消灭之，仍须对之以礼貌，勿乱杀人。

丁、对于静漪^[1]之自卫军估计到与傅^[2]的关系，应采取上层联络以及帮助推动它进步，不采取分化瓦解的方针。

(三) 绥远^[3]问题，须处处照顾到与傅作义的统一战线，对绥远当地上层统一战线与对伪政权等策略，应不违背长期游击战争这一特点。

(四) 另一基本任务是：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传统的错误政策，我们做成模范来推动影响国民党，首先是傅作义的转变。

甲、估计蒙民的民族意识，蒙民对王公的信仰，对德王^[4]仍应采取争取的策略，继续执行要求德王回头抗日的口号。

乙、对蒙人要求收回汉人侵占的土地，应使汉人出相当代价立

[1] 于静漪，又名于存灏，当时任国民党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副总指挥。

[2]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北路前敌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4] 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白旗人，王公。1936年5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任伪蒙古军政府总裁。1937年10月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兼政务院长，1938年5月任主席。

约收买或作租佃纳租，地方政府应依具体情况分别公正处理，以团结蒙汉联合抗日为原则。

丙、尊重蒙民风俗习惯、宗教并发扬其文化，勿侵犯蒙民利益，特别是收买马匹。必须切实教育部队。

丁、吸收蒙人中知识分子，培养蒙民干部，做蒙民工作。

(五) 须向绥察边与铁路以南发展与工作，多繁殖地方游击队，培养地方干部与群众的领袖。

毛 王 杨 贺 关

迥 (二十四日)

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1]

(1938年11月24日)

1. 估计今后华北形势的进展，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2. 为完成以上任务，做如下决定：

甲、派程子华^[2]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子华任吕纵队^[3]政治委员，加强该部之正规化是目前中心任务。

乙、决定贺关率一部去冀中，争取扩大一二〇师。

3. 一二〇师一部到冀中可以推动、影响特别是当地部队正规化的过程，而冀中党应以极大力量帮助扩大一二〇师。具体计划由关到五台与聂彭依据实际情况商酌办理。

4. 贺关到冀中后，吕部则归其指挥，惟建制系统仍属聂区^[4]管辖。

毛 王

二十四日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和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晋察冀军区的电报。

[2] 程子华，原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

[3] 吕纵队，指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

[4] 聂区，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陈光旅主力 去山东淮北为宜^[1]

(1938年11月25日)

德怀同志：

我们考虑结果，以陈罗^[2]率师部及陈旅^[3]主力（两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晋西南地区暂留陈旅之补充团并集中各游击队编成一团交陈士榘^[4]指挥，尔后可从一二九师调一支队接防。陈罗开东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5]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6]东西、胶济南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给彭德怀的电报。

[2]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陈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

[4] 陈士榘，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参谋长。

[5] 老黄河，指国民党政府决黄入淮之前的黄河故道，即今经郑州、开封以北入山东，流向渤海的黄河河道。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水患阻止日军西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南沿贾鲁河入安徽颍河及西淝河，在正阳关一带注入淮河。当时对这一段河道通称新黄河。1947年花园口决口堵复，黄河复归故道。

[6]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北在内。尚昆小平^[1]认为可行，你意如何，盼告。

毛 王 滕

二十五日



1938年，毛泽东和刘伯承、滕代远在延安机场。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1]

(1938年11月25日)

朱、彭、聂，并转宋、邓：

我们对冀热察区工作有如下意见：

一、宋时轮、邓华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建立了抗日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二、估计冀热察区的军事政治环境，认为那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有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可能，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因此，决定成立第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同志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政工作。军政会须有地方党及地方军队的领导者参加，名单待萧克、彭真到晋察冀后由北方分局提出交中央批准。

三、萧克不日将由延安起程，经晋西北到晋察冀指挥机关，由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杨尚昆关于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的要点给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并告宋时轮、邓华的电报。

延安拨出一部干部并由贺龙、萧克、关向应负责成立之。

四、两支队目前应在平绥路南各择适当地点整理训练补充，主要工作于下：

甲、加强政治工作，鼓励士气，根据我们对宋、邓工作估计来检查工作，主要是检查经验教训。

乙、加紧干部教育，集中一部老战士办教导队，部队中的干部则开办流动训练班或临时集合训练。

丙、严密军政组织，整顿纪律，肃清游击习气。

丁、派出政工人员在附近地区进行补充扩大工作，收买武器特别是弹药。

戊、在休整期中，应避免无把握的不必要的战斗。敌如进攻，则利用山地在有利条件下打击之，如十分必要，可靠近晋察冀边区。

五、两支队须团结一致，靠拢时须集中指挥，建立集体领导，完成休整任务。

六、与冀东须保持联系，冀东地方干部如不能时，须立即派回一部工作。

毛 王 杨

二十五日



1938年冬，毛泽东和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李公朴交谈。

天高云淡此故南飛
萬里長城非好漢
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
山上飛來捷報
更喜風雪已過化
毛澤東題詩
八月廿九日
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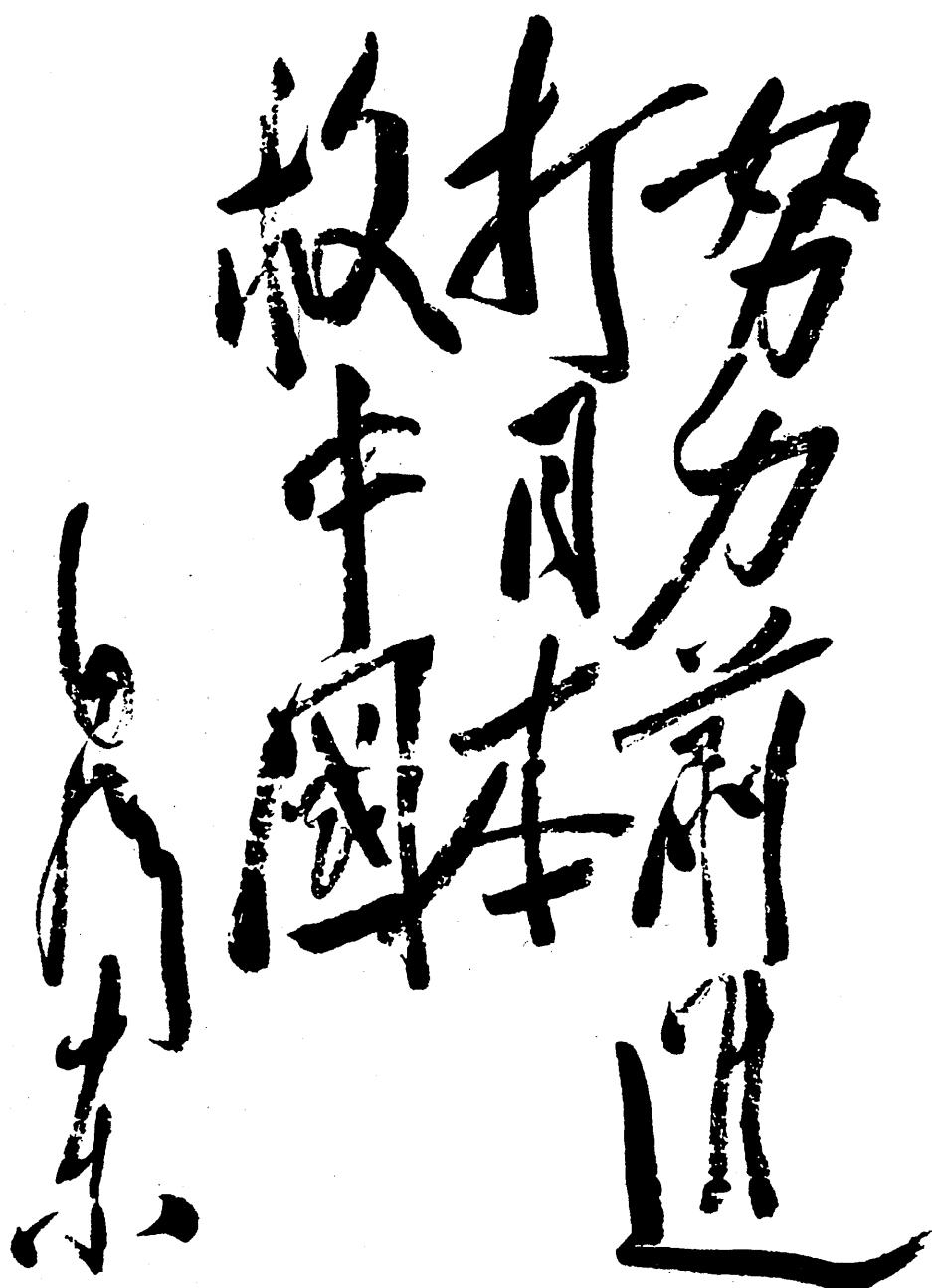
1938年11月，毛泽东为李公朴的《长城》图题《清平乐·六盘山》词的手稿。

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 第二次代表大会题词

(1938年11月)

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

毛泽东



毛泽东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题词。

关于坚决拒绝国民党派高桂滋部 来陕甘宁边区的指示^[1]

(1938年12月1日)

陕甘宁二十三县边区和八路军驻防范围是蒋介石划定的，绝对不许任何部队借口进驻，实行破坏边区的企图。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坚决拒绝国民党派高桂滋部来陕甘宁边区致博古（秦邦宪）、叶剑英、朱德、杨尚昆、林伯渠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38年12月1日)

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加以教育，成为我们的干部，意义实大。武汉失守，西北受日军威胁，钱粮两缺，因此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和晋察冀设立抗大两个分校，由抗大本校分出干部和学员开赴上述两地。延安抗大本校改为培养八路军比较高级干部的学校。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给邓宝珊^[1]的信

(1938年12月5日)

宝珊仁兄左右：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2]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专此。敬颂

戎绥

弟 毛泽东 上
十二月五日

[1] 邓宝珊（1896—1968），甘肃天水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兼新一军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1949年年初起义。建国后，曾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

[2] 陈奇涵（1897—1981），江西兴国人。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

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报告^[1]

(1938年12月8日)

六中全会指出日军还在进攻，我们有许多困难，我们的力量还不够，但我们能停止日军的进攻。后方工作在六中全会总的指示之下，要克服困难，要增加力量。检查工作，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检查，即工作、学习、生产、统一战线和党的生活。生产，即生产运动。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

[1] 这是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作关于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的指示进行检查工作的动员报告的一部分。

关于对待土匪的政策问题的指示^[1]

(1938年12月9日)

对土匪政策应当是：1. 我们武装与剿匪安民的责任，首先要恢复政权，委任或必换县长、区长，恢复抗日秩序。2. 在我们力量足够的地方择最坏的土匪消灭之。3. 收编较为弱而力量不大的土匪部队，收编后，或争取之，或收枪解散之。4. 对不能消灭、不能收编的土匪部队，则与之联络，准备实行前两项办法。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土匪政策问题致豫东游击队彭雪枫电的主要内容。

在抗大干部晚会上的讲话^[1]

(1938年12月12日)

现在抗大有一万人，陕公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怎样才能使全盘的工作真正推动起来、开展起来，这就是要有干部。我们训练大批干部到前线去，领导游击队，领导军队，组织群众，发展统一战线，等等，这就是教育工作的意义。在工作方面，六中全会一共说了十五条，其中一条就是关于物质的保证。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抗大的讲话

(1938年12月13日)

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估计到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战争形势要逐渐进入新阶段，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增加力量来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

这里，最基本的推动全盘工作的正确方针是培植干部。

在今天，广大的敌人占领区域没有普遍的游击队的活动，千百万群众没有人去组织，去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战争。这就是说，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共产党，没有抗日武装，没有把这些生动力量统统都发掘和发挥出来，这些工作都要人去做的。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演讲。



《毛主席在抗大》(素描)

在延安党政军及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 干部晚会上的讲话^[1]

(1938年12月13日)

—

一、各部门应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担负起本身的职务，把工作精神更加紧张起来。

二、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

三、积极推进生产运动，各机关各部队各团体每一个人均须参加生产运动，以克服当前困难。

四、加强巩固统一战线的工作。

五、健全党内生活。

[1] 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38年12月13日晚召开延安党政军及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毛泽东出席指导，并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报告。号召各机关在抗战新阶段的形势下，克服当前一切困难，增加新的力量，停止敌之进攻，以便准备实施我之反攻。要求后方工作各部门，以战斗的精神，深入检查工作，以担负起各部的工作任务，并指出我们检查工作的五个方面，即本篇一；并说明检查的目的，即本篇二。

—

- 一、总结过去工作，发扬过去工作成绩，纠正缺点。
- 二、规定今后任务。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图中汽车是宋庆龄捐赠的。

致朱德等电^[1]

(1938年12月13日)

石友三、高树勋等部正在向河北省南宫县开进中，你们应准备欢迎他们，以真诚态度帮助其发展，并对其作可能之让步，使石高等部能与我军亲密合作。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电的主要内容。

给杨令德^[1]的信

(1938年12月14日)

令德先生：

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2]兄早嘱高岗^[3]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4]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彼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敬复。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上
十二月十四日

[1] 杨令德（1905—1985），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人。当时是大公报派驻陕西榆林的记者。

[2] 袁尘影，杨令德的外甥。1938年年初到陕北公学学习。同年曾误被关押，不久获释。

[3]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当时是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负责人。

[4] 仿吾，即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当时任陕北公学校长。

A vertical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 in Chinese cursive script, enclosed 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text reads:

王維詩
送綦毋潛落第後
無使金杯酒未空
即言歸故鄉
醉後失表儀
猶能見白虹

毛泽东致杨令德信的手稿。

政治上的持久战^[1]

(1938年12月15日)

抗日的持久战需要的时间很长，要经过很多变化，我们打日本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持久战。所以，每个革命者在政治上要有持久性，要准备应付各种曲折，准备克服困难。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曲线，而不是走直线。这个问题也就是走“之”字路还是走“一”字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之”字路，而不是走“一”字路，走“之”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我们抗日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这也是走“之”字路。

[1] 这是毛泽东对抗大即将分配工作的八大队（女生大队）学员作关于政治上的持久战的讲话的一部分。

复张经武等电^[1]

(1938年12月27日)

张、黎：

你处部队番号，以八路军山东纵队下分支队为宜，指挥部用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较好。

毛 王
二十七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张经武、黎玉的复电。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8年12月28日)

国民党顽固派侵吞边区的办法有十余种：一、政府，二、税收，三、邮政，四、军队，五、教育，六、党部，七、缩紧、“蚕食”，八、医务，九、保甲，十、实业，十一、农贷，十二、土匪。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采取强硬政策予以抵制。对何绍南^[2]要采用较强硬的政策，对其他方面要采用较温和的政策。检查站要重新建立起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搞磨擦问题的讲话的一部分。

[2] 何绍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绥德地区专员。

致彭雪枫电^[1]

(1938年12月30日)

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2]带六中全会文件及干部、电台等，已去竹沟布置中原局工作。决调第一一五师主力东向，拟分布于胶济路南北、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朱、彭已在布置中。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彭雪枫电的主要内容。

[2] 郭述申，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1]

(1938年12月30日)

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纵队、吕正操纵队、山东部队等：

中央和军委为了更深刻了解各部队现状、作战经过和执行六中全会决议情形，决定各部队派人到延安来报告工作。

毛 王 滕 谭

三十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滕代远、谭政给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纵队、吕正操纵队、山东部队等的电报。

为抗大《检查工作特刊》题词

(1938年12月)

检查越深入，越彻底，越能发挥学校战绩，克服缺点。

为宁都起义部分同志合影题词

(1938年12月)

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

“宁都起义精神可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

毛泽东为宁都起义部分同志合影的题词。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谈抗日民主问题（摘录）

（1938年）

这里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信基督教的，也有信佛教的，这些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我们不能硬要非共产党员来信仰共产主义，当然共产党员是不信宗教的，并且还要宣传共产党的理论。

这里有思想的自由。所说过墙报里说的只有一套，以后你们有什么都可以写，只要是抗日的。汉奸的说话在这里是没有自由的。写信也自由，过去对于这点，做得不好，以后就要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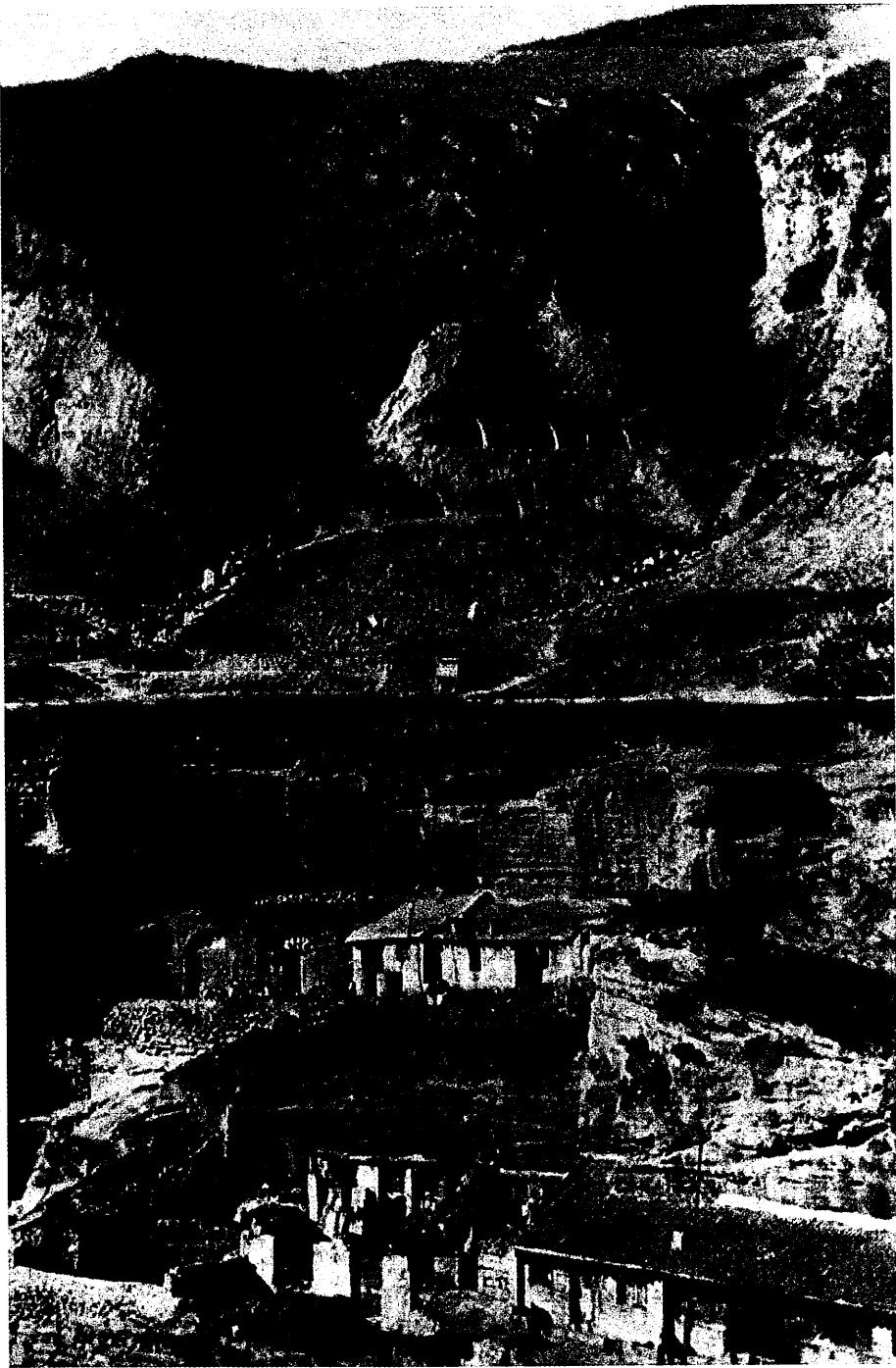
这里政治是民主的。只有汉奸在这里没有走路之权。还有一点，就是要保证军事的集中。班长以后由选举产生，但必须要学校加委，这是军事集中。救亡宣民先队也一律由民主选举产生负责人。

取消斗争会。现在在斗争会里动辄给人家戴上顶大帽子，这是不对的。

这里有意见箱，共产党说话是要做到的，我们要保证，任便你们什么意见，尽管报到意见箱里去，可以不记名字，决不会戴大帽子。

还有告状的办法。你们尽可以由下级告上级，也可以不记名字，并且保证你们的意见达到学校最高当局。

当然诬告不诬告，我们有办法查清楚的。



抗大校舍。

和警卫营二连战士的谈话

(19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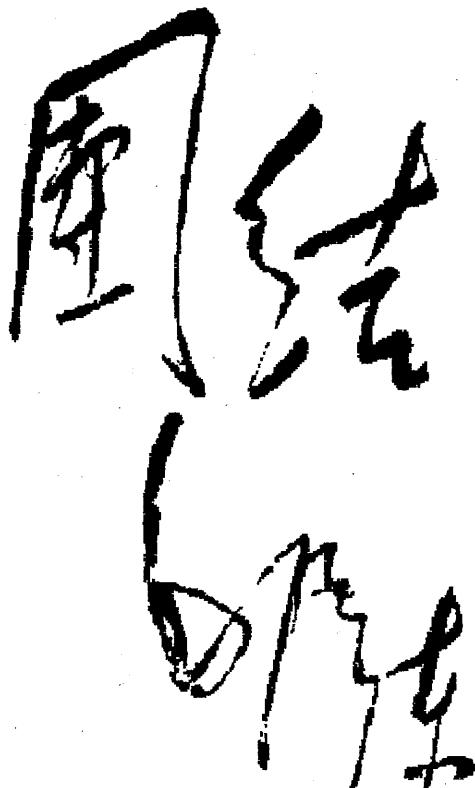
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问题在于学习。……工农分子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和知识分子都要互相学习，搞好团结。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是团结知识分子的。

为抗大学员王承骏题词

(1938年)

团结

毛泽东



毛泽东为抗大学员王承骏的题词。



《黄河儿女》(中国画)



《远望》(中国画)

为艾生题词

(1938年)

努力学习，切实学习，不学好不放手，这是青年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

艾生同志

努力学习，即实践也，不
能好高骛远，须脚踏
实地，务求精深。

毛泽东

毛泽东为艾生的题词。

为董柏成题词

(1938年)

没有什么困难事情能够阻住我们去路的，问题只在坚持正确方针，艰苦奋斗，就能达到目的。

为董柏成先生书

毛泽东

沒有什麼困難事情能够
阻止我們七路机，問題只在堅
持正確方針，取其處，去其
弊，達到目的。
董柏成先生書
毛泽东

毛泽东为董柏成的题词。

励志联^[1]

(1938年)

失败者成功之母，
困难者胜利之基！

[1]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当贝特兰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时，毛泽东说：“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这副对联就是对这一段话的精神的高度概括，为鼓舞全国军民夺取抗战胜利而作。

失败是成功之母，
困难是磨利之器！

毛泽东题写的励志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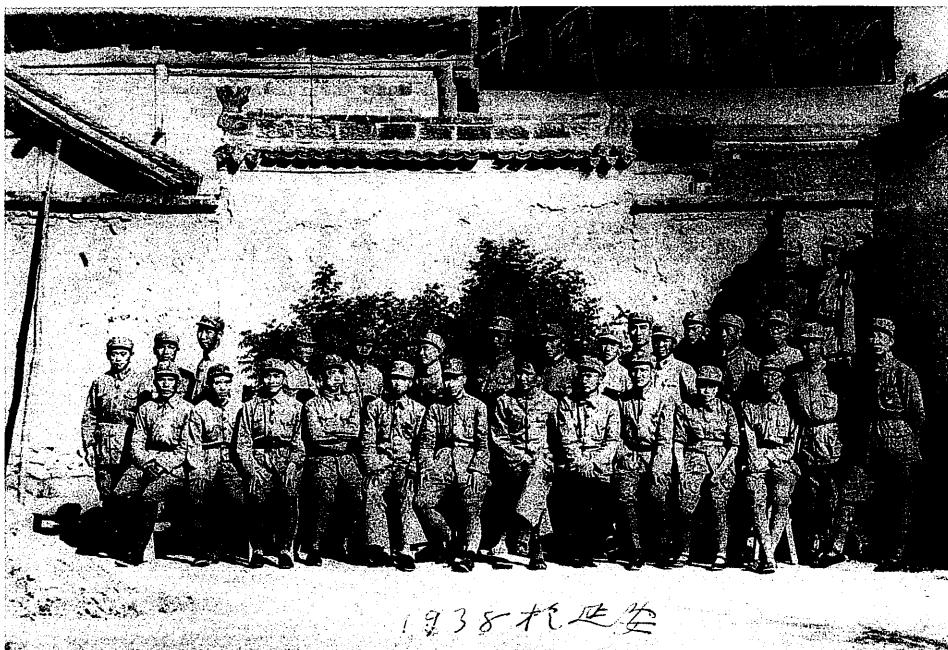
在延安为井冈山时期的 部分同志合影题字

(1938年)

井冈山的同志们

井冈山的同志们

毛泽东为井冈山时期的部分同志合影的题字。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战友们合影。

为张声良题词^[1]

(1938年)

努力学习。

毛泽东

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1] 张声良当时在抗大学习。前一个为毛泽东在张声良的笔记本上写下“努力学习”四个字，并且签了名。后一个为毛泽东在张声良的毕业证书上留下亲笔题词。

为延安《中国文化》题词

(1938年)

延安文化界活动起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族文化而奋斗。

毛泽东

斗争无往而不胜
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建设新民族主义而奋斗

毛泽东为延安《中国文化》的题词。

为抗大题词

(1938年)

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

毛泽东

不仅要有雄才
热忱而且要有
实诚精神

毛泽东

毛泽东为抗大的题词。

为于江题词^[1]

(1938年)

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

毛泽东

碰了钉子时，就向钉
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
1938年毛泽东题

毛泽东为抗大学员于江的题词。

[1] 1938年毛泽东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给学员于江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这个题词写在于江烈士生前的一个纪念册内。

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

(1938年)

第一章 什么是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是一切带革命性的战争之必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广大领土上作战的民族解放战争，广泛的民众性的游击战争之发展是必要的与必然的。在领土广大、技术贫弱与交通不便的中国现存条件下，战胜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方针，无疑应该是广泛地发展民众游击战争，使之与主要的正规战争相配合。不这样做，战胜敌人的目的是难于达到的。

但游击战争不能把它看作独立的战争形式，它是战争中的一个形式与一个阶段，而且从根本上说来是革命战争中的一个形式与一个阶段。具体地说，游击战争是被压迫的民族或人民与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时，不可避免的产物。现在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华民族及其人民到了无可忍受的时候爆发起来的。列宁说：“民族暴动与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当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论民族革命战争》）抗日的游击战争，就是这种民族革命战争之一形式或一方面，它与其他的形式或其他的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了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样，游击战争没有它的绝对的独立性，它又是战争之一阶段，因

为游击战争本身不能独立地解决整个战争问题，它必须从战争中以其主力逐渐发展与提高成为正规军，以与一切低级阶段的游击队以及既存的与新设的正规军配合作战，才能达到战争之政治目的。

由此可知，游击战争有它客观的规律性，当强大敌人对于弱国实行武装侵略与武装占领的时候，无疑义的，敌人的兵力武器是处在优势地位，被侵略被压迫者的兵力武器，是处在劣势的地位。然而后者不但不甘屈服，而且企图谋自身之解放，游击战争就是以劣势的兵力武器来对抗优势的兵力武器之一种战争形式。另一方面，当侵略的敌人深入国境实行武装占领与残暴压迫的时候，无疑义的，民众、地形、自然、社会诸条件，又多不利于敌而有利于反抗的人民。游击战争正好利用与造成这些有利的条件，以求抵抗与战胜敌人，并从斗争中使之发展成为正规军，与其他既存的及新设的正规军相结合，以进行反抗压迫者的战争。这样，既存的与新设的正规军，由游击队发展而成的正规军，与尚未发展成正规军的广泛的游击队，互相结合起来，形成民族革命战争全部武装力量的整体，便能争取战争之最后的胜利。这样，客观的现实条件，使革命的游击战争，具有它本身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成为游击战争本身存在与发展的法则。

把上述这些基本的意思分析起来，可作如下的观察：

第一，游击战争与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抗日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之一种形式，因之它是半殖民地反帝国主义政治之继续，它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必须坚决执行当前的政治任务，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它首先必须从政治上发动与团结广大民众，从政治上团结内部，从政治上瓦解敌人与摧毁敌人的政

抗
日
游
击
战
争
的
一
般
问
题

毛泽东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题写的书名。

权，恢复与建立抗日的政权，收复失地，创造抗日的根据地，配合全体的抗日武装，争取最后的政治目的——民族解放之实现。抗日游击战争不但没有丝毫理由能够脱离政治，而且相反的，要一切服从抗日的政治与政策。只有曲解游击战争的人，才以为：“游击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纯军事的问题。”（任启珊）这种单纯的军事观点，使游击战争失去政治目标，因而就必然废弃政治工作，丧失民众拥护，必然引导游击战争趋于失败。

第二，游击战争与民众——没有政治目标，必然使游击战争失败，游击战争的政治目标如果不与民众的政治目标相一致，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参加、帮助与配合行动，也就必然失败。这就是游击战争所以只能是革命战争之一形式的基本理由，也就是任何反革命性的战争不能采用游击战争的基本理由。因为游击战争基本上是由民众组成的，又是由民众支持的，脱离民众，或者不发动广大民众的参加与配合，它就绝无生存发展之可能。只有不懂游击战争的人，才否认民众的游击战争，才认为：“只有正规军队才能作游击战。”只有不愿游击战争胜利的人，才根本错误地说：“游击队只是一种专门作战的小体，用不着民众。”（任启珊）也只有侮辱民众与破坏抗战的人，才狂吠：“民众根本没有自动参加抗战的意识。”（叶青）抗日游击战争而离开民众，就必然要离开抗日的胜利。

第三，游击战争的组织性——游击战争是有组织性的。虽然一切民众自发的游击队，在其开始的时候，都不免表现出散漫的现象，但是游击战争本身是应该有组织的。不管游击战争的产生，或由当地民众自己发动，或由正规军部队与民众混合组成，或由正规军派出支队配合民众行动；在数量上或为几个人的游击小组，或为几十人至几百人的游击部队，或为几百人至几千人的游击兵团，都

要使之有坚强的政治与军事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健全忠实的成分，高度的革命觉悟，坚韧不拔的信心与毅力，必要的管理教育，严明的群众纪律，模范的民众工作，坚决的反奸细斗争。并从战斗中逐渐克服散漫现象，克服无纪律状态，才能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以利抗日任务之执行。无纪律的游击队，是不能设想其胜利的。只有那些不懂游击战争的人，才把游击队看作无政府主义的与土匪主义的集团，称之为“失意军人用得着，土劣贪官用得着，流氓土匪用得着”（任启珊），借以污蔑游击战争。我们不否认游击队中难免混入不良分子，也有不良分子借着组织游击队或冒称游击队来胡作乱为，也不否认游击队中存在着散漫现象，甚至严重的散漫现象；但决不能拿这些病态的或一时的现象来责备整个的游击战争，而是要在广泛提倡游击战争的方针下，对于这些散漫与不良现象用耐心的积极的态度提高与改造他们，使他们健全而有战斗力。“这是困难的任务，没有话说，这是不能一下子就解决的，整个民众要在斗争过程中去改造自己。同样，无论如何也应当教育，应该根据当地的经验去改造它。”“恶化的并非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无组织、无秩序、无政派性。”（列宁：《论游击战争》）

第四，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游击战争的战术，应当根据主动、灵活、有计划与进攻的原则，适合当时当地的敌情、地形、交通、气候、兵力、民众诸条件，作战上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能进能退、速战速决的方针，对于较我强大之敌，则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在这样的方针下，向着敌人的后方、侧面、虚处、弱处进行袭击、扰乱、截击、破坏等战斗，达到暴露敌人，迷惑敌人，钳制与分散敌人，停滞与疲惫敌人，打击与消灭敌人的目的。这样来执行单独作战与配合正规军

作战之任务。虽一切条件具备，但如果军事指挥错误，也是没有胜利的。

建筑在上述这些基本原则（政治性、群众性、组织性与战术的灵活性）上的游击战争，在领土广大、技术贫弱、交通不便等条件下进行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无疑地将起着巨大的作用。它是“真正能够成为作战的一方面的东西”，是“不要放过可以打击敌人力量的任何一个机会”（列宁：《论游击战争》）的东西。它是走向大规模战斗的过渡形式，是发展成为正规军的初阶，是正规战争的必要助手，是在敌前尤其在敌后恢复并保卫中国土地、人民、主权的整个抗日武装力量的战略支队，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构成上不可分离的部分。

虽然基本上说来，游击战争只能是革命战争之一形式与一阶段，因为它是不能离开民众的，但不是说反革命战争完全不能组织游击队；因此区别这二者成为必要。例如苏联内战中的红色游击战争，过去中国红军时代的游击战争，三年以来阿比西尼亚的抗意游击战争，七年以来中国东北三省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及今天中国最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等等，这些都是代表全民族或广大民众利益，有民众力量为基础，它们的存在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只要在政治与军事的指导上不犯原则错误，它们都是能够存在、发展与胜利的。反之，一切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游击战争”，例如苏联内战中日本、波兰及但尼金、高尔察克等所组织的白色游击队，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所组织的游击队，以及日寇现时所驱使的伪满、蒙“游击队”与正在或将要组织的汉奸“游击队”等等，则都是侵略人民、压迫人民、违反人民利益的东西。这些“游击战争”，因为没有民众的基础，就容易瓦解崩溃或终必瓦解崩溃，也就是我们

应当坚决反对的“游击战争”。如果不把这二者区别开来，就容易模糊游击战争的基本观念，可能误用对方的经验，夸大对方的“游击”效能，或竟作出这样的结论：“侵略者也可以动员民众实行游击战争。”因而减低抗日游击战争的信心，忽视历史上革命游击战争的经验的运用。

同样是革命的游击战争，如果不把民族的革命游击战争与阶级的革命游击战争分别开来，也是不妥当的。前者是全民族的人民，不分阶级、党派，在国家政权领导之下，实行反对外族侵略者的游击战争，它的民众基础较之后者要广大得多。“当异域敌人侵占时，全国人民都是同情与帮助游击队的。”（古色夫：《苏联内战教训》）同时，与游击队配合作战的军队，前者较之后者也要广大得多。“在国内战争条件之下，游击队无论怎样巨大的发展，总是不能起异域敌人占领本国时那样巨大的作用。”（同上）但内战时候游击战争的长处，在于内部纯粹，团结较易，争取敌军的工作也较为便利（因言语相通）。民族游击战争在这些方面稍为差些，因此就加重了民族统一战线与对敌宣传的任务。这些是二者之间的差别点。然而二者有其共同点，就是政治上的依靠民众与军事上的采用袭击（攻势），这方面的经验，二者是应该互相采取的。

本质上相同的民族性的游击战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之间，因其具体条件不同，又有他们不同的特点。中国鸦片战争中广州平英团的反英民族游击战争，与“九一八”以来的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及现在内地的抗日游击战争均各有些不同。一九二四年摩洛哥里夫民族反法国与西班牙压迫的游击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更有些不同。这些不同，表现在它们之间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上。看出其本质上的相同点，又看出其形式上的差别

点，是必要的。

克劳斯维茨在其《战争论》中说道：“在每个时代的战争中，都有其各个独立的性质，独自的条件……在各个时代，应有其独立战争的理论。”列宁在《论游击战争》中说道：“对于斗争方式的问题，无条件地要求历史的考察，依据历史的具体的环境在经济进化的各种时机，受着各种政治的、民族的、文化的、风俗的等等条件所支配……”“无条件的，敌视种种抽象的公式，一切种种教条的药方，要求对于正在进行着的群众斗争要有注意的态度。这种斗争，跟着运动的发展，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激烈化，尽在产生新的愈来愈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根据列宁的名言，具体研究当时当地游击战争（以及一切战争形式），一切变化发展的主观与客观的条件，找到它们共同的规律性（一般的理论原则），尤其是它们各自的特殊的规律性，是非常必要的。今天的抗日游击战争，如果不善于运用历史上一般革命游击战争的规律，可以发生这样的错误：以为在日寇机械化部队进攻之下，“游击战已失掉了在历史上的作用”（陶希圣），或者说“旧战术时代的游击战，只是一种辅助战术，现在或几乎无采用游击战争的机会”（任启珊），这些都是极端有害的说法。另一方面，如果不估计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来公式化地机械地运用历史上游击战争（以及一切战争形式）的经验，也可以发生另外的错误，把抗日游击战争看成等于其他时代其他民族的游击战争一模一样，就必然在行动上遭到碰壁，同样是不利于抗战以及游击战争本身的。

总体来说：什么是抗日的游击战争呢？它是整个抗日战争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领土广大、技术贫弱、交通不便的中国条件下，对于狂暴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作战，成为广泛发展、

到处袭击、缩小敌人占领地、壮大我军声势、辅助正规军、最后战胜敌人的战略工具。它是执行抗日政治任务的、一刻也不能离开民众的、有组织的、采用灵活战术的民众武装力量。根据中国今日民族战争的特点，它和国内战争与别时别地的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争，都有某些不同，它是今日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支伟大的特殊的抗日武装力量，最后战胜日寇是少不了它的。

第二章 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的关系

运动战与阵地战都属于正规的作战，游击战则属于非正规的作战，它与运动战、阵地战是本质上有区别的，这不论在作战单位的数量上，在编制上，在装备上，在供给上，在战术上，在指挥关系上，在前后方关系上，在作战任务上，都可以看出来。

首先，游击部队及游击兵团，即使从整个战争的武装数量看来，它们是很多的，然而从其作战单位看来，它们小的是几十人至几百人的游击部队，大的也不过是几百人至几千人的游击兵团，同正规军比较，是大大不同的。

其次，因为游击战争主要的是依靠民众当敌人到来时临时组织而成的小部队与小兵团，因此，其编制必须适合地方性与小单位性，其武器一般是低级的，其给养是就地取给，这些都不同于正规军。

再次，游击战术也表现其非正规性，主要的是灵活与机动，一般没有什么决战。它不如正规军的阵地战，在固定战线上采取阵地防御与阵地攻击那样带硬性的战术，与强大敌人作真面目的战斗；也不如正规军的运动战，在固定或非固定的战线上，采取正规的侦

察、警戒、开进、展开、攻击、防御等那样整齐而有秩序的战术，与强大敌人作真面目的战斗。说到正规军的运动战能够转化为阵地战，游击战更没有这回事。

从指挥关系说来，游击战以独立自主分散指挥为原则，过分的干涉是不应当的。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虽也允许而且必须给与战区及下级以机动，然而仍以集中为原则。这是因为正规战之组成，极度要求各部队各兵团各兵种各战区之战斗的、战役的与战略的协同动作，而在游击战，则决不应也不能作这样的要求，它只在邻近部队之间要求战役上之某种程度的互相配合，在战略上大致地与正规战相呼应，以及某些游击队在战斗或战役上之就近配合正规军作战，它本身不能有严格的协同动作，也没有许多不同兵种的协同作战。

在前后方关系上，游击战虽然在其每一根据地上，也有其流动的绝不固定的作战线，但因其主要地是处于敌后，同国家的总后方相隔离，从这点上说，它就根本没有后方。正规军则除特殊的例外（例如过去红军的万里长征，现在山西的各军）之外，一般不能如此。

从作战任务说来，游击战是消灭小敌，削弱大敌，袭击敌之交通道路，从敌后建立起独立作战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钳制敌人，策应正规军于遥远的战区与战线上之作战，这些亦与正规军有很大的不同。

所有这些，都说明游击战与正规战之区别，把这二者混为一谈是不对的。无疑义的，八路军是正规军，然而从其在华北作战之这一阶段说来，由于受领的任务与处于敌后的情况之要求，大体上是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不能否认，平型关及其他许多战斗，属于正

规战中之运动战，也不能否认，该军领袖们常常计划着集中较大兵力期于运动战中消灭更多的敌人，然而必须承认，“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方针之正确性。不但如此，在风陵渡失守之后，华北整个的抗战军（包括中央军、晋绥军在内）在其没有改变任务与转移阵地以前，也都大体上是游击战而不是正规军。不能否认，这些军队都是正规军，也不能否认，即在风陵渡失守之后仍然可能并且必须争取打运动战，然而必须承认蒋委员长“以旅为单位，进行游击战”之作战指导的正确性。由此可知，不但民众武装组成的游击部队与游击兵团执行的作战，因其全般条件与作战任务之特殊，是游击战，即正规部队与正规兵团执行的作战，仅因部分条件与作战任务之改变（分散行动，分散指挥，前后方联络关系之改变），也暂时地转化成了游击战。

毫无疑义的，游击战亦可转化为正规战，这不但分散了的正规军集中起来立即可以改到执行正规战的任务，而且一切民众武装的游击部队与游击兵团，在一定条件具备之时，能够发展为正规军（成为正规军巨大来源之一），因而对于作战也转化成了正规战。当其在游击战时，它们是无数的跳蚤，向着一个巨人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把这个所谓巨人也者，弄得疲惫瘦弱起来，不得不承认它们是一些“可恶”“可怕”以至于没有办法对付的“怪物”。及至这些小东西长大起来也化成一个巨人时，前面那个“巨人”就不但疲惫瘦弱，而且简直有生命的危险了。日本帝国主义近已渐渐在中国的游击战争面前表示头痛，就是这个原故。所以不把游击队与正规军、游击战与正规战区别开来是不对的，然而把二者绝对化，认为二者之间有不可跳过的深沟，也是不对的。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承认二者的区别，又承认二者之能够互相转化，方才是正确认识了

二者的关系。

因此，也就非常明白，如果把游击战与正规战混为一谈，或者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看成一个东西就容易犯出下述的错误：在理论上夸大游击战的作用，轻视正规战的作用。例如说“游击战为一切被压迫民族谋得自由解放的主要战略”（张佐华），或者说“游击战术是中华民族抗战之基本的战术”（赵康），甚至于说“游击战术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唯一战术”（胡天民），这些意见其用意在于提高游击战的地位，反对轻视游击战的倾向，有它的积极方面的作用。但这些热心的朋友们，没有明了：如果不把游击战放在恰当的地位，就不能实际提倡游击战，不但反对者能够利用我们这种过分的估计反转来攻击我们，而且从游击战的行动说来，可以使游击队误认了去执行自己所不能胜任与不利于自己生存发展的正规战的任务，同时又难免妨害着游击队积极地去配合正规军作战与向正规军发展之固有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这种“唯游击论”，如果真正把它发挥下去，并实行起来，可以使正规战削弱、解体、向游击战退化，如所谓“把正规军都变为游击战”，失去了主要依靠正规战战胜敌人的必要前提，可以得出“抗日战争失败”的结论。

在相反的方面，则有如下各种不正确的意见：或者把游击战与正规战截然分开，认为游击战终归是游击战。例如说游击战始终只能停在它的原地位，否认游击战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成为正规战。这是承认游击战但把它孤立起来看的一种意见，表现对于游击战估计不足，这种意见无疑地是有害的。或者根本反对游击战，认为正规战外不能有别的战争方式。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游击队中的某些不良现象，例如纪律不良及有人利用游击队营私舞弊等事实，因而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根本否认民众武装的游击队，说什么“只

有正规军才能作游击战”，这是对民众游击战的取消主义，无疑是彻底错误的。

因此，在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正确地估计游击战与正规战的关系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应当这样说：虽然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在某些时候可能暂时地成为主要作战形式，而在敌人后方，则将一般地是主要形式。然而从整个抗日战争说来，无疑正规战是主要的、基本的，它在战略上起决定的作用，而游击战则是正规战的助手。正规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暂时地转化成为游击战，游击战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成为正规战。游击战与正规战二者，应依整个战争的情况与任务之需要，使之各得正确的发展，并正确地互相配合起来，加以必须的其他条件，就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说到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关系，依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特点，又依照技术贫弱的现时条件，一般说来，应以运动战为主体，阵地战有条件地配合之，而以普遍发展的游击战为之辅助。这是明白的，虽然在战场作战上运动战与阵地战可能互相转化，虽然阵地战在一定条件下有配合运动战作战之必要，虽然在技术条件提高之时更增加了阵地战有力地配合运动战之必要与可能，而且从举行大规模战略反攻、夺回敌人占领之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说来，没有阵地战的配合，简直是不可能的；然而革命战争的基本作战方式，还是应该以运动战为主，因此必须大大地提倡运动战，如果否认这一点，将不能解决整个战争的胜负问题。至于游击战，如前所述，是全部正规战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战略助手，它在战略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大大地提倡游击战；但不能认为游击战占主要地位，因此不能把游击战代替运动战与阵地战。这样就把运动战、阵地战与游击战三者的关系，建立在利于抗日战争的正确原则

之上。

第三章 历史上的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不是今天或中国才有的，它在人类反侵略反压迫的战争史中早就有了，而且由于条件的适合，许多起了伟大的作用。历史上的许多游击战争，虽各有它们的特点，因而演出的作用有大小之别，发展的过程与结局也不一样，然而由前辈人的血肉堆积起来的光荣意义与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尊重与研究的。可惜中国历史上几百次农民战争的宝贵经验，至今没有整理起来，这里引据的，只是外国及帝国主义侵略以来的中国几个轰轰烈烈的战争中所表现的游击战争的经验。然而，对于今天正在斗争中的全国同胞认识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及建立其胜利的信心，仍然是有大的帮助的。

一八一二年九月，法国拿破仑以气吞全欧之势，率领数十万步骑炮的大军，侵入俄国。当时在俄国弱而无备的正规军实行集中之前，主要的是用坚壁清野与哥萨克骑兵及一部分农民自卫的游击队，节节妨碍法军的前进。在鲍诺丁诺之役，俄军战无结果之后，断然放弃莫斯科，重整兵力，而以各五百人的九个游击支队，加上广大的农民自卫游击队，不断扰乱、疲惫与打击法军，使其再不能进展。十月，法军因冻饿受困不得不实行退兵时，沿途的游击队大大地起来，配合正规军的战略反攻，截击与追击敌人，大败法军，使雄绝一时的拿破仑大军几乎全军覆灭，游击队掳获不少的官兵，缴来不少的枪炮，俄军的这一全胜战，虽然有它当时致胜的各种条件，主要的还是依靠俄国的正规军，然而游击战的作用是极其伟大的。“一个贫弱的管理恶劣的国家，居然击败了和驱逐了大量的为

世界上最强的名将所统率的欧洲军队，它胜利了，虽然它的才能还没有十分展开，因为有名的游击运动还未组织好，甚至集成很大的部队，遭受禁止，游击队的武器供给也极为困难，说俄国话是‘用斧头拳头来作战的。假定有很好的组织，能相信民众，则拿破仑的军队，也许被消灭的还要早些。”（伊凡诺夫）

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俄国苏维埃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干涉与国内白党的战争中，被敌人占领地方的民众都发动起来，编成武装队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进行真正的战争。在西伯利亚、在乌拉山地方，乌克兰但尼金反动将军的后方及波兰人的后方，都有了很多的红色游击队，不仅时常破坏了和停止了敌人的后方交通，并且时常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在白党退却的时候，更将其被正规红军击溃了的正式部队一网打尽。所以高尔察克、但尼金及日本、波兰等等敌人，为要同红色游击队斗争起见，不得不从前线上抽调许多正式部队，去同游击队作战。“这不但减弱了敌人自己战线上的兵力，而且对于这出没无常、游动不定的游击队，很少取得完全的胜利。”（《游击队怎样动作》）当时游击战的发展，某些游击支队，人达数千。少年人壮年人大都加入战斗，老年人也编为后方宣传队，有老年的“银色连”，有壮年的游击队，有少年先锋队，有滑雪板的游击队，有骑兵游击队。游击队中有坚强的共产党领导，有普遍的政治工作，能与民众打成一片。他们反对过于强调游击战，否认组织正规军的“左”的游击主义，同时反对轻视游击战作用的右倾观念。经验又告诉我们：“正规军是基本的主要的力量，游击队是第二类的帮助正规军完成作战任务的力量。”（《苏联内战教训》）他们很多的游击队后来都逐渐变成了正规军，战斗起来能起到和正规军不相上下的作用。有名的加伦将军的军队，就是由游击

队造成的。

一九三五到三六年，阿比西尼亚的抗意战争，在七个月中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除了主要的政治原因（封建部落制度，没有坚强的政党）之外，在军事上没有坚持运动战，没有将运动战与广泛的游击战及某些可能的阵地战配合起来，最后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阵地战，终于打不过强大的意军。此外阿国的领土不大，人口也不多，也是失败原因之一。可是阿国以落后的军队与武器，同四十万机械化的意军坚持了七个月，中间有一个时期，游击战与运动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几次击溃意军，并收复一部分城市，意军死伤达十四万。假如这样坚持下去，则胜败结局未可预料。现在阿国还有游击战争，如能解决其内部的政治矛盾，则游击战争发展是可能的。

一八四一到四二年的广东抗英战争（广州三元里民众之平英团），一八五〇到六四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一八九九年的义和团战争，游击战都起了伟大的作用。特别是“太平”战争中的游击战，是伟大的战争形式之一，使得清军疲于奔命。这些战争未取得胜利，并不是游击战之过，而是整个的政治军事原因。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优胜于敌的政治军事条件，没有坚持的正规战，则游击战不能解决最后的胜负问题。这些战争中，或则游击战没有向正规军发展，或则正规军没有与游击战适当地配合。一般地都是游击战中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所以都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九二七到三六年，中国红军战斗史中，充满了游击战的伟大作用。它一开始就坚持了正确的政治领导，从不断的失败与胜利中创造了许多的根据地，逐渐从游击队发展了许多的正规军，在有了正规军之后仍然广泛地发展着游击战，许多新的游击队又是积极地广泛地配合正规军作战，因而获得很多的胜利。虽然武器落后，敌

我对比起来游击队的数量很小，但在游击队自己的战斗中，在配合主力军作战的战斗中，有强力的政治工作与紧密地结合民众，因而能够坚持了自己的阵地，保守了主力军与游击队的骨干，组成了今天在抗日战场上出现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尽其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责任。这中间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主要的是依赖于坚强的政治领导，依赖于自强不息的政治工作，使内部团结一致，与民众打成一片，对敌军关系的正确政策，战略战役上使游击战与运动战适当地配合起来，使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把建立政治军事根据地的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并使游击战积极地向正规战发展，因而坚持了十年的战争，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达到了直接参加抗日战争的目的。这种经验，我们再也不希望重复用于内战，中国内部毫无疑义的应该永远团结起来，但用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却是有益的与必需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诸省开展了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无论日寇采用如何残暴的与欺骗的政策去宰割东北的同胞，用了许多军队“讨伐”了七年之久，可是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仍然存在与发展着。那里的斗争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九一八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东北三个省中都爆发了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黑龙江有马占山、苏炳文的抗日军，吉林有王德林、李杜的救国军、自卫军，奉天东边各具有唐聚伍等及其他抗日军，声势浩大，予日寇以很大的扰乱和威胁；但因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统一的军事与政治领导，没有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民众工作，以致组织薄弱，力量涣散，行动不一致，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失败。但到第二时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到现在），由于广大被压迫人民的不断起来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在义勇军中的艰

苦工作，游击战术的逐渐改善，更好地结合着居民群众，新的民族干部的培养等等，使东北游击战争又成为一个浩大的局面，已经创造了七八个大的游击兵团及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因而使日寇不能不分配许多兵力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防范与围攻它们。它们不仅有力地吸引与牵制了日寇侵华的兵力，而且积极地影响着日寇在东北的统治，并影响着韩国的民族运动，这对于今天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实有其伟大的作用。虽然它们中间还存在着许多弱点，例如：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与发展还不足够，吸引民众参加还不甚广泛，内部政治与组织工作还嫌薄弱，争取日军尤其是伪军的工作还是很差，然而只要能作不断的努力，这些弱点是能够克服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论日寇如何残暴与如何欺骗了七年之久，不但不能消灭东北的游击战争，而且必然要激起更大的游击战争，与全中国抗战更有力地配合起来。

上述这些外国的中国的游击战争，证明在革命战争中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必要的与必然的。要使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得到最后胜利，毫无疑义的应该大大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历史上的明效大验，是铁的证明与血的教训。但是应该指出：今日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将是历史上一切游击战争中空前伟大的一幕，不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显示其伟大的威力，就在世界说来，也将是伟大的东西，这是中日战争的现实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第四章 抗日游击战争能否胜利

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抗日游击战争能否胜利的问题，要从整个抗日战争敌我力量对比的考察中去解决。这个

力量对比的特点是：

(一) 日寇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它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据有比较进步的工业生产与优良技术的海陆空军，这是首先要估计到的。但它虽有进步的工业，却仍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帝国主义，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充分，不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与应付广阔的战略。加之日本人民的反战思想在发展着，这一点影响到侵华军的下级士官与广大兵士逐渐发生不满情绪。还有，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它的力量不能全部用于侵略中国，至多只能出兵一百万左右，此外的力量不得不留以对付其他的国家。基此种种原因，日寇的侵略战争决不利于持久与占领广大的地区，在战略上不得不要求速决战；我们如能坚持三年以上的战争，它就很难支持下去了。在作战上，日寇不得不依赖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以便充分发挥其武器的威力，迅速求我主力决战，决不利于在交通不便的广大乡村作战。为此缘故，它就在占领区内，控制要点，要求后方安稳，交通畅达，以便集中其有限兵力于主要战场，与我正规军作战，决不利于处处分兵，处处作战，它最怕后方动摇与交通阻塞。此外，它极力要求利用被占区域的物力、财力以至人力去弥补它自己力量之不足，决不利于失去这些资源人力，尤其害怕消耗力量于“得不偿失”的战斗场合。因此，在敌占领及所至的一切地区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无疑将给日寇以重大的打击，这种效验，已经在华北五省及江、浙、皖三省中表现出来了。

(二)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显得落后，这是应该估计到的。然而中国又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国家，这些条件都可以作为持久战的基础。这些条件便利了我们使用

大规模的运动战，发展广泛的游击战，在敌后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迫使敌人处处作战，前后作战，不停作战，不断消耗。我们则结合军队与民众力量，打击敌人的弱点，在敌人前方、后方、侧方造成全面的战场，在各方面分散敌人的兵力，从各方面消耗敌人的力量，这样来争取时间，逐渐改变敌我总的优劣形势，争取抗战力量逐渐转到优势，到了那时，就是我们最后战胜敌人的日子了。

(三) 中国人口虽多，但缺乏组织性，这个弱点是应该估计到的。但是一方面日寇大举侵略中国，不仅强占我们的国土，而其穷凶极恶的野蛮政策且欲灭亡我们的种族，这就逼使我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了，今天的中国不但和阿比西尼亚不相同，也和过去中国一切历史时期不相同了，这就是说，今天中国已处于历史上最进步的时代。全国人民的觉悟正在提高，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巩固与发展起来，政府、军队与民运工作正在加强起来，人力、物力、财力都可以源源发动，无组织的人民可以变得有组织。因此，我们不但以现时力量能够长期支持战争，即令日寇还有可能占去我们一些领土，甚至占去我国大部分领土，我们还是能够争取最后胜利的。中国是全民的抗战，不但内线的人民正在组织起来进行抗战，而且敌军占领区域内的人民也在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战，真正汉奸托派“认贼作父”的人终归只占最少数，誓死不当亡国奴的人无疑地占了绝对大多数，以此抗敌，何敌不摧，最后胜利谁能说不是必然的？

(四) 日本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因此不但引起国内的阶级对立，中国的民族对立，而且引起广大的国际集团和它对立。中国的战争则是进步的正义的，因此不但能够团结国内各阶层各党派统一

对敌，而且能够取得敌国人民的同情与广大国际的同情。这又是敌人必败中国必胜的重要条件。

整个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在上述这些条件之下进行的。抗日的游击战争，同样地根据这些条件，能够配合正规军争取自己的胜利，一切从事游击战争热爱祖国的人们，要有这种坚强的自信心。

第五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问题

这里要答复四个问题：游击队如何产生的？如何编制的？如何装备的？成分如何？这些问题都是游击战争武装部队的组织问题，是没有游击战争经验的人们所不明白而亟待解决的，否则就不知怎样开始干。下面逐一说明这些问题：

游击队如何产生的

游击队的产生，可能有下列许多形式：直接从民众中产生，由正规军派出临时的支队，由正规军派出永久的支队，由正规军的支队与民众的游击队混合编成，由地方民团化为游击队，由敌军叛变过来化为游击队及由土匪队伍化为游击队等等。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成分，无疑地将包括这样许多方面的来源。

第一种形式的游击队，是从民众中直接产生的，这是一种基本的形式。敌军来到，压迫屠杀，民众中的先进分子，就号召民众作抗日斗争，集合其中的积极勇敢分子，找到几支破枪，杂以梭镖鸟铳，就是一支游击队。国家已有法令号召民众组织游击队为保卫家

乡而斗争，地方政府起而提倡，这种组织必甚顺和。就是某些地方政府不争气，首先跑了，民众中的先进分子，凭借其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一声号召，大众响应，仍能组织很多的游击队。这种情况下，游击战争的领导责任，大都落在青年学生们的肩上。若干教职员，乃至大学教授、文化名人、在乡军人、科学家、艺术家、自由职业者，也有挺身而出，愿流自己最后一滴血的。近来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浙江、安徽、江苏等省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争，属于民间爱国志士倡导而成的，为数甚多，就是最好的证据。这种游击队，越多越好，每区每乡都可组织许多小游击队，汇合起来，就成了大游击队。有人说，我是老百姓，我是学生，只会咬文，不会讲武，这是不对的。老百姓与军人，其间并无万丈深沟，只要你肯干，你就顷刻之间成了军人。你是老百姓不要紧，会咬文更好，组织起来，就是军队，拿起枪来，就是军人。游击战争就是军事大学，试打几仗，就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有些名曰“军人”的，还不及你呢！所以抗日游击战争的广大来源，毫无疑义的是民间直接产生的游击队。

第二种形式的游击队是正规军派出支队临时组成的，例如抗战以来许多军队都有从军或师或旅派出支队临时执行游击任务的。或竟以正规军之整个兵团，应任务与情况之需要，暂时地分散去进行游击战争，例如八路军在华北，除了集中作运动战之时间以外，就都是分散作游击战的。这种形式的游击队是需要的，因为不但在作战任务上为了配合运动战，需要正规军派出支队作游击战；而且由于游击战的风气未开，需要从正规军派出支队，甚或以某些正规兵团整个分散去暂时地进行游击战。这种情况下，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常发生正规军不会打游击战的困难，因此，这种形式的游击队

的领导者们，必须注意改变自己的种种条件，例如官兵的自动性、良好的纪律、学会游击战术等，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种游击队带着临时性质，故游击队领导者们须注意扶助人民组织地方游击队，使自己走后当地仍能支持游击战争。

第三种形式的游击队，是正规军派出长期性的游击支队，这种派出的支队并不准备归还建制，位于敌人后方之某一地区，成为该区游击战争的领导骨干。例如以五台山为中心之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八路军派出之正规兵团，成为坚持该区游击战争之骨干，以它为中心，繁殖了很多的地方游击队，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一切有与后方隔绝之虞的地区，都应采取此种办法，这是制敌死命的战略计划之一，万万不可忽略。正规军撤退时因某种原因不及随军退出之部队，即留在敌人后方打游击，也属于这一类，淞沪一带颇有这种游击队，他们虽离开了军队主力，仍能独立自主地打游击。

第四种形式的游击队，是由正规军派出小部队，与地方游击队混合编成。例如由正规军派出一班人，或一排人，或一连人，插入于地方游击队起领导作用，使地方游击队迅速地有战斗力；或派出有经验的军事政治干部于地方游击队，成为其领导的骨干，也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些办法是很好的，能使游击战争迅速发展，五台山区域的游击队，采用这种办法的很多。

第五种形式的游击队，是由民团、警察与保安队等转化而成的，华北各省，已有许多，任何地方，都应如此。政府已有命令，地方人员不准擅离战区，县长、保安队长、公安局长，都应服从这个命令，不得率队后退，留在当地，坚持抗战。军队长官也不得收编民团、警察与保安队，只图扩充自己，置地方于不顾，韩复榘在山东之所为，应引为深戒。这种民团警察与保安队变成的游击队，

其中有许多往往是没有好的纪律的，必须加以改进；必须吸收民众中间的勇敢积极分子，充实其战斗力；必须吸收爱国青年，充当其干部，才能坚持游击，不致崩溃逃散。红枪会等旧式半军事团体转化而成的游击队，也属于这一类。

第六种形式的游击队，是由敌军叛变过来的部队组织而成，被日寇利用之伪军，常有这种可能，我们应该多方进行宣传接洽工作，组织其叛变，待其实行叛变时，则好好接纳而收编之。在取得其领导者的同意，得到其积极分子的拥护之后，从政治上组织上加以必要的改造。弄得好，能够化为有用的游击队。对于这种部队，加强其政治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第七种形式的游击队，是由土匪部队改造而成。这虽是困难的事情，然而必须耐心去做，免为敌军利用。许多土匪常常冒称抗日游击队，只要有可能性就须从政治上改造他们。许多半农民性的匪部，是容易改造的。

各种来源不同的游击队都是需要的，汇合起来就成了游击战争的大海。古人有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注意组成与接纳任何形式、任何来源的游击队，能使抗日游击战争起到它在战略上的伟大作用，这是爱国志士们不应忽略的。

游击队如何编制的

许多人想干游击战争，但不知游击队的组织法，对于没有军事经验的广大民众及青年学生来说，这确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有军事经验的人，也不见得人人懂得游击队的组织法，因为他们没有游

击战争的经验，又因为所谓“游击队的编制”，包括整个游击区的全部军事组织，并非限于单个游击队的编制。现以处于敌人后方的一个大游击区为例，来说明编制法。小游击区即等于大游击区的一个分区，依其分区的编制法。单个的游击队或游击队，则依大小游击队中的某种形式之游击队或兵团。这是游击战争的整个组织制度，作为我们的意见，提供国人参考。

一个包括多数县的大游击区，应组织成为一个军区，设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为全区游击战争之最高领导首长，在他们领导之下，设各种必需的工作机关，如司令部与政治部，司令部下设参谋、副官、军需、军医等处，以参谋长秉承首长统摄之；政治部下设宣传、组织、敌军、民运、总务等处，以政治部主任秉承政治委员统摄之。全军区内划为若干军分区，依地形、敌情及游击战争发展情况，或二三县，或五六县，划为一个军分区，设军分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指挥全军分区之游击战争；在他们领导之下，设分区司令部与政治部，两部下依游击队之多寡，设置必要的分工工作，机关名称可全如军区，唯人员则减少，只要能工作就行了。

为了统一各个不同来源的游击队的指挥，并为了协调军事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军区与军分区均可以组织一个七人至九人的军事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区军事政治的讨论建议机关，委员是从各游击队及地方行政推出，以军区领导者中最有威信的一人为主席。

全军区人民原则上都应武装起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脱离生产的抗日游击队，一种是不脱离生产的半军事性质的抗日自卫军。

脱离生产的抗日游击队，大体上又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相当于一分队（等于排）或一中队（等于连）的小游击队，大体上每

区有一个，每县有三四个或五六个。各区之游击队，依其情况，可以越区乃至越县游击，但基本上属于那一区。

第二种是两中队、三中队或四中队合组的基干游击队，每县有一个，称为某县游击大队，可以越县游击，但基本上属于那一县。游击到某一区时，即与该区之小游击队临时配合行动，不但资其战斗力，还资其敌情、地形、人情、风俗之熟习。

第三种是两个大队或三个大队或多至四个大队组成的游击支队。力量大时，还可以将两个三个至四个游击支队，组成一个游击纵队。这种支队及纵队，其性质为“县游击兵团”，与大队以下之“游击部队”区别开来，属于军分区司令所直辖，人员不足及有其他某种必要时，军分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可以兼任这种游击兵团的首长。军分区游击兵团之主力，依情况之需要受军区首长之调动，临时地离开本分区，与别分区的游击兵团或游击部队协同作战，但基本上是属于本分区的。

编制上，三种形式的游击队，允许各有某些特点。例如一分队一中队的小游击队，可以少至九人、多至十一人为一小队，等于一班，设小队长、小队副，全小队可以只有二三支或四五支步枪，余是土造枪、鸟枪、梭镖、大刀之属。两小队、三小队或四小队为一分队，等于排，设分队长、分队副。独立行动的，设政治指导员，协助分队长做政治工作；非独立的不设。全队可以只有七八支或十几支步枪，余是鸟枪等类。二分队、三分队或四分队为一中队，设中队长、中队副、中队政治指导员。上述这种小游击队，受区的军事机关领导，但同时受县军事机关之指挥调遣。

县之基干游击队之编制，较之区的小游击队应该稍为谨严一些，武器尽可能充实一些，干部应是全县的优秀分子。其编成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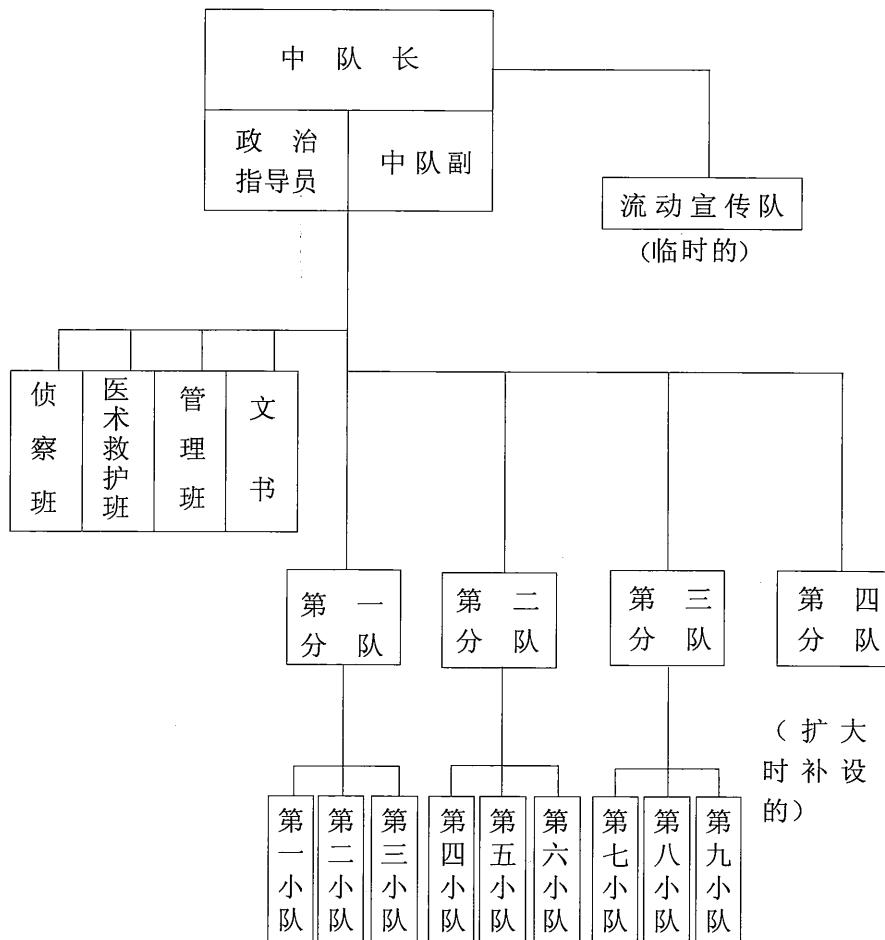
是将各小游击队集中起来的，被集中了的区，应为之留下一部分人枪，使之作为基础发展新的游击队，为保卫该区之用，决不可全部集中，不顾各区。如果县的原有武装部队和保安队、民团、警察之类是存在的，则应以此种队伍为中心去编成，而不应多编各区的游击队，特别是敌情严重之区，不应随便地编掉它的。这种基干游击队约等于营，称为游击大队，设大队长、大队副及大队政治委员。

支队以上之游击兵团，其编制更应谨严一些，开始不谨严的状态，应逐渐使之改进，人员武器比起县的基干游击队来也应好些。大体上十人至十三人为一小队，设小队长、小队副。三小队为一分队，设分队长、分队副。三分队为一中队，设中队长、中队副、中队政治指导员。三中队为一大队，设大队长、大队副、大队政治委员。三大队为一支队，约等于团，设支队长、副支队长、支队政治委员。如有两个以上支队，可编为纵队，设纵队长、副纵队长、纵队政治委员。

在北方，应该组织骑兵游击队，军区有由两个至四个中队组成的骑兵支队，分区有由两个至五个分队组成的骑兵大队，具有骑兵中队（等于步兵排的人枪数加乘马）或分队（等于步兵班的人枪数加乘马），多则不论。

以上从小的游击队到大的游击兵团，都是脱离生产的，一切给养等事，由公家统筹办理。其详细编制，列表于后。

第一表：一、独立的游击中队（相当于连）的编制系统



（每小队九至十一人，如人枪不足时，可不设第三分队，
或暂设一直属小队）

二、独立游击中队（相当于连）的人员武器

职 别	人 员	武 器	附 注
中队(连)长	1	1	1

政治指导员	1	1	2
中队(连)副	1	1	2
中队(连)部文书	1	0	
管理班	班长	1	1
	司号员	1	1
	通讯员	2~4	1~4
	勤务员	1~2	0
	理发员	1~2	0
	炊事员	10	0
救护班	医生	1	0
	看护班长	1	0
	看护员	3~5	0
侦察班	班长	1	1
	侦察员	6~12	6~12
分队(排)长	3(少至2,多至4)	3	
小队(班)长	9(少至6,多至12)	9	
队员	72(少至48,多至120)	72	
合计	115~128	97~106	

备考：一、流动宣传组从队员中选任，不脱离原职务，在非作战时间内进行民运工作。

二、救护班如无人员可不设，如有较少的二三个看护，则可归在管理班内管理。

三、理发员没有时即缺额，炊事员不足时亦缺之，派队员轮流烧饭。

四、武器每个战斗员都要有一件，每班至少要有二十三支步枪，其余鸟枪长矛大刀都可。枪的分配不要各排各班绝对平均，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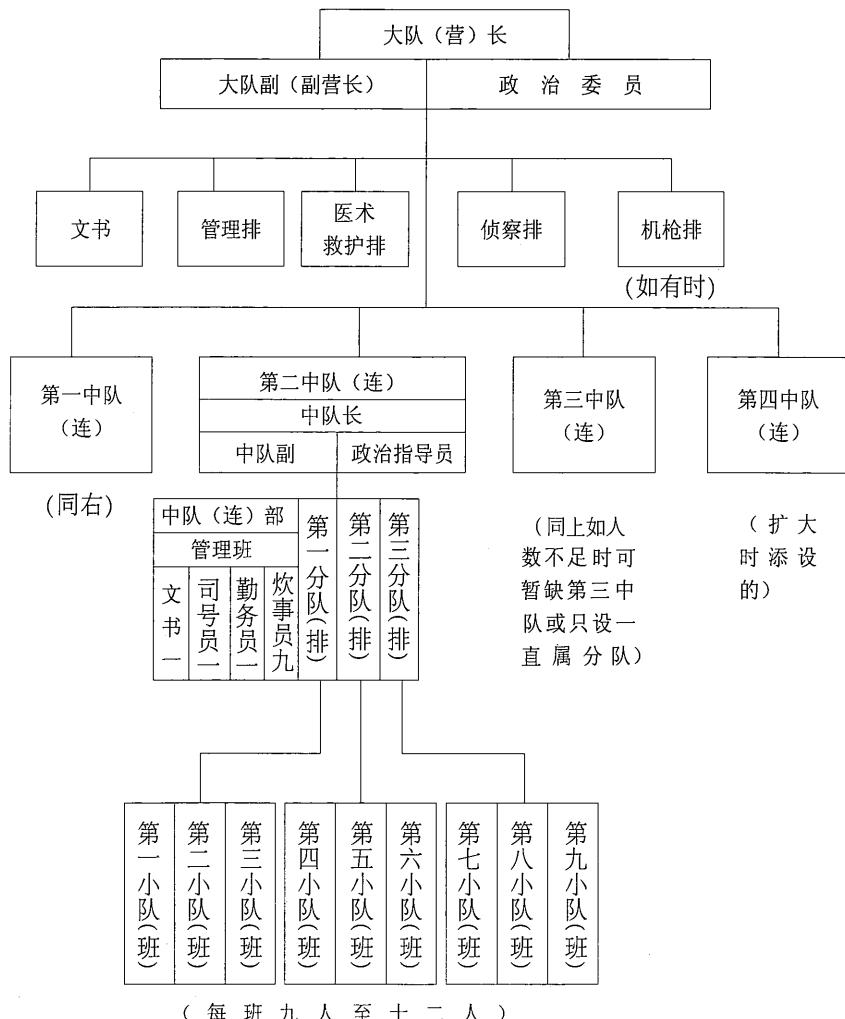
使有一个排枪多些，其余两个排稍微少些，以便分别担任不同的战斗任务。

五、中队人数，多至一百八十人，分十二班，每班十一人；少至八十二人，分为六班，每班九人。

附注：1. 短枪。

2. 最好有短枪。

第二表：一、独立游击大队（相当于营）的编制系统



二、独立游击大队（相当于营）的人员武器

职 别		人 数	武 器	附 注
大队(营)长		1	1	1
政治委员		1	1	1
大队(营)副		1	1	1
大 队 (营) 部	文书	1~2	0	
	排长	1	1	
	司号员	1~2	1~2	2
	通讯班	7~13	7~13	2
	勤务员	1~2	0	
	理发员	2~4	0	
	饲养员	1	0	
	炊事员	5~12	0	
	医生	0~1	0	
	担架员	0~12	0	
救 护 排	看护员	3~5	0	
	排长	1	0	
	侦察员	21~52	21~52	3
	机枪排	?	?	
大部队合计		46~110	33~71	4
第一中队		99~126	88~115	
第二中队		99~126	88~115	
第三中队		99~126	88~115	
全大队合计		343~488	297~416	
两个中队的最小数目		244	209	
四个中队的最大数目		614	531	

备考：一、由二至三个中队编成的游击大队，扩大到四个中队的最多数目时，依据当时情况的要求与许可，即可改变编制，由大队扩大成支队（详见第三表）。

二、侦察排的组织设一排长，排由两个班至四个班编成之。至少要有一个班的便衣队员。能有骑兵时配一班骑兵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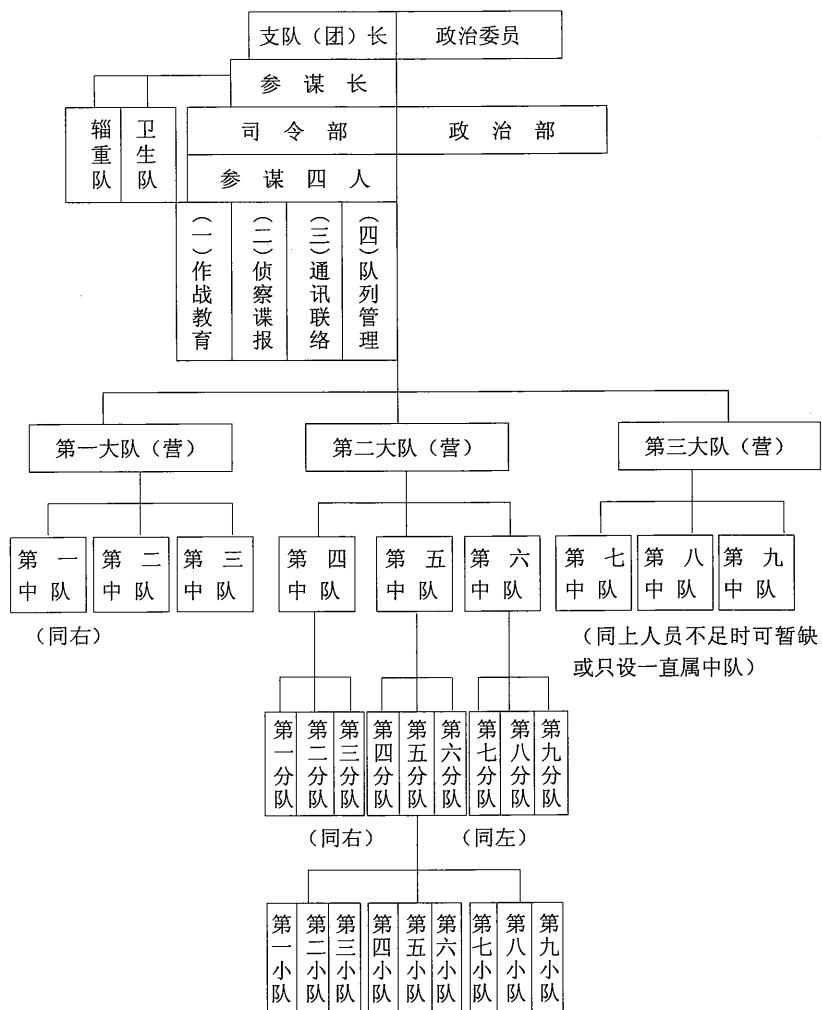
三、如有机枪时，不论哪一种机关枪，都可以成立机枪班或机枪排，更多时则可分到各连上去。一般说来，轻机关枪每挺由五人至七人使用，重机关枪每挺有七人至九人使用。

四、担架队如无人员时，可不设立。作战时可发动各连炊事员临时充当，并请当地人民帮助。

五、武器，每个中队至少要有二三十支步枪，其余则配以鸟枪、梭镖、大刀、土炮。

- 附注：
1. 短枪。
 2. 最好是马枪。
 3. 应有一些短枪。

第三表：一、独立游击支队（或称独立团）的编制系统



二、独立游击支队（或称独立团）的人员武器

职 别	人 数	武 器	附 注
支队长	1	1	1

政治委员			1	1	1	
参谋长			1	1	1	
司令部	参谋长	第一参谋	1	1	1	
		干部训练班	?	0		
		第二参谋	1	1	1	
		侦察排	32~42	32~42	2	
		第三参谋	1	1	1	
		通信排	32~42	32~42	3	
		第四参谋	1	1	1	
		管理排	13~16	1	1	
		文书	1	0		
	辎重队	队长	1	1	1	
		会计员	1	0		
		出纳员	1	1	1	
		军实员	1	0		
		运输员	4~8	0		
	卫生队	队长	1	0		
		医生	1~2	0		
		看护员	10~18	0		
		担架排	8~20	0		
支队部合计			113~170	74~94		
第一大队			383~473			

第二大队	383 ~ 473		
第三大队	383 ~ 473		
全支队合计	1262 ~ 1589		

备考：一、大队以下的编制，参看第一、二表，但各大队与中队均不设侦察部队与卫生机关，大队设政委。

二、每班人数可由九人到十三人，五响或单响的步马枪，每营最好有一百支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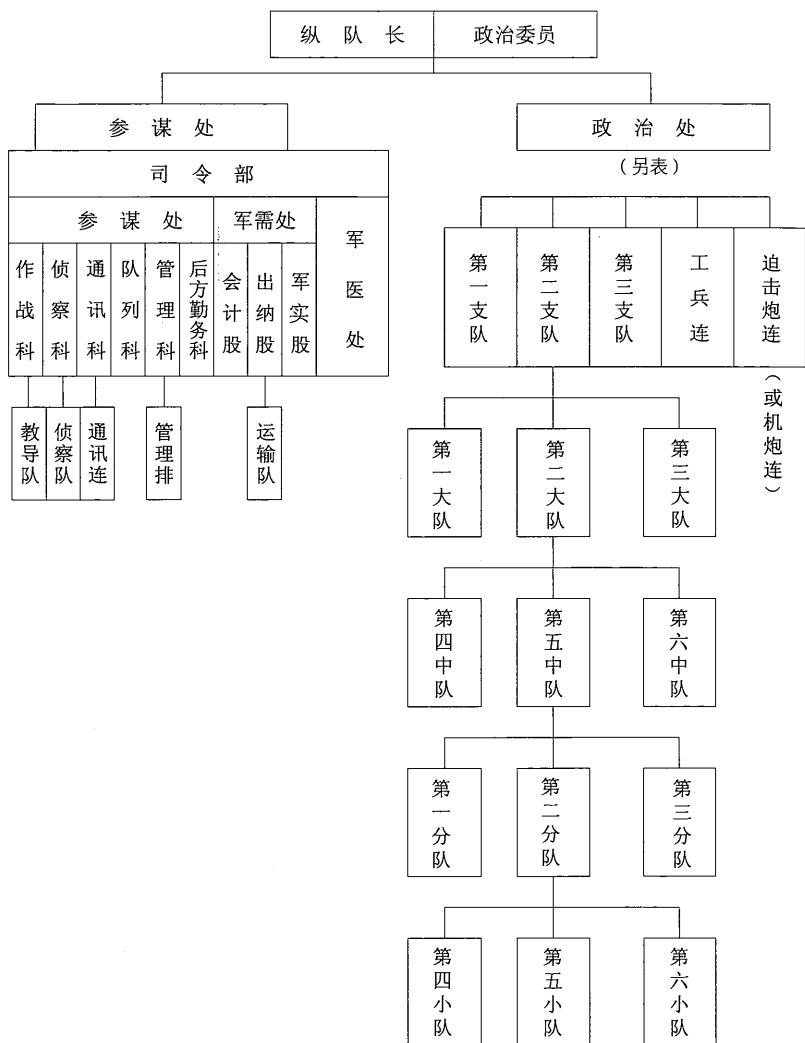
三、钱担子、药担子，可根据实际情形增加。担架员缺少时可不设。

四、表内各大队最少的数（三百八十三）系以每中队一百二十一人、大队部二十一人计算的。最多人数（四百七十三）则是以大队部包有侦察排与救护排计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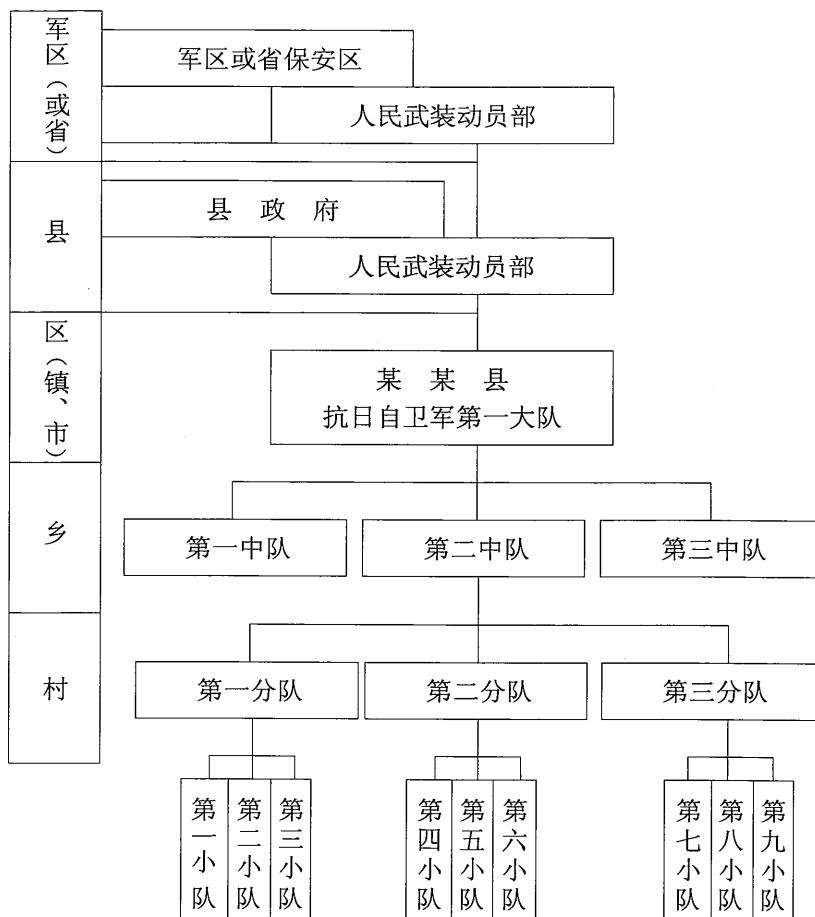
附注：1. 短枪。

2. 一部短枪与小刀。
3. 马枪，可能时配一支驳壳枪。

第四表：独立游击纵队（或称独立师）编制系统



第五表：抗日自卫军组织系统



备考：抗日自卫军组织法

一、成分——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年成年均组织于抗日自卫军内。不分男女性别（但女子单独编成）、阶级成分、宗教信仰，凡属抗日人民，身体健全者，都可参加，但以自愿为原则。

二、任务——担任地方戒严，坚壁清野，侦察敌情，捉拿汉奸，帮助抗日正规军及游击队运输军实，搬送伤兵，打扫战场，以至配合作战等事。

三、编制——分小队、分队、中队、大队四级。村为最低单位，按村内自愿参加之人数多少，设小队及分队，十人至十二人编为一小队。二个以上小队编为一分队。乡设中队，由二个以上分队编成。区设大队，由二个以上中队编成。大队为最高单位。女子在乡之中队内单独编成小队及分队，训练与工作均单独实施。

四、干部——小队设小队长、小队副；分队设分队长、分队副；中队设中队长、中队副；大队设大队长、大队副。这些干部，由队员选举，上级加委，不脱离生产。

五、参战组织——以自卫军为基础，依自愿原则，动员人民分别加入下列的参战组织。

- (一) 运输队——运输军实；
- (二) 担架队——搬运伤员；
- (三) 交通队——送信带路；
- (四) 侦探队——侦探敌情；
- (五) 慰劳队——慰劳作战部队与伤病人员；
- (六) 看护队——看护病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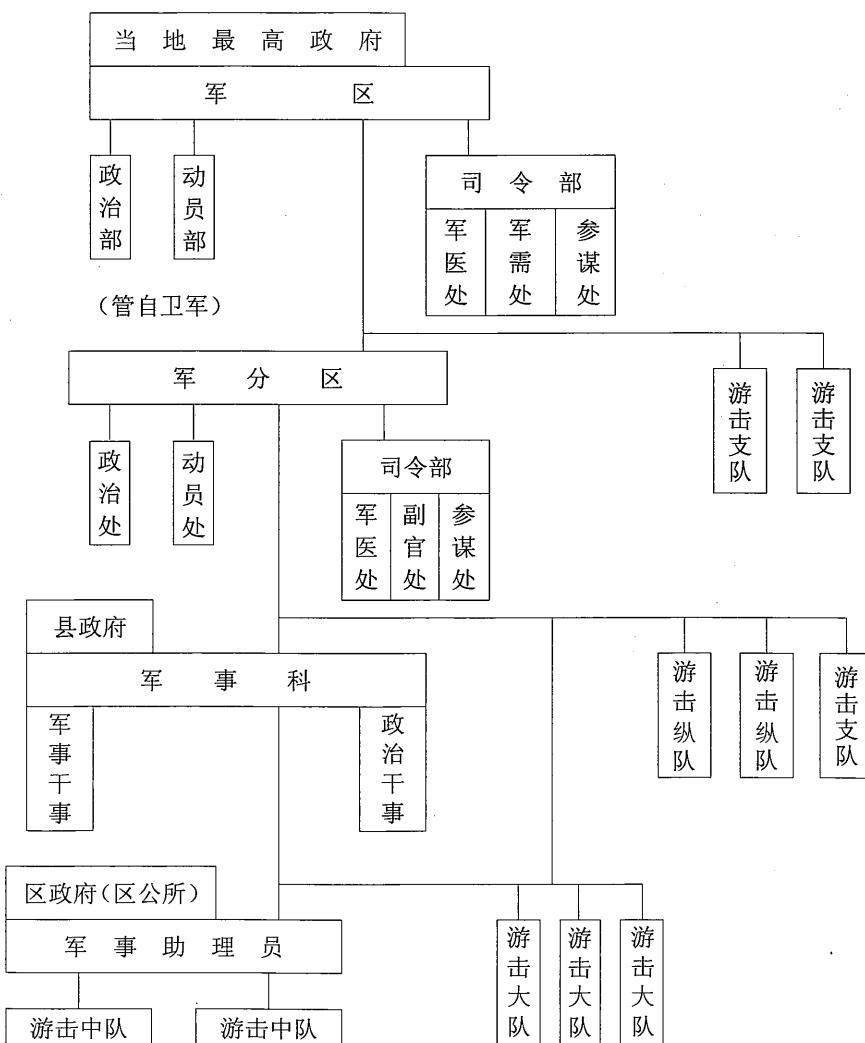
前四种应动员自卫军担任，但十八岁以下的不加入运输队、担架队；后两种妇女儿童老人均可参加。

六、模范自卫军——模范自卫军是由自卫军过渡到游击队或正规军去敌后备军的阶段。编制与自卫军同。经过充分的宣传鼓动之后，依自愿原则，挑选青年壮年男子，身体强壮、觉悟较高者编成，加以较自卫军进一步的军事政治训练。开始可在一个区或一县内号召建立一个中队至一个大队，依其可能及需要逐渐扩大之。一遇需要，就可转变为游击队，或补充正规军。

七、抗日青年队——可以将十六至二十一岁之青年单独编为抗

日青年队，此处系依简便原则统一编制于自卫军之内。

第六表：军区组织编制系统



抗日自卫军的制度，是抗日战争中使全体人民军事化的一种优良制度，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之青年壮年男女，依自愿原则组织于抗日自卫军之内，受某种程度的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之训练，成为半军事性质的人民初级武装组织，担负他们本乡村的放哨警戒、侦

察敌情、捉拿汉奸、坚壁清野、扰乱敌人等任务。敌人进攻时，可以动员他们在适当地点，采用施放土枪土炮、布为疑阵、虚张声势、牵制敌后的办法，以配合游击队作战。同时又可动员其中组织好了的担架队去抬伤兵，运输队去搬粮食，慰劳队去慰问游击队员，送茶水稀饭给游击队员吃。地方有了他们，汉奸不易潜藏，土匪不易扰乱；游击队有了他们，得到了大大的助力；正规军有了他们，得到兵力的补充（自卫军制度是到达征兵制的过渡，模范自卫军的组织则可直接补充正规军），真正是一个顶好的人民抗日制度。陕西、湖南等省，已经开始自卫军的组织，晋、绥两省也有过国民军制度，以及各省原来的壮丁队，均有我们这里所说的半军事组织之意，不过未依自愿原则，没有发动人民的自动性，编制又似乎不大适宜，更没有普遍到一切青年壮年男女人员，故收效不大，自以采用普遍的新编制的自卫军制度为合宜。一切加入自卫军的人员，原则上不脱离生产，在乡村勤务时，亦原则上自己供给，只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例如征调他们担任长途与较长时间的运输工作时，则应由政府供给给养。因此，在训练与动员时，依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发动人民自觉性，决不应该用强力对待，否则不能收效，这是要深切注意的。他们的武器是刀、矛、木棍、土枪、土炮之属，每人都要有一件。

在一切敌到地方或敌可能到之地方，在自卫军中组织游击组，依居住接近，少至三人多至十人，均可为一组，有较好的武器如单响枪、九响枪乃至五响枪，担任袭击敌人，仍不脱离生产。把这个制度说在“游击队的编制”里面仅为叙述便利之故，不是说这个制度只能用于战区或游击区，全国任何一个省内都可以且应该实行这个制度。不过在后方各省组织自卫军，其目的主要为加强人民的军

事政治教育，巩固后方治安，有组织有教育地动员人民补充正规军，而没有侦察敌情、坚壁清野、配合作战等任务罢了。自卫军的编制如第五表。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研究军事理论。

为了统辖整个游击地区的抗日武装组织，不论是脱离生产的游击队，还是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计划并实行全盘的抗日游击战争，我们认为有采用军区制度之必要。军区组织编制的系统如第六表。

游击队如何装备的

在这个问题上，第一，应知游击队是轻装袭击队，因此游击队的装备以“轻便”为原则，累赘是深忌的。第二，游击队的装备须

按游击队的情况与任务而定。例如低级的游击队，装备当然要差些；高级的游击兵团，装备应好些；没有铁道破坏任务的游击队与有此种任务的游击队，所需的装备也不同。第三，游击队的装备不能按照主观之所需，而需按事实的可能，是逐渐补充的，不是一下子整备的。这些都是应该注意的地方。

说到游击队装备的物品，包括武器、弹药、被服、通讯器材、医疗器材、运输工具、宣传器材及其他等项。这些东西都应按照上述的原则去征取、分配与补充。

游击队的武器、弹药，虽然常是困难的问题，特别在开始组织的时候更不容易解决，但总是能够解决的。民众组织的游击队，除了特殊的情形之外，起初多是九响枪、土造枪、鸟枪、梭镖、长矛、大刀、土炮、松树炮、土地雷等低级的武器与部分的新式步枪相结合，要待长期作战中从敌人夺取及从民间收集，逐渐补充自己，并增加其种类，弹药的来源尤须依赖敌人。在这个问题上，袭击敌之运输队是最方便的，因为袭击成功，敌之运输队恰好就做了我之运输队。在分配时，火器（步枪等）与白刃（刀矛等），应在小队里面配合使用。每个游击区，要设一个修械所，除修理武器外，并须逐渐使之具备制造次等步枪、次等子弹、手榴弹、刺刀等类之能力，使游击队得到某些补充。但不可过分依赖此种制造，游击队武器弹药之补充，主要依靠自己的坚决作战，从敌人手中解决问题，这是武器弹药乃至一切装备的最主要的来源。为了破坏敌之铁道、桥梁、车站，必须多方取得爆破的材料与工具，多方征集并训练爆破的人才，并尽可能组织专门的爆破部队，附属于游击兵团之内。

被服问题，每人每年至少要两套夏衣，一套冬衣，两顶帽子，一双裹腿，一条毯子，一个布制的干粮袋，在北方还要一件大衣。

解决的方法，一般不能依赖敌人，除了袭击敌之被服运输队之外，剥取俘虏官兵衣服的事是应该禁止的。为了顾到游击队的纪律，政府与游击区军事领导机关应该统筹发给。可以采用没收汉奸与向富有者募集的方法，但须注意不要弄错与不破坏统一战线政策。低级的游击队，不必有整齐的军服。

电话器材与无线电器材，低级的游击队可以不要，但高级的游击队是应该有的，这些东西之取得，除了缴获敌人的之外，正规兵团应给以帮助。

游击队中，尤其在游击根据地中，较好的医疗设备是不可少的。除了多方征取医务人员之外，药品的取得最为重要，部分的可以取之于敌人，主要的依靠募捐购置。西药难得时，土药也可用。

游击队的运输工具问题，是在北方发生的，这里一般不用肩挑，需要配备最低数目的骡马。小游击队可以减少，甚至不要；游击队就需规定一定的骡马数目。干部的乘马，中队（连）长以上凡有重要职务的，应准每人一匹，有时可两人共一匹，无重要职务的不给。

宣传器材是重要的，例如每个较大的游击队，都应具备油印机、誊写版、纸张等，以便印刷传单布告之类；又要有宣传队员使用的粉罐子、粗笔等，为写大字标语之用。在一个较大与较巩固的游击区内，最好能有石印机，能备简单的铅印机则更好。为了印刷内部的训练教育材料，油印机石印机等也是十分需要的。

此外如军用地图、望远镜、指北针等都是必须之物，一个能干的游击队，最好能有这些东西。

为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意义，国家最高军事机关及各战区司令官，应尽可能地设法补充各个重要游击区中为他们自己

所不能解决而又特别需要的东西。虽然如此，但仍须重复地说，游击队的装备问题主要依靠自己从斗争中解决，依赖上级的心理过重，势将减弱其坚决斗争的精神。

游击队的成分问题

这里讲的成分问题，是说的游击队的干部和兵员。

每个游击队都要同敌人进行长期与残酷的战争，故其干部应是勇敢与积极的分子，十分地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除这个基本条件之外，还须具备：（一）艰苦奋斗的作风，为部属与人民的模范；（二）接近民众，和民众打成一片；（三）善于团结干部和兵员，使内部融洽统一；（四）注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游击队的政治路线不弄错；（五）注意战略战术，使游击队多打胜仗。一个游击队能有一批这样的干部，它便是不能战败的队伍。不是每个干部一开始就要求他们具备一切条件，而是要多找本质上优良的干部，在游击战争中学习，逐渐锻炼起来，使之符合于这些条件。这种优良的本质，就是“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有了这一点，什么条件都可能获得，否则一切无从说起，选择干部时应加注意。此外，游击队的干部必须多数是本地人，因为他们联系民众，情况也较外来人熟悉。开始本地干部不多的状态，必须注意培养，用开训练班等办法使之逐渐增多，才能支持长期的战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不融洽现象，必须注意消除之。

游击队队员以容纳自愿的抗日分子为原则，强迫加入的办法是错误的。只要自愿抗日，可以不拘其社会成分，但须选择勇敢坚决的分子，方能经得起最大的困难，坚持长期的战争。惯于破坏纪律经

过教育而无改变者，不能长时间保留在部队里面，大量收留流氓兵痞的办法是不对的。有鸦片嗜好的必须戒除，不能戒除者也不应收留。保持队员成分的纯洁是游击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在民族的决死斗争中，民族敌人必然会利用一些民族意识极其薄弱的分子，经过他们的训练，派遣到游击区附近，乘机混入游击队，进行破坏的阴谋。游击队的领导者，应在依靠民众的基础上，从不断的教育中提高全体队员的民族觉悟与民族警觉性，防止破坏分子的混入，将已经混入的破坏者检举出来，这就是肃清汉奸的工作。对于汉奸分子及已经受到汉奸分子影响的队员，必须有分别地给予处置，让他们自由存在是危险的。在处置时，必须发动全体队员对于那些有真凭实据的汉奸分子发生仇视心理，用以提高队员的警觉性。如果在干部中存在着这种分子，对他们的处置更要慎重些与有方法些。在防止与肃清破坏分子时，不能离开在地方人民中的锄奸运动，因为地方上暗藏着汉奸分子，是部队发生汉奸分子的根源。

对于伪军的反正与土匪的投诚者，不论是个别的或整批的，都应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予以优待。但把他们实行收编时，必须加以考察，分清楚其中是有抗日的诚意者，或是别有企图者，以便分别处理之。

第六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问题

颇为繁复的组织问题已在上面解决了，接着要解决的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原则与军事原则的问题。

在第一章中已经提起游击战争的几个基本原则，其中说到游击

队须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与政治纲领，须依靠民众，须有组织性或纪律性，这些都是游击战争的政治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的实行表现于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故政治工作一般被称为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也就是游击队的生命线。

首先，抗日游击队（一切军队皆然）的政治工作须使“抗日”这个政治目的深入与巩固于一切军事政治指挥员之中，经过他们又使深入与巩固于一切战斗员中。不要以为既在抗日又名抗日游击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实则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是长期存在的。因为敌人的诱惑是存在的，游击队的困难是存在的，长期艰苦的战争中民族觉悟不深刻的分子可能动摇以至叛变。没有普遍深入的民族教育，不使人人懂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鲜明确定的政治目的，不使人人懂得为什么打仗，是不能使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巩固其抗战到底的决心的。这样鲜明确定的政治目的，须经过游击队教育游击区域的全体人民，使全体人民的民族觉悟程度随战争的持久而日益深刻，游击队的胜利才有保障。

执行对游击队及人民关于政治目的的教育时，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的政治纲领之教育，是伴随而来必不可少的。现在中国国民党已发布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亟应在一切游击部队与游击区人民中广为宣传解释，以求“抗战之必胜，建国之必成”。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政治纲领，也就无从更好地团结干部团结队员与团结人民。

这种政治目的与政治纲领之研究与了解，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目的与纲领的研究与了解，对于游击队（乃至一切军队）的军事干部尤为重要。往往有这样的军事人员，说是“不管政治，只管军事”，对于这些不明政治与军事关系之单纯军事头脑

的军官们，引导其了解二者的正确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一切军事都是达到政治目的之手段，军事本身也就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固然军事区别于政治，有它的特殊性，但不能割离于政治，把它孤立化起来。

在今天说来，因为世界已处于进化的新时代，今天的战争已经接近于最后的战争，这一点也是应该明了的。人类大多数（包括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在内）已经从事或正在准备伟大的正义战，反抗世界上的侵略者与压迫者，这个战争不管将延长多少年，但其接近于历史上的最后战争则无疑。经过这一场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之后，人类将出现一个历史上所无的新时代，往后将再不见有战争。我们所从事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就是这个人类解放战争的一部分，我们所求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是这个新时代的新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正确的观点是单纯军事主义者所不能了解的，如果部队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单纯军事主义者或战争绝对论的人员，是必需向之作解释的。

政治工作，除了普遍深入的宣传解释与坚持上述那个总的政治路线，即政治目的与政治纲领，使之贯彻于一切军事政治工作，一切军事政治人员与一切地方民众之外，它本身有三项具体工作：即对部队的政治工作，对居民的政治工作，对敌军的政治工作。对这三项工作的政治指导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与瓦解敌军。三项工作与三项原则之具体实施，详论之于《抗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中，这里只说一点概要。

革命军队是有纪律的，但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民主的。一切军队需要有内部的纪律，即下级服从上级，才能行动与作战，游击队亦然。但这种纪律须建设在一切部队成员的自觉性上，单纯的

强迫纪律是不能持久与有效的。革命军队因有公开的官兵的共同政治目的，也能建设自觉的纪律。游击队之纪律性较之正规军实际上要差些，然其要求自觉的纪律与能够建设自觉的纪律则一。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使一切部队成员自己觉悟为什么要战争与为什么要守纪律，才能把纪律提到高度，才能把纪律变为战斗力之组成部分，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而不是隔离官兵关系与上下关系的东西，如同强迫纪律实行的结果那样。基此出发，部队中应该废除打人与辱骂人的那种封建主义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是违反自觉纪律，降低战斗力，与破坏内部团结的东西，所谓军队中的民主制度，这是第一点。军队中的民主还表现在政治上的自由与官兵的同甘苦。革命的军队与游击队，给与一切部队成员以政治上的自由，不分官兵，凡关于民族解放的目的与方法，均不但容许而且提倡他们去思想、讨论、宣传、实做。这是军队中民主的第二点。官兵的生活不能太悬隔，尤其是游击队的官长大体上应过和士兵同一水平的生活，才能取得士兵的信仰，支持长期的艰苦的战争。绝对的平均主义是不正确的，但某种程度的生活上的平均，则是艰苦战争所要求的。这是军队中民主的第三点。凡此一切，都为达到“官兵一致”的目的，只有真正官兵一致真正内部团结的军队及游击队，才能具备最大的战斗力。

“官兵一致”的原则系就各个部队与各个兵团的上下关系而言，就许多部队与许多兵团的彼此关系而言，则为“我友一致”的原则。使全国几百万正规军与几千支游击队都能团结一致，在每个军队与每个游击队中间施行我军与友军正确关系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缺少了这种团结，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为达“军民一致”的目的，而施行的对地方居民的政治工

作，八路军有一套有名的办法，表现于他们所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中。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人民一点东西，不许怀私害公。”八项注意是：“上门板，捆禾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坏东西要赔，不当女人洗澡，不搜俘虏腰包。”这些纪律与注意事项，包括了达到官兵一致与瓦解敌军之某些事项在内，不限于为着军民一致，但主要的是解决军民关系，为争取人民与军队的团结一致而设的。过去的红军行了十年，现在的八路军还是这样，颇可为各军所采用，一切游击队更须注意之。有人觉得游击队在敌人后方长期生存是难于设想的，这是不知军民关系的看法。民众如水，军队如鱼，哪有有水鱼难生存之理？纪律不良的军队与民众对立，自己把水弄枯竭了，那就当然不能生存，一切游击队都应切实懂得这个道理。

瓦解敌军之原则须表现之于宣传敌军，优待敌军俘虏，与医治敌军伤员等工作上面，否则事实上巩固了敌军的团结，与瓦解之目的适得其反。游击队与一切抗战军队要争取最后的胜利，这一条原则的实行是不可少的。

第七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参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

1939



毛泽东在延安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1939年1月2日)

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蒋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的领导之下，在朱彭^[1]总副司令及各部各级长官与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在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揭穿了中国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国内某些守旧顽固分子的无耻造谣。此外，八路军的一部——后方留守部队，亦保卫了河防，现正准备配合西北友军，为反对敌人进攻西北而战。八路军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某些守旧顽固分子之外，是一致承认的。这在敌人方面，不但不敢轻视八路军，而且日益增长其畏惧八路军的心理的事实表现上，也

[1]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得到充分的反证。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地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与某些顽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认的。中外新闻记者、观察家、旅行家的详尽的或粗略的记载，早已连篇累牍。一切无成见的人，都愿意研究八路军的经验，当然不是偶然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八路军之存在及其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如果有人提出这类问题的话，那我们只有一句话答复：认为“无益”者，必是事实上不愿意抗战胜利者，只是直接帮助敌人的胡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

八路军有无缺点呢？不但有，而且多。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这是八路军的基本缺点，也是中国军队的一般缺点。因此如何加强技术装备以便战胜敌人，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严重任务。第二，八路军以善于游击战与运动战出名，

但一部分干部对于抗日的战略战术之了解与应用尚感不足，一般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现代新式军队的管理与指挥，至今还缺少初步的研究。若干工农出身的干部，还没有解决提高文化水准至必要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八路军当前的第二个任务。第三，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是达到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八路军干部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尚感不足，协同友党友军一道工作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使之利于抗战，在某些地方还做得差。因此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成为重要的任务。第四，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许多成绩，但对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争取蒙伪军的成绩较大，但还须更进一步。在这里，搜集与研究敌伪军的全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没有达到需要的程度。第五，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八路军某些部分的注意，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如何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上，不但注意执行正确的地方财政经济政策，如像过去已经实行了的，而且提出与实行在不妨碍作战条件下，由军队本身亲身参加生产的问题？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

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以上增加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其他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将从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进步而克服之。

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也属需要。《八路军军政杂志》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

A vertical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 in bold, expressive black ink on a white background.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or semi-cursive style. From top to bottom, the characters read '八路军军政杂志'. The '八' is at the top, followed by '路' and '军' stacked vertically, then '军政' side-by-side, and finally '杂志' at the bottom.

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一文题写
的标题。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月5日)

日本帝国主义目前的主要目的，第一是消灭国民党的军队与政权，第二是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蒋介石最近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的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又要限制我们。蒋的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须发出一个指示电。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汪精卫叛国投敌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月12日)

—

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二

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磨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等电^[1]

(1939年1月13日)

周、秦、何，并告朱、彭：

八路军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不应是东三省、察哈尔、热河、冀东，因为大部队不能去，也无法去上述地区。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发展；但在目前磨擦很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

毛 王
十三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八路军今后发展主要方向问题给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并告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题词

(1939年1月15日)

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

毛泽东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毛泽东

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的题词。

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1]的信

(1939年1月17日)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2]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般〉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

[1] 何干之（1905—1969），广东台山人。当时任陕北公学的教授和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

[2]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1]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敬祝努力！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1] 指何干之著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三民主义研究》。前一本书于1939年3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后一本书于1940年8月由新中出版社出版。

敬爱的同志：

你的信我已收到，很高兴。你问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这方面过去也很多，正面有陈鹤良先生的《中国民族学研究》，反面有《民族史，民族派别，民族的形成，民族的分化，民族的融合》等书。我则有《东北民族史》，《中国民族学研究》，《材料》，和《古今民族学》。同时也有不少文章，今录一些供你参考研究。

你研究蒙古族源流，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而以语言文字，特别是研究近代史，所作多：甚好。

你研究民族史的三个阶段，从历史对称，大致第二个阶段，从民族斗争中证明民族解放与民族投降两个阶段，进行对称，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朝，清末一并归于一个阶段，这样民族解放斗争以统一为一章，对称，是和校印的，但尚需再加修改。

你对我的这些意见，我深感赞同，并希望你继续研究（在中国民族史方面）民族的形成、发展、变化、民族的融合、分离、民族的斗争、民族的解放等，同时希望你写一本。

祝你努力！

毛泽东
一月七日

毛泽东致何干之的手稿。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作关于 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1]

(1939年1月18日)

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难增长；国际上给中国更多的援助。目前军事、经济、国内矛盾、国际环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难，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停止其进攻。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而进步一定压倒困难。近几个月来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有利。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作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报告的一部分。

抗战与外援的关系

——《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

(1939年1月20日)

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民主国家如英、美、法有广大民众，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前进人们，都是同情中国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除了一部分顽固党反对中国抗战。关于顽固党，有些是顽固性成一向同情日本军阀的；有些则是不明白中国抗战的必然规律，经过艰难路程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个必然规律，因而由悲观而失望而不愿意援助中国，这类人，我想也会有的。倘能因我的书给予这类人以明白事情真相的机会，当然是我的希望。至于大多数同情中国抗战的人们，也许至今还有若干人同样不明白中国抗战的真相，虽同情抗战也存在着苦闷，这类同情的苦闷，尤其是我们应该为之解释的。我的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八年五月间作的，因为它是论整个中日战争过程的东西，所以它的时间性是长的。至于书中论点是否正确，有过去全部抗战经验为之证实，今后经验也将为之证实。抗战在武汉、广州失守后正在向着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中国不利于日本的新的阶段发展，这个阶段就是敌我相持的阶段。敌因被迫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战略保守，我因坚决抗战与力量增加而结束自己

的战略退却（主力军，不是游击队）转入战略相持，这种局面快要到来了。新阶段中，我之全部任务在于准备反攻，这种准备时间也许是长的，但我们有全部勇气与精力来进行这种准备，一定要把也必然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英美诸民主国尚存在有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意罗斯福^[1]总统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2]对于西方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张伯伦对于日本也至今还保存着怯懦心理。我希望英美民众积极起来，督责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政策，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身。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

[1] 罗斯福（1882—1945），当时任美国总统。

[2] 张伯伦（1869—1940），当时任英国首相。

给鲁迅艺术学院文学团体 “路社”的信

(1939年1月21日)

路社常务委员会诸同志：

信件收到了，谢谢你们的好意。

二月四日已约定别的集会，不能来你处，请加原谅。问我关于诗歌的意见，我是外行，说不出成片段的意见来，只有一点，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这是现在的缺点。这一点是否有考虑的价值，请你们斟酌一番。此复。

敬祝

努力！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给周扬^[1]的信

(1939年1月22日)

周扬同志：

此稿^[2]李六如、和培元^[3]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

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

此致

布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时

[1] 周扬（1908—1989），湖南益阳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2] 指《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的初稿。该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亲自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并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3] 李六如，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和培元，当时是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给杨令德^[1]的信

(1939年1月22日)

令德先生：

十二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2]，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

此致

抗战敬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1] 杨令德(1905—1985)，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人，当时是大公报派驻陕西榆林的记者。

[2] 指杨令德的外甥袁尘影1938年年初曾误被关押一事。

在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上的讲话^[1]

(1939年1月25日)

今天开边区农产品展览大会，意义是很大的。现在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前方要有将士的英勇抗战，而这些将士们要吃饭，要穿衣，这就要依赖后方努力生产来解决。边区在过去生产运动中已有了一些成绩，这次农展会就是成绩的代表。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打下去，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在我们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及部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

[1] 1939年1月25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举办的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并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月26日)

一

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二月一、二、三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并使各单位有余利以提高其兴味。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运动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四、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等。

二

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

[1] 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生产运动与东北抗日联军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生产运动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听取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子昆、赖传珠、袁国平电^[1]

(1939年1月27日)

你们应将新四军一年余作战经过、胜利及艰苦奋斗的材料，整理电告重庆及此间，以便发表，并痛驳四军作战不力之说。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驳斥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作战不力致周子昆、赖传珠、袁国平电的主要内容。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 总结时的讲话^[1]

(1939年1月27日)

检查工作会议是一种领导方法，是最具体地学习领导的方法。通过检查工作会议，团结了干部，发扬了优点，克服了缺点。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

[1] 这是毛泽东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等电^[1]

(1939年1月27日)

周、秦、何、董：

这是对新四军之可能的新的压迫之准备，望将新四军作战经过及胜利材料广为公布，并痛斥新四军游击不得力之说。

毛 王
二十七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针对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给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董必武的电报。

给炮兵团全体官兵的信

(1939年1月28日)

炮兵团全体官兵同志们：

八路军炮兵团成立已一周年，盼望你们努力政治军事学科术科之学习，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有力兵团，达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目的，为民族争光荣，为八路军争模范！

毛泽东

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1]

(1939年1月28日)

我来讲一讲目前的时局。因为同志们分散在各地，对整个情形不十分清楚，趁此机会，就和同志们谈谈。

我们根据六中全会的报告与决议来看问题。六中全会说：“抗战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在去年十月上半月讲的，到现在已经有了三个月，事情怎样呢？去年十月三十日，蒋委员长发表了告国民书，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驳近卫^[2]的文章，驳得很好，又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3]，这些都说明了是要坚持抗战这一条，证明了亲日派力量不能动摇抗战。在过去，第一个问题是打与不打的问题，而在友党里曾有妥协倾向，酝酿着和平，这就很困难。固然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是要打的，不妥协的，然而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在全国算来还是少数，统一战线里是小股东，我们单独打日本，是困难更甚的。

[1] 这是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讲话的一部分。

[2] 近卫，即近卫文麿（1891—1945），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任日本内阁首相。

[3] 汪精卫（1883—1944），浙江绍兴人。曾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1938年12月19日，逃往越南河内，同月29日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现在国民党有了这些行动，确定了坚持抗战的方针，在这个“打”的条件下，什么文章都容易做了，这是好事，是统一战线中进步的东西。

现在讲战争形势。

去年十月我们估计到，武汉、广州失守后我们将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对于困难，同志们都知道的，由于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敌人分割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等等增加了；至于进步，主要的表现在坚持抗战，在两次参政会里克服了主和派。那末进步能不能克服困难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只有我们更加进步，更加努力克服困难，才能使战争转到新阶段。六中全会提出的中心任务，也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增加力量，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现在已经证明它的正确，以后也将证实这一点。

我们讲敌人进攻还未停止，武汉、广州失守后这三月来，在正面敌人没有大举动，但在侧后敌人是打得很凶的。有人说我们估计不对，敌人进攻已经停止了。我们不这样说，也不这样想，因为敌人还会进攻西安、兰州、长沙、南昌、梧州、衡州等地的，我们一定要准备着。虽然到我讲话这时止，我的话还未证实，不过我们还是准备的好，没有准备就会损失更大。为什么敌人还会进攻呢？第一，他不进攻，法西斯军阀就会马上垮台，而它的野心很大，不但要进攻全中国，还要去打南洋，缅甸、安南^[1]、印度也要去打。在中国，它反对蒋委员长，反对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它的计划，它是要想达到目的的，但是否可能达到，就要靠我们

[1] 安南，今越南。

的努力程度来决定。

我们说敌人进攻会停止，但是否能够停止呢？我们说，一定要停止。日本要灭亡我们，我们要它停止，但究属如何是要根据敌我两方面的情形来说明的。由于敌人国小，人少，兵少，现在战线又是这么长，南至广州，北至包头，它本来就有兵力不足的弱点，再加上这个兵力分散，强兵也便变弱了。它这个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是个不治之症，它的力量不能允许更多出兵中国，因它另外要防强大的苏联，又有英、美、法与它为敌，还要防范国内人民与殖民地人民，至多能拿三分之一的力量用到中国。现在听说已来了一百万，将来至多再来一百万，而不能再多了。这样，我们天天在正面打，在敌后打，主力军打，游击队打，杀伤它的兵员，疲惫它，使它的兵力更减少，更分散，弹药给养消耗更多，力量削弱了，它就不得不停止进攻；另一方面，我们中国更强了，能打游击战，也能打运动战，加上其他各方面的进步，现在虽未能停止日本的进攻，但是一定能够使之停止的，我们要用一切方面的努力去停止它。

至于我们估计，在敌后能大大发展游击战争，并能建立根据地，现在已证明了，以后更将证明。同时，我们又指出，游击战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要看到敌人是要回头进攻的，在那时，游击战争更会困难的，我们要准备着这个困难的到来，以战斗的姿势还击它。一定要准备到这一着，才可避免“措手不及”的遭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说会发展的，但是有困难。国民党是在进步，但在这进步的河流中有一股逆流。三月来证明了什么呢？顽固分子的汪精卫已变成了汉奸的汪精卫，当然他此后还会掀风作浪的。国民党已永远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这是好的；现在各地前线将领，陈诚、李宗仁、白崇禧，我们的朱、彭总副司令等，都打

电报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通缉，但现在尚未颁布明令。我们认为这个通缉令是必要的，因为他已做了汉奸，和敌人搞在一块了，虽然说现在不一定能捉得到，但到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的时候，怕他逃到哪里去？有人说，他会到德国、意大利去，然而这些世界法西斯都入黄土塋中的时候，他还有何处可逃？总之，只要他在地球上，最后一定捉得到的。

我们说，整个进步中有部分的退步，因这退步，所以有磨擦，不仅有而且比前更厉害些。这退步的力量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主张亲日反蒋反共，以汪精卫为头子的，现在已经走了一些，但还有党羽存在；另一派是顽固分子，主张所谓抗日拥蒋反共，这种人边区周围很多。他们说：现在，先反共后抗日；敌人来时，先抗日后反共。在前方，听说还有所谓抗日与反共两条并进的。这亲日反蒋反共的一派，下述几个大的具体事实是“贯彻”他们的“主张”的：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曾提出有反蒋内容的提案；说长沙大火与蒋委员长有关系，借此以骂蒋委员长；他们又侮蔑游击战争为流寇，他骂共产党同时也骂了蒋委员长，因为蒋委员长与共产党同样主张在长期抗战中须要发展游击战争的；还有汪精卫的应声虫张君劢等，写文章说共产党怎样不好啊！八路军、新四军怎样要不得啊！陕甘宁边区又是如何如何！总之，他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军、政、人民施行其最卑鄙的侮蔑。至于亲日，在他未有开小差前，不明显地讲，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隐隐约约地总有些不愿抗日、与日言和的意思。另一派，在西安以及邻近边区等地，更甚于前地进行他们的为敌所欢的工作，这就是不顾大局靠磨擦吃饭的一批家伙。

这股逆流是退步，统一战线的阵营里有进步也有退步，但进步

和退步两个人打架哪个人打得赢呢？我们的回答是进步的趋势能够压服退步。

我们要懂得，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磨擦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磨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磨擦，但一有两个，两个手掌就拍得响了，磨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磨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存在。因为有不同，所以有磨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磨擦减少。

有人硬要磨擦一下，那末我们应该怎样呢？在六中全会里我们曾说过，对无理的磨擦我们是决不容忍姑息的，我们要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这后一条原则是很重要的，比方我在这屋子站着，他把我挤一下，我若让他，退一下，这样一步一步会挤得我无容身之地，所以，他挤来，我们反挤一下，挤回他到原来地位，他要磨擦，我们就反磨擦。他们说，陕甘宁边区是伪政府，要取消晋察冀边区，还要取消共产党，要八路军、新四军到沙漠地带去，等等，如此这般花样多得很，对这一切，我们都是反对的。他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大搞其磨擦，占村子，他占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把一个还我们，我们也就原数奉还；他要捉人，他捉二个，我们捉他四个，他把我们关三天，我们就关他六天释放。为什么我们要加倍地对付他呢？就是因为他先犯了我，他理屈，要惩罚惩罚他，这就是反磨擦。要亲爱，要团结，但要站起来，否则就会有“亡党之痛”。现在磨擦增加了，以后统一战线会是怎样呢？我们是一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抗日战争中也是可以坚持的，这在六中全会报告里已经指出了的。亲爱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原则，然而更要反磨擦这一条，没有这一条就不

行，只有坚持这一条原则，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现在国民党正在开五中全会，我们估计它的结果不会坏的，但同样不应忽视磨擦还是可能有的。

上面讲的是中国方面的时局，现在讲日本方面的。

日本换了内阁总理，为的是现在要用新办法，就是全国总动员。这事证明了现在它的老办法不足用了，表示着它的困难的显著化；另一方面，又证明着它对中国将会更疯狂地进攻，并准备着进攻世界。它在“骑虎难下”的形势下，不得不来一个全国总动员。

日本的困难：在军事上，表现在它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经济上更形枯竭，现在出口货少了，因为军事工业增加；相反的，进口货比以前更多了，因为要大批地制造军需品。过去日本货是最便宜的（因为它剥削工农大众是最凶的），可以去换些外国货，现在少了这一条件，向外国买原料就要用现金，而日本的存金不多，况且在一年多的侵华战争中又用去了将近九十万万的战费。在外交上，更表现着孤立，英、美、法曾向日本提出照会，问它为什么破坏九国公约^[1]，这件事也是武汉、广州失守后发生的。现在英、美正在商量，要用经济制裁去惩治它一下。过去美国有中立法，这中立法对中国不利，反而对日本有利。现在日美关系搞得不好，因为日本要独吞，英、美在华利益被削弱了；同时，因为英、美与中国重洋相隔，加了很多运费，货价高于日本，就不能与之竞争；而且现在日本借口军事关系，不准英、美商船在长江等地航行，英、美在华

[1] 九国公约，是1922年2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公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等共同侵略中国的原则。1937年11月九国公约缔约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日本拒绝参加。

的商务利益几被尽夺了。现在日本花言巧语地说退回租界，实际上要把英、法的租界变为自己的占领地；它还企图打南洋、安南、澳洲等地。日本帝国主义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它的朋友只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英、美、法等民主国家都不喜欢它，苏联就更不必说了。

我们去年十月说，日本现在尚未停止进攻，但是一定会停止的，并指出使之停止有三个条件，上述日本的困难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国际上对我们怎样呢？在去年我们指出，欧洲问题与亚洲问题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同，过去英、法在欧洲向希特勒步步退让，而对中国有些不同，现在已经证明了。英、美借钱给我们，这是好的，开了一道门，将来就更有路可走；但是否能大帮助我们？不会有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有限制的，当然我们不是靠国际“吃饭”的，应该把主要点放在中国。

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是法西斯国家，另一类则是民主国家，这两类国家的矛盾一天天尖锐化起来。现在西班牙政府军更危险了，德国要求收回旧殖民地，意大利企图夺法国的突尼斯等地，更接近于大国间战争的危机了。现在已经开始了世界大战，过去的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法西斯国家打弱国小国，将来会和大国打的，但是到底哪一天打，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希望早打呢，还是如何？现在打起来，固然在某些方面是好的，譬如打击了西方法西斯，就是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但这是间接的，所以能晚打那更好，英、美等民主国家能更多地直接帮助我们。苏联现在也不愿意打，如果再隔几年，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更强大了，成为一个使法西斯闻之裂胆的国家，那末，这对中国，对世界是更有利的。世界一定会打更大规模的战争，但何日爆发，是无法占卜的。

关于目前的战争局面与政治形势就是如此。



陕甘宁边区的前哨。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讲话^[1]

(1939年1月至2月)

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如民权主义，别的地方很少，民生主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在全国坚持抗战，开参政会等等，在实行着三民主义，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坏事有人反对，好事也有人反对，那末怎样断定事之好坏呢？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凡

[1]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陈绍禹）、洛甫（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本篇一是1月17日，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1月18日下午，毛泽东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三是2月4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的讲话的一部分。

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所反对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们要努力的干。

要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国防教育，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

二

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敌人困难的增长；国际上更多的援助。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三

“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溶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溶化的！



1939年年初，经人民普选，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毛泽东到会讲话，提出边区建设的方向是要成为“民主模范”“抗战的堡垒”。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合影。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2月1日)

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问题，我们不能让步，我们必须坚持一定的立场，这一点请林老告知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等。军事区域，根据现在情况决不能答应向北发展，向华中发展问题不放弃，但暂不提。陕甘宁边区至少坚持二十二个县，边区政府主席不许派人来担任。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1]一文 给陈伯达^[2]的信

(1939年2月1日)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3]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夜

(一) 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

[1] 《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是陈伯达写的，1939年、1940年陆续发表在《解放》第八十二、第一〇二和第一〇四期。

[2] 陈伯达，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3] 赫拉克利特（约前540—前4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哲学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列宁曾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 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认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 “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 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 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以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 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 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 “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

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 “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为杨海泉题词^[1]

(1939年2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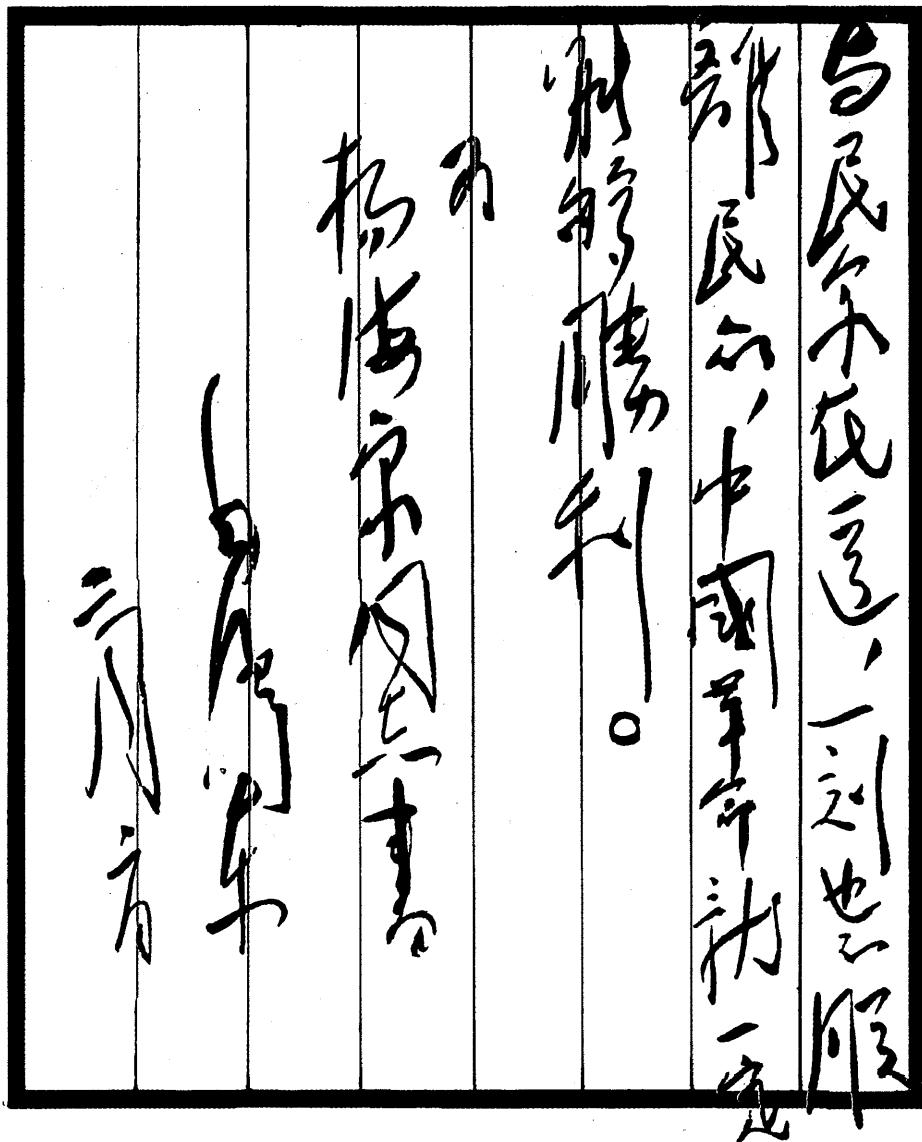
与民众在一道，一刻也不脱离民众，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

为杨海泉同志书

毛泽东

二月二日

[1] 这是毛泽东为抗大第五期学员杨海泉所写的题词。



毛泽东为杨海泉的题词。

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2月2日)

在我们面前摆着三条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二百万居民，还有四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二百零四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四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工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各机关工作都很忙，部队在战斗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的环境，但这与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

[1] 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作题为“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洛甫（张闻天）、陈绍禹（王明）等出席大会并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失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办合作社，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生产运动，要解决陕甘宁边区二百零四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还包括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团结起来的意义。工农商学兵团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反对投降主义^[1]

(1939年2月5日)

讲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方面说要把共产党溶化，共产党方面也有人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没有区别，所以不要共产党，因这两方面的意思有些相近，都不要共产党，所以拿到一块儿讲。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国民党要溶化我们，我们就被溶化了吗？不能，绝对不能，那是投降主义。二中全会提出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又提出反对投降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点是不能忘记的。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记取陈独秀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反对政治上

[1]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逃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发表公开叛国投敌的艳电。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然声称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39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图为根据地军民集会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又团结，又斗争^[1]

(1939年2月5日)

怎样巩固统一战线来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呢？要用两条战线的斗争。

一条是反对关门主义，要跟从前的仇人讲亲爱，跟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统统团结起来，只要他们愿意的话。我们这里有些人，生怕资产阶级的垃圾沾上身，说他们要不得，跟他们不要讲亲爱，不要讲团结，以为自己关起门来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抗战就可以胜利。这种人的思想是真正地要不得，我们要反对，因为关门主义是妨碍团结、妨碍统一战线的。另外还有些人，思想很糊涂，是“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家伙，这种人我们也要反对。团结的敌人便是破坏团结和不讲团结。斗争好比火线上打仗一样，打击了不讲团结的关门主义，又打击了吃磨擦饭的顽固分子，这是一条战线。

再有一条战线，还要打击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借讲“统一”要把共产党取消，并到国民党里面去，他们常说“纳共产党于国民党之道”。可是，取消共产党，对实行三民主义是有损无益的。我们对于实行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是最坚决的，对民权主义也实行得最彻底。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演讲的一部分。

陕甘宁边区就是一个例子，最近有一个美国记者参加了几天边区的参议会，他说这里的民主比美国高明得多。在全国，就是我们这里实行了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其他地方，嘴里说要实行三民主义，实际上只有一民主义（抗日），而且实行得还不大好。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我们有百折不回的精神要把三民主义实行到底。人家说不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你说可以可以，这就不对，是投降主义；人家说不要共产主义，你就唯唯诺诺，这也是投降主义。在现在，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坚决的实行者；在将来，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无条件的实行者。

统一战线一方面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们在学校里，一个人自身也有统一与斗争，自己犯了错误，要克服错误，不是要斗争吗？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父子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有统一与斗争。一方面，父爱子孝，君明臣贤，这是亲爱、团结，这就是统一；另一方面，子劝父过，臣谏君误，这就是斗争，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说服教育。这一切，都说明了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物皆然。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那他就还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两个基本原则，那末这两者是不是半斤与八两呢？或者说斗争更重于统一呢？回答都是否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便是统一，这就是说要跟朋友讲亲爱、讲团结、互相帮助等等；但还有一个原则是斗争，那就是劝解、说服、教育等等，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原则。那末为什么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名词里加上“斗争”二字，而变成“抗日民族统一斗争战线”呢？这点我想同志们都知道，有些人不会像我们这样理解“斗争”这两个字的含义，他一见有斗争就会

被吓退了；同时所谓斗争也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斗争，绝不是我们一见朋友，第一句讲“我跟你团结”，第二句就讲“我跟你斗争”，事实上这是不必要的。但是无论如何，斗争是一个原则，是谁都不能也不应忘记的。在抗战期间是这样，在抗战后又会是怎样呢？这要看人家怎么样，人家拿了机关枪对准我们，拿了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是不是还要说“我跟你团结”“我跟你亲爱”呢？同志们，在那时我们只有拿起机关枪和刀子去进行斗争，这个斗争绝不是用说服教育就可以担当起来的。在那时，就是斗争第一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一种事物是不包含斗争的，斗争的形式不是仅有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

为《新中华报》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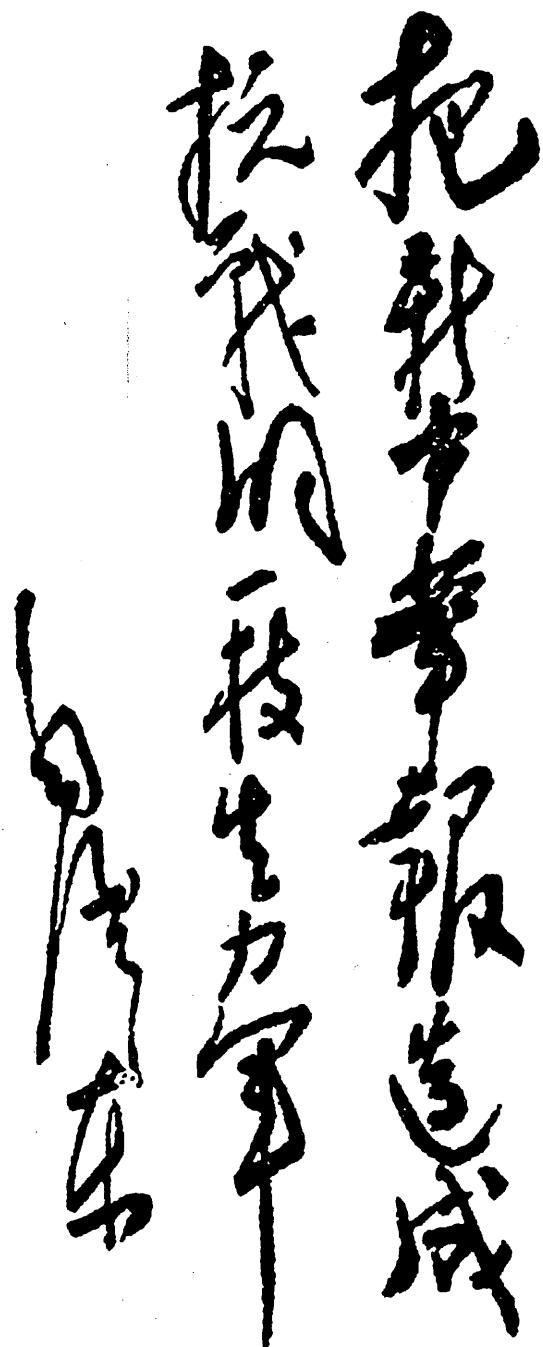
(1939年2月7日)

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枝生力军。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际所写的题词。

毛泽东为《新中华报》题词，内容为“新闻报捷威震全球”，落款“毛泽东”。



新闻报捷威震全球
毛泽东

毛泽东为《新中华报》的题词。

为《新中华报》题词^[1]

(1939年2月7日)

多想。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华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际所写的另一幅题词。



毛泽东为《新中华报》的题词。

在延安职工纪念二七罢工十六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2月7日)

一、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斗争历史；二、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历史任务，在目前就是抗日救国；三、中国无产阶级有光明的前途——社会主义。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职工纪念二七罢工十六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2月8日)

国民党对我们的磨擦是取消我们已有的力量。现在我们党内许多党员对国共两党的区别存在模糊认识，不懂得我党力量增强才能巩固统一战线。要国民党进步没有斗争是不行的。今天对党内教育，必须注重斗争是不可少的，要教育党员如何团结同盟者及如何与同盟者斗争。

[1] 这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王稼祥关于华北华中磨擦问题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

(1939年2月10日)

敌人正在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冀中、冀南、冀察晋、晋东南等区，而我抗战阵线中，又因鹿钟麟、沈鸿烈之极端错误行动，引起严重的磨擦与纠纷，使华北抗战遇到莫大困难与危险。因此，共产党中央及八路军领导者，提出下列主张，一面与蒋及各将领谈判，一面实行坚持自己之立场：

(一) 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磨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钟麟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石友三副之；决不能任鹿胡干，危害抗战。

(二) 冀、察、鲁三省，为山西、中原、西北之屏障，若无八路军在三省英勇抗战，收复失地，中原、西北均危，山西现状亦不能保。为发展三省之游击战争，巩固三省之抗日根据地，应将山西八路部队，多开一部分赴三省，两三省八路部队，则决不能减少；否则只于敌利，于我不利。且八路军在三省扫荡伪政权，恢复中国政权，位于抗战之最前线，成绩卓著，功在国家，决不能听鹿钟麟等之昏乱报告，汪精卫之汉奸胡言，而自乱步骤，危害抗战。

(三) 敌后抗战形势，证明建立边区是正确的，维持原有省界是

错误的。因此，冀察晋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但决不应取消，相反的，应当在山东及其他地区，依照战略形势划分新的行政区域。

(四) 使敌后军、政、党、民不一致，使指挥间不统一，限制排挤八路军等之政策，是错误的，是对抗战有害的，长此下去，势将引导失败。因此必须加以纠正。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五) 当敌人进攻，我军血战之时，忽闻要取消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冀察晋政委会，实使抗战将士，敌后民众闻之愤慨。影响甚大，决不能从。

(六) 政府发饷甚少，八路军及游击队不能不就地筹粮。人民拥戴，踊跃输财，有利于国，无害于民。今后仍应如此，决不能枵腹作战。

(七) 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

中央书记处

为冯福新题词

(1939年2月11日)

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二者不可缺一。

冯福新同志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

屋急勿停三向饭
其忙作一仰之
不缺一。
冯福新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毛泽东为冯福新的题词。

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电^[1]

(1939年2月12日)

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议长勋鉴：

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

毛泽东

陈绍禹

[1] 这是毛泽东和陈绍禹（王明）联名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的电报，表示因事不能前往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

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1]

(1939年2月16日)

当我们听到苏联红军二十一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感到有一种伟大力量站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面前，这个伟大力量伸出他的友爱之手，愿为我们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后援，这个伟大力量就是苏联的红军。苏联红军经过二十一年的锻炼，他的陆军、空军，还加上海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在英明领袖斯大林同志与统帅伏罗希洛夫^[2]同志领导之下，由于他是工农人民的军队，由于他具有坚强的技术装备，深厚的军事素养，正确的政治工作，不但早已成为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柱石，而且早已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中坚力量，成为全世界任何真正愿意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武装部队的模范。在这后一个意义上，我料想苏联红军的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苏联的每一个公民，全都知道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现在进行的战争是什么性质的战争，这个战争是在何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但这个战争又具有何种的光明前途，他与苏联及全世界又有何种的密切关系。反过来说，在我们中国，不但八路军、新四军，而且全体抗日军人，无不懂得苏联红军是中国的好

[1] 2月23日是苏联红军建军纪念日。这是毛泽东为苏联红军建军21周年纪念应苏联《真理报》征文而撰写的文章。

[2] 伏罗希洛夫，苏联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苏联元帅。

朋友，无不知道苏联是最切实地援助中国抗战的，尤其是苏联红军战斗的经验教训足为中国军队与中国军人所取法，使我们懂得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军队也要变为政治上具有正确方向的军队，也要逐渐具备新式的技术装备，近代化的军事素养，与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中国军队有许多长处，这些长处在十九个月抗战中已逐渐引起了敌人的惊叹，引起了世界的赞美。中国军队必能在长期抗日战争中锻炼自己，成为全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有力的方面军，为了驱逐日寇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也为了援助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但一般的中国军队，由于历史原因，至今还保存着许多缺点，重要的是政治素质不完善，新式技术不足，近代化的军事素养不足，尤其是政治工作之不足与缺乏正确方针，这些都是要向苏联红军学习的。谁都知道，中苏两大民族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上，十多年来就结成了密切的关系。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苏联及其红军援助了中国的北伐战争，于今又为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而奋斗。当此抗日战争处于新的困难情况面前的时候，中苏友谊关系是应该更加增进的，中国军队与苏联红军之间的精神联系是应该更加密切的。大敌当前，中苏略同，正是两大民族两大军队共同奋斗的时候了。不管法西斯国家如何地加紧侵略中国，如何地准备进攻苏联，如何地危害西班牙人民^[1]，以及如何地企图发动各大

[1] 指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1936年2月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国会选举，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获胜，成立共和政府。同年7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了内战。世界进步力量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组织国际纵队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英、法政府在“不干涉政策”名义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封锁。经过三年苦战，1939年3月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沦陷，共和政府失败，佛朗哥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统治。

国之间的再一次惨战，但其前途是可以预断的，最后胜利的决不是侵略者。中国、苏联、西班牙人民，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者，将夺取最后的胜利。当此苏联红军二十一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以中国人民与中国军队之一员的资格，谨向苏联人民与苏联红军致以反法西斯的友谊的敬礼！

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1]

(1939年2月18日)

一、敌军战斗力较前大为减弱，政治情绪更坏，以后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当场释放，多加宣传优待，严禁枪杀及其他侮辱行为，在各后方训练之俘虏可酌情处理，如不妨碍军事秘密亦可释放，借此降低日军之作战决心而动摇其军心，以利于粉碎敌之进攻。

二、据说日军多数部队中国人占三分之二，日本人仅占三分之一，运输队则全属韩人，是否属实请就地调查电告。

毛 王 谭

十八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谭政联名给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的电报。

各级政治机关主要工作者必须是党员^[1]

(1939年2月19日)

部队不断扩大，新的杂色部队被收编，可能有许多政治干部不是党员，如此将使八路军优良政治制度的传统难于保持，党的领导及其政策的执行更无保证。以后无论何项性质之部队，一经编入八路军建制，必须从中建立党的组织，其指导员、教导员及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者必须是党员，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宁缺毋滥。

毛 王 谭

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给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各师、军区、山东、河南、第三五八旅、陈士榘支队，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的电报。

致各部队电^[1]

(1939年2月19日)

应严密防范日军奸细和国民党特务混入我党我军。要求各部队审查人员，纯洁内部，加紧保密教育，加强锄奸工作。

毛 王
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就保密工作和锄奸工作给八路军各部队的电报。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1]一文 给张闻天的信^[2]

(1939年2月20日、22日)

伯达^[3]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4]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

[1] 《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毛泽东在信中将它称为《孔子哲学》，是陈伯达写的，1939年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六十九期。

[2]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毛泽东写给张闻天的这两封信的手稿，抬头现已缺损。

[3]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4] 参见《论语·子路》。

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二) “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三) 中庸问题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

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2]，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3]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4]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

[1] 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2] 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3] 朱熹（1130—1200），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南宋哲学家，编注有《四书集注》等书。

[4] 参见《四书集注·中庸》朱熹注。

很好地解释一番。

(四) 说孔子“患得患失”时不必引孔子做鲁国宰相“有喜色”一例，因为不能指出当做了官的时候除了“有喜色”之外应取什么更正当的态度，问题在于那个官应不应做，不在有无喜色。

(五)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1]，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六) 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

[1] 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七) 此外，文没有一个总的概念，使初学看了觉得缺乏系统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对于孔子哲学加以概括的说明，指出其根本性质则更好。我看过的伯达的几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点。

以上几点并未深想，只是随说一頓而已。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夜

—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

(一) 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

(二) 在最末一段前我加了一句，似更醒目。

(三)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1]引了章，梁，胡，冯^[2]诸人许

[1] 指陈伯达写的《老子的哲学思想》和《墨子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1939年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六十三期、第六十四期合刊。《墨子哲学思想》1939年、1940年陆续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八十二期、第一〇二期和第一〇四期。

[2] 章，指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梁，指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胡，指胡适。冯，指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人。他们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老子等两篇已发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夜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2月中旬)

一

现在的企图是在政治上拉拢国民党，建立傀儡政府，在军事上截断国际交通。蒋介石所谓抗战到底是只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实际上是承认割让东北。现在国际上和平阵线尚未形成，民主国家与法西斯谋妥协，这是很大的国际形势变动。

二

过去党内一贯忽视妇女工作，主要由于没有一些经常做妇女工作的干部，今后负责同志要经常注意妇女工作。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陈绍禹关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李富春关于妇委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在延安召开的第一次 技术人员晚会上的讲话^[1]

(1939年2月25日)

今天开会，就是说明技术人员在政治上的地位，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是以政治管理技术，但是没有技术的政治是空的。一些人轻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一些技术人员自己也轻视自己的工作，都是不正确的。没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建设新中国。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第一次技术人员晚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

(1939年2月28日)

(一) 和战问题。我们所了解的战争的长期性，包含了不战不和的情况。目前和战问题上战是主要的，因为日本进攻中国是坚决的。战争的发展是曲线的。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是一个大帝国主义的幻想。最近江浙资产阶级主和，国民党也有一些人赞成“东亚新秩序”。在和战问题上存在着两面性，但战是主要的。

(二) 军事问题。日本执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方针，对中国一方面是政治诱降，另一方面是军事进攻，用军事行动来达到政治目的。日本所占领的中国的地区都是军事要点，以压迫中国投降。最近日本扫荡华北，是为肃清共产党的力量，做进攻西北的准备。

(三) 政治问题——统一战线。在战争条件下中国是一定要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是错综曲折的、不平衡的，表现出进步与不进步的两面性。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曲折的，不是直线的。国民党中央主张联共同时又防共的占多数，我们要增加左翼，争取中间派。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我们的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要我们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一部分。

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

(四) 结论：还是六中全会后的方针，援助蒋介石团结全民族，同时发展自己的力量，防止他们的动摇。只有斗争才能达到抗战到底的目的，妥协反共危险是可能克服与阻止的。我们的口号是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执行巩固华北的方针，现在敌人要巩固华北，我们也要巩固华北，这是一个大的斗争。目前中心任务仍要宣传六中全会，对内加紧教育。

和美国记者罗伯特·马丁的谈话^[1]

(1939年2月)

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不单需要一个民选的议会，并且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实行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且必须减轻人民负担，减税减租，减利率，使人民乐业，努力生产。

日本现在有骑虎难下之势，准备继续进攻西安等地。估计抗战第一阶段将结束在西安的失守，第二阶段是日军困驻于城镇的时期，第三阶段是驱逐日军出中国的时期。游击战争将继续发展，为驱逐日寇到城市里去，汉口、上海、南京、北平等地方，让他在那里住上三年到七年。他们不得食、不能通商，那时把他们赶回东京去。

共产党今日的纲领与三民主义没有基本上的冲突，但有不同点，废除私有财产制，是国共两党纲领的基本异点。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末，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

[1] 1939年2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谈了两个多小时，当时请抗大校部交际科的吴青做翻译，马丁作了英文记录。事后马丁根据记录用英文写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43条，再由吴青译成中文，经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交给毛泽东审阅。这是谈话的一部分。

和鲁艺美术系 两个申请人党教师的谈话^[1]

(1939年2月)

沙皇俄国是压迫革命党人的。列宁就曾充军到西伯利亚。但列宁在西伯利亚还可以读书、写作。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更野蛮更残酷的办法，叫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你们申请加入共产党，要准备过一辈子艰苦奋斗的生活，要准备必要时牺牲自己的生命！

[1] 鲁艺美术系两个教师提出入党申请，毛泽东约两个申请入党的教师谈话。这是谈话的一部分。

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1]

(1939年3月1日)

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毛泽东

[1]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延安党政军学生动员大会，号召大家一齐动手，艰苦奋斗，以打破封锁，渡过难关。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开展大生产运动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毛泽东题词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自给自足，
人人责成自己。

毛泽东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的题词。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序^[1]

(1939年3月2日)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坚持抗战的民族主义，那里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那里也开始实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义，总之一句话，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单是空唤是不行的，一民主义也是不行的。空唤无裨于实际，敌人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稍有良心者何忍至今徒存空唤？单单军事抗战，算是实行民族主义，但是如果没有决心实行民权民生主义使与抗战相配合，要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遗嘱上面，说他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欲达到自由平等之目的，必须实行两大革命原则。就是：（一）唤起民众，（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岂有国难严重到了今日的程度，还可以不实行孙先生的临终训示？唤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则无从唤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真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或缓。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蒋委员

[1] 1939年1月，聂荣臻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情况报告，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约有10万字。其中着重叙述了晋察冀边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毛泽东接到这个报告，读后觉得很好，决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3月2日，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长与国民政府号召实行于上，全国民众同声拥护于下，却有不少人员对这个纲领讳莫如深，不但讳言之，而且阻挠之，对于这个纲领中实行民权主义的项目，例如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不是实行者奖，而是实行者罚，这种状态是非常离奇的，是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的。晋察冀边区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的精神，是值得钦佩值得奖励的。过去汪精卫辈开口闭口八路军与游击队“游而不击”，或“不游不击”，某些应声虫起而和之，然而汪精卫却“游”到日本怀里去了，应声虫们则在四圈八圈麻将世界里大打其“游击”，真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晋察冀边区里面没有汪精卫党徒，也没有四圈八圈麻将，那里却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用艰苦奋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华北抗战的堡垒，蒋委员长曾经着重称赞华北的战争，不是没有原因的。聂荣臻同志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谓予不信，视此小册。于其出版之始，乐为序之。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3月4日)

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像过去的上海大学。职工学校同样要有严肃的政治纪律，防止工人中的帮口观念。职工识字少的要进行文化教育。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陕北公学和职工学校的教育方针时讲话的一部分。

改进抗大分校教育计划的意见^[1]

(1939年3月6日)

朱、彭、左、傅^[2]，并告一分校何、周^[3]：

关于抗大分校之教育计划，应当加强军事教育，强化军事生活，以培养初级军事干部为目的，以及重新配备教学方法，训练教育干部，使之更加适合于新的教育对象。这些改变的意见，我们在原则上均同意，惟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再提供下面意见：

(一) 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因此，在政治课课程内容上，必须教列宁主义，这是政治上武装他们头脑的很基本的问题。此外，民众运动，共产党问题，八路军问题，亦应当作专门课程教，而统一战线倒可放到中国革命运动史以内教。党的建设，只作党内教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敌占区，并号召到敌占区办学校，就地就近培养八路军干部。1938年12月抗日军政大学第一、第二分校正式成立。1939年2月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在晋东南正式开学。

[2] 左、傅，指左权、傅钟，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

[3] 何、周，指何长工、周纯全，当时分别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长和副校长。

育，一般的学生只讲共产党问题。国际现势亦不必教，为着重于临时的时事教育。

(二) 为了教育深入，必须坚持学校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传统，每周上课无论如何不得超过六次。

(三) 因此军事教育内容似乎太多，如教育时间仍为八个月，则除以连以下的步兵战术及游击战术为主要内容外，只能教一点战略学（以《论持久战》为教本）及下级干部所必须具备之筑城、兵器、地形的知识。交通、军制、马学、卫生学、典范令，虽亦有其重要性，但以时间所限，恐仍以不教为宜。

(四) 学生将来主要在八路军工作，为了加强党的教育起见，党的支部应当公开，并实行党日制。

(五) 在八个月的学习期内，最好能给学生到部队中去实习的机会，时间约一个月。

上述意见尚希你们再加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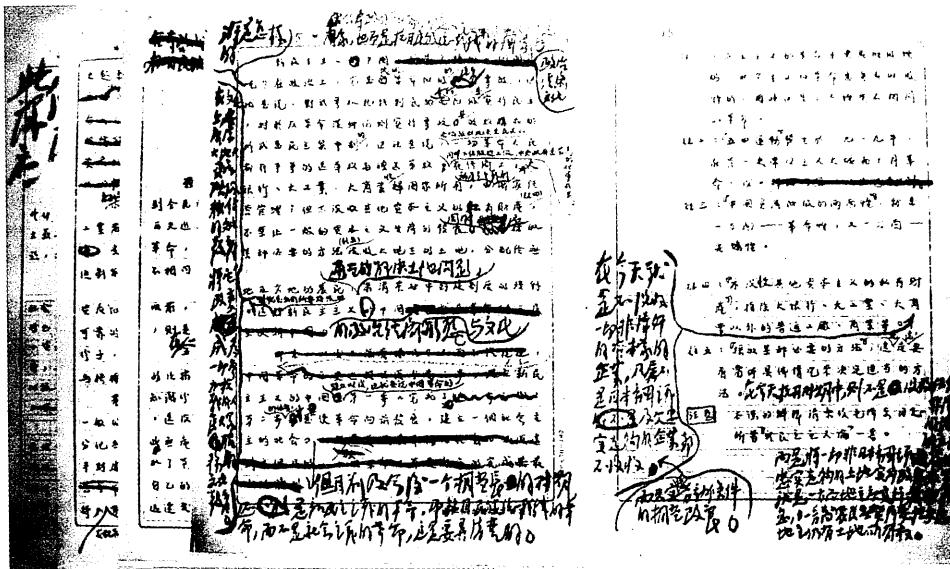
并发聂彭^[1]及二分校^[2]。

毛 王 滕 罗

三月六日

[1]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

[2] 二分校，指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当时校址在晋察冀边区，陈伯钧任校长，邵式平任副校长。



毛泽东修改的战士课本。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

妇女们团结起来^[1]

(1939年3月8日)

同志们：

今天开妇女大会，参加的人很多，有女同志，也有男同志，有老婆婆，也有小娃娃，大家都来纪念“三八”，纪念这个国际妇女节。

纪念“三八”这件事，全世界的妇女，除了那些荒淫无度的女吸血鬼们之外，只要有可能，都在举行，都在开会。我们中国的妇女同胞，除了那些女汉奸们之外，在全国各地，只要有可能，也都在举行纪念，开大会。

纪念“三八”，开大会，干什么呢？就是要结团体。

妇女同胞结团体，为的是什么？是为了争取妇女们的自由与平等。

现在，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中国人民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全世界各国，除了苏联以外，所有的老百姓也都是不自由不平等的，他们现在正在英勇的斗争，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自由与平等。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男的女的，一共有十几万万，大家在跟压迫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我们中国，男女同胞，就有四万万五千万，大家在跟日本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间，不论在中国，不论在全世界，男子固然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女子呢？女子有没有力量呢？有些人说，女子是没有力量的。也有人说，女子有一点力量，不过是很少。在女同胞中间，她们也有表示似乎自己的力量并不大的意思。这种说法，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在一切斗争中，要是说男子的力量是很大，那末，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

女子有力量，还要加上一条结团体。没有团体，这种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这叫做心不齐，力不合。有了团体，心就齐了，力量就结合起来了，就能齐心合力干大事。“心一齐，山可移”，这就是讲结团体有力量的道理。现在我们看，全国妇女同胞们有没有结女子团体呢？有是有的，但是很少。在我们边区还算多些，而在全国其他地方则是很少了，有许多地方甚至是根本没有的。因此，全国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女同胞，在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没有表现出她们应有的力量。我们现在要开大会，做演讲，写文章，做宣传，号召全国妇女同胞，参加男女合起来的团体，组织妇女自己的团体，参加自卫军等等，并且号召一切愿意并坚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妇女们，加入共产党，这样，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比方，边区二百万人民中间，一百万妇女都结成了团体，这个力量就大了；全国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同胞，都结成了团体，这个力量更大了；全世界十万万的妇女们，都结成了团体，

大家都懂得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懂得了世界上的道理，齐了心，那末，就成了更雄伟的力量，谁敢欺侮，谁就在她们面前毁灭。总之，要结好团体，结好各种各样的团体，从小团体到大团体，以小团体结成大团体，齐整心意，集合力量，来进行伟大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那些帮助我们同情我们的，如苏联，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农民被压迫者，是好人。那些欺侮我们侵略我们的，如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是坏人。我们中国也有好人和坏人：工人农民，一切进步的抗日分子，都是好人，他们要抗日，要进步；那些汉奸是坏人，他们不要抗日，去降日；还有一些顽固分子，也是坏人，他们不要进步，要压迫进步势力。现在中国人民，不论男人女人，是在被世界的和中国的坏人欺侮着，是在重重的压迫中。首先，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其次，是汉奸的压迫，顽固分子的压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而我们的女同胞则有更多一重的压迫，就是受到男子的压迫，比如，男子打老婆的；看不起女子的；说女子没有能力，不让她们管国家事情的；雇佣女工，同男子做一样的工作，而少给工资的。自然，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人民，不论男的女的，都要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汉奸、顽固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而女同胞更应自己站起来，打破那种社会的歧视与社会的压迫。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这样的话，在全世界已经讲了几百年了，但是实行的地方有多少呢？全世界除了苏联，还有哪一个国家真正实

行了呢？在中国，要求男女平等的话，也讲了不少年代，但是全国除了边区，还有什么地方实行了呢？很明显的，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一开始就是用枪杆子斗的，到现在已经斗了一百年了。但是一百年来，每次革命斗争，七斗八斗，最终都是失败了。那末，这一次是不是又要失败呢？跟日本打，是不是又要打败仗呢？全中国是不是又要遭受痛苦呢？是不是又要继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汉奸的压迫，顽固分子的压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呢？我看，这次革命是不会失败的，打日本是不会失败的。这次的斗争，跟一百年来的斗争是不同的，从前都失败，而这一次一定要胜利。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占领很多土地，我们中国要生存，就一定要把它打出去，就一定要坚持抗战，抗到底。全中国大多数人是赞成抗到底的，而少数动摇分子，他们过去不让广大人民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现在这些分子已逐渐滚出去了。因此，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人也多了，有男女合起来的统一战线，有女子单独的统一战线，有娃娃的统一战线。总之，统一战线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团体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人心一天一天地齐起来，力量就一天一天地强起来。这样斗争下去，最后胜利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因为现在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势力向上高涨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向下衰落的时代，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很好的条件。所以，这次革命

斗争，决不会像太平天国一样，不会像辛亥革命一样，不会像五四运动一样，也不会像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一样，最后都遭受失败，而是相反，一定可以得到胜利。

在我们边区，不仅男子可以开大会，女子也可以单独开大会。我们共产党号召全中国的男女同胞，统统开会，统统结团体，而现在特别号召女子起来。今天开纪念“三八”的大会，就是一个号召，一个动员，要把全国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把全国男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大家来把中国问题解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打倒顽固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都有自由与平等；把妇女问题解决，打破轻视妇女侮辱妇女的社会歧视与社会压迫，使妇女能得到自由与平等。我们要使得男子没有痛苦，女子也没有痛苦，大家都没有痛苦，大家有饭吃，大家有衣穿，大家有工做，把中国革命搞到彻底的胜利。这是共产党中央的号召与主张，我们全国的共产党员，不论男女，都赞成这种主张，拥护这种主张，并为这种主张的实现而奋斗。希望全国男女同胞都要为实现这种主张而奋斗，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站在争自由与争平等的人们一起的。

我们边区，全国的老百姓都说是个好地方，这里有自由，有平等。那末，是不是没有缺点呢？缺点自然会有的，但是比起全国来，那要好得多了，比起外国来，除了苏联以外，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然而，我们并不以此自满，我们还要更求进步，要做一个样子出来，给全世界看，给全国看，给华北华中看，给西安看。在西安，那里是不准老百姓开会的，老百姓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这件事，我们共产党人是完全不赞成的。今天我们开会，拍电报到全国去，给那里的老百姓看：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是怎

样在管事，妇女们是怎样在办事，老百姓是怎样在过生活。并且还要给那里的坏人看：老百姓结了团体，妇女们结了团体，就有怎样大的力量。坏人们应该苏醒，不要再执迷于“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幻梦，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了。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

同志们，什么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我们共产党是提倡这种权利的，希望同志们大家团结起来，结合在一块儿。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先团结起来，先结合起来，再到全国去团结。女大^[1]同学，将来到各地方去，就要照延安这样办，照共产党中央的好办法去办。这样办他十年八年，那时候，全中国人民都能得到解放，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男子得到了解放，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女子也得到了解放。为达此目的，短时间是不可能的，要花上十年八年的工夫；少数人是不行的，应由全国人民大家起来干；不是容易能够达到的，应当加倍努力。边区人民的加倍努力，全国人民的努力，再加上应给予的时间，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自由与平等在我们面前，同志们，大家努力吧！

[1] 女大，中国女子大学的简称，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成立于1939年，1941年与陕北公学等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

在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上的讲话^[1]

(1939年3月12日)

总理遗嘱上说，致力革命凡四十年，四十年的经验有两条：（一）唤起民众（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山先生深知唤起民众的重要，没有民众是打不倒帝国主义的……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国共应该很好的团结，长期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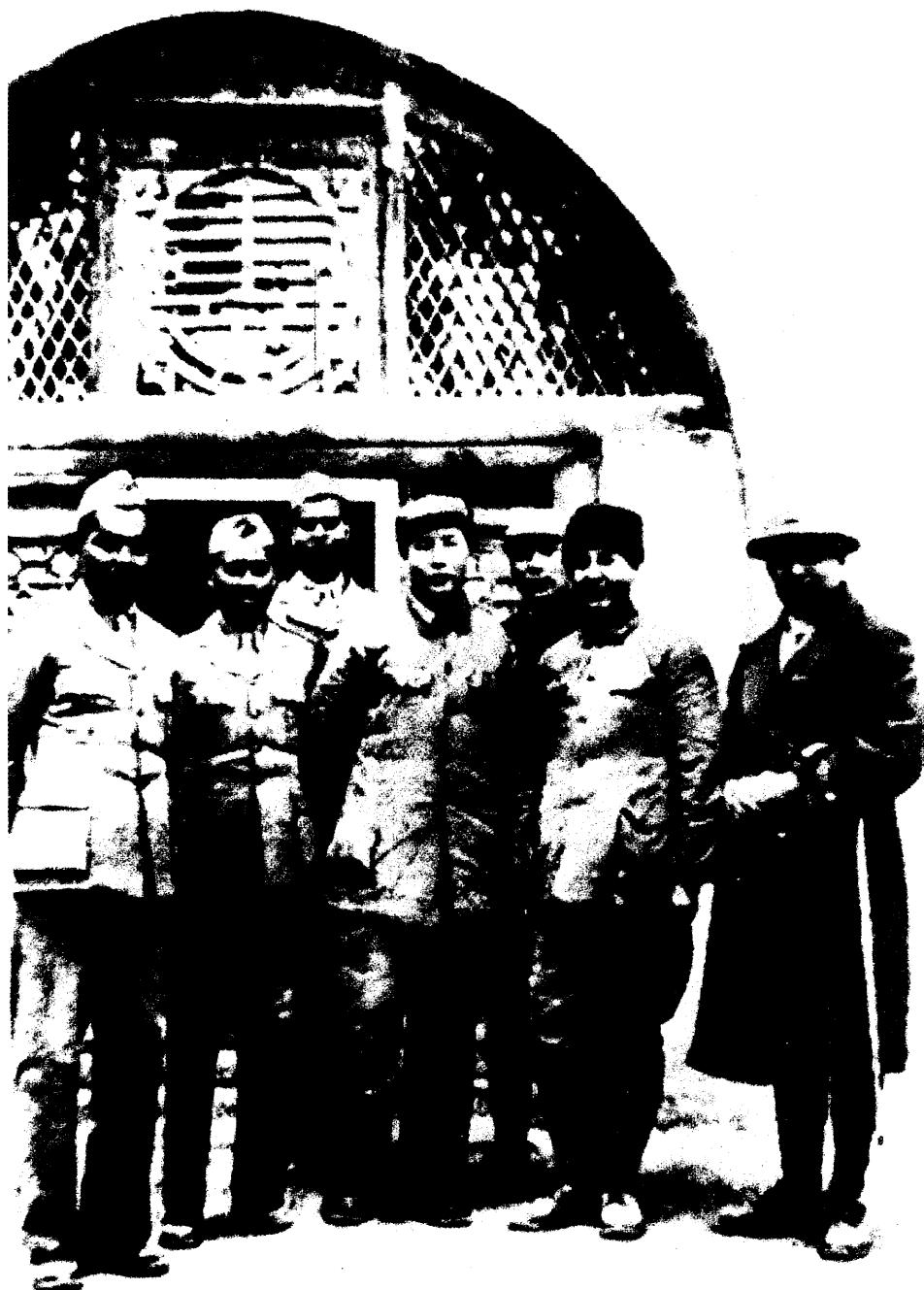
[1] 这是对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马克思（3月5日为其逝世纪念日）孙中山（3月12日为其逝世纪念日）纪念晚会上讲话的报道。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印度援华 医疗队时的谈话^[1]

(1939年3月15日)

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

[1] 这是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五位大夫和他们进餐时谈话的一部分。



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和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人员合影。



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来设宴款待，来到延安的印度援华医疗队。

对新四军参谋会议的意见^[1]

(1939年3月16日)

叶、项、周、赖：

对于参谋会议^[2]有如下意见，请考虑。会议的方针应是检讨与总结过去参谋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其成绩，纠正其缺点，建立参谋工作的各种制度，确定参谋工作的主要内容，当要求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素质，把过去部分的技术参谋，提高到战术参谋以及战略参谋的水平，以健全指挥机关的工作，而准备指导新局面下的战争。为此：

(一) 会议中除总结过去工作外，应规定以后的工作，规定各级参谋处的任务，各科的分工，各种制度的建立，各种规则的制定与要求一时期的工作中心。

(二) 除讨论今后的工作，应讨论对参谋人员的培养与提高参谋人员的教育。应以以上的中心行之。

(三) 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地位与信仰。

(四) 应先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如先开小的会议，分工讨论各部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参谋处长赖传珠的电报。

[2] 参谋会议，指新四军第二届参谋会议，1939年3月18日至24日在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地召开。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门工作及各种制度与规则等。会议结果望电告。

毛 王 滕

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 民族英雄事迹^[1]

(1939年3月18日)

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料。

[1] 这是毛泽东、王稼祥、谭政、萧劲光致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电的主要内容。

给聂荣臻^[1]的信

(1939年3月18日)

荣臻同志：

你著的书^[2]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我与王主任^[3]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

毛泽东

[1] 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聂荣臻写的介绍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斗争情况的一本书。毛泽东题写的书名是《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1939年12月由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分别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3] 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在“三一八”纪念晚会上的演讲^[1]

(1939年3月18日)

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要求每个保卫工作人员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光荣性，并希望每个保卫工作人员要有持久性，坚持到抗战的胜利，一直到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

[1] 这是毛泽东出席陕北公学举行的纪念“三一八”惨案、巴黎公社起义和中共中央敌军工作委员会慰问保卫工作人员晚会时发表演讲的报道。

巩固着重于华北 发展着重于鲁苏皖豫鄂

(1939年3月19日)

德怀同志，并告朱，杨^[1]：

电悉，复电如下：

甲、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巩固着重于华北，你们的计划都看过，都对。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但缺一个领导骨干，当敌人新进攻到来时，请考虑解决这个领导骨干问题。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三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

乙、延安干部今后一时期主要当供给华中，并准备一部为西北用，一部为南方用，一部为东北用，对华北则以供给教员与教材为主。

丙、兵工厂人才求助友人一事或者有可能，但要看交涉如何，恐不一定可靠，主要靠在国内找。

丁、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足自给。曹菊如^[2]现在中央财政经济部负责，不能动。李六如^[3]可以腾出给你处，

[1] 朱，指朱德。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2] 曹菊如（1901—1981），福建龙岩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

[3] 李六如（1887—1973），湖南平江人。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

惟他身体有病，养息一下才能来。同时正在物色他人，结果后告。

戊、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后方已有相当经验，当供给你们作参考。

己、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应使之成为运动（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下），应有管理学习的机关与办法，在比较安定的机关中应实行两小时学习制。中央已设立干部教育部，后方的经验亦可供给前方。

庚、回避与鹿钟麟^[1]见面很对，对付此种人只有坚持立场，给以坚决的绝不姑息的反攻才能有效力。山东之沈鸿烈^[2]亦应此法对付之，目前沈正厉行对我进攻，请注意坚决给以回击。

辛、中央政治局会议定四月底开，讨论许多重要问题。总部及北局已定派朱瑞^[3]出席，现距开会还有一个多月，请你考虑届时能否来延一次。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1] 鹿钟麟（1884—1966），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

[2] 沈鸿烈（1882—1969），湖北天门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总司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

[3]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为梁毅题词

(1939年3月23日)

中国具备优越的基础，就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这首先是组织全国的人民，抗战胜利实系于此。

梁毅同志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三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3月29日)

鲁艺过去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学校的基础，领导者虽努力，但工作做得不好，主要是中央领导没有抓紧，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现在必须确定明确的方向与制度。鲁艺的创作去年上半年较有朝气，后来差了，有许多非现实的非艺术的作品。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李维汉关于鲁迅艺术学院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1]

(1939年4月1日)

关于敌人在占领区的掠夺资财，攫取原料，经营工业，发行纸币，强征壮丁，以充其军实及队伍，其收效的具体程度究竟如何？请收集材料概略电告。并请此后党政军机关尽量注意此项材料，随时供给，以便参考。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收集敌占区材料致八路军总部等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5日)

(一) 道德教育问题。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与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二) 新老干部问题。过去在干部中主要反对骄傲自大，这是当时的情形。现在新干部人数多了，要注意教育新干部。新老干部要结合起来，老干部是骨干，有经验，有办法，同时要欢迎新干部，帮助新干部。(三) 抗大的工作。过去对于抗大的招生工作没有很好地组织，今后归干部教育部执行。抗大要组建图书馆，进行捐钱捐书。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罗瑞卿关于抗大工作检查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致朱德、彭德怀电^[1]

(1939年4月8日)

同意规定部队干部的等级，后方已设委员会研究此问题，惟规定每个干部之等级必须慎重估计其斗争历史及职务，否则会引起不满与纠纷。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在抗大检查工作总结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8日)

现在日本宣言要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在亚洲东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独霸东亚，以代替旧的国际关系——门户开放。有些人说日本已经没有力量向中国进攻了，这是不正确的。在目前敌人停顿期间，速胜论又在发展起来。有些人以为这场战争很快会结束，不需要长期合作了，所以又跟共产党多搞磨擦，这对夺取抗战胜利是不利的。必须认清中国现在还处在劣势地位，日本还要继续进攻我们，抗战是长期的，长期抗战需要长期合作。我们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抗战到底的“底”是在鸭绿江。抗大要有坚定的政治方针，艰苦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检查工作总结大会上作时事报告时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12日)

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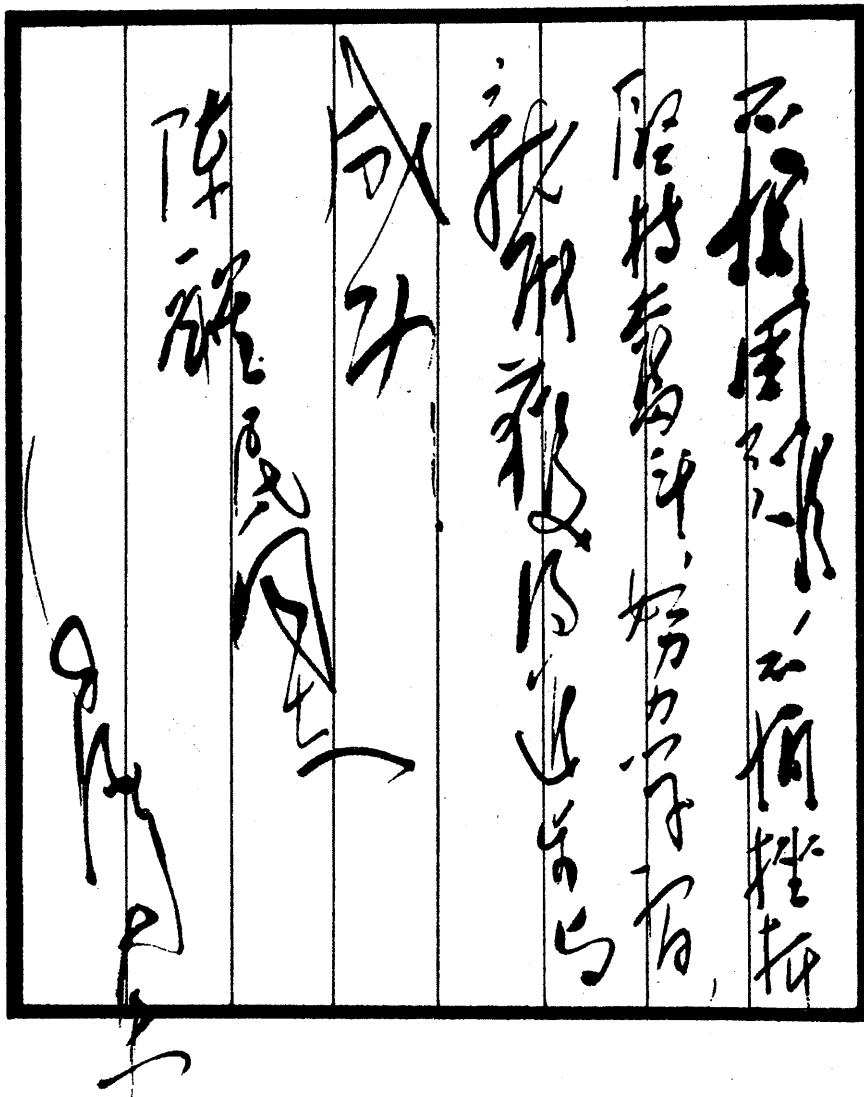
为陈醒民题词

(1939年4月18日)

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坚持奋斗，努力学习，就能获得进步与成功！

陈醒民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为陈醒民的题词。

继续开办训练班^[1]

(1939年4月19日)

日本特务机关正在华北各地大肆活动，开始打入八路军部队，进行收买并组织叛变。只有大批培养锄奸干部，健全和加强各级锄奸部门的领导，才能对付敌人的阴谋破坏。因此，决定在延安继续开办训练班培养较高级的锄奸干部。

毛 王 谭 吴

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谭政、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部长吴溉之给八路军总部、各师及有关的纵队、军区等的电报。

为消灭文盲运动题词^[1]

(1939年4月19日)

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为支持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关于在1939年内消灭3万文盲的号召而写的题词。

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毛泽东

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消灭文盲运动的题词。

为抗大题词

(1939年4月19日)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毛泽东

四月十九日

知識以至成的革命的
或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大者，是即為民族的
至實行結合着廣大民
他們的革命性在這裏。

毛泽东为抗大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19日)

自长征时组织部工作是重新建立的。过去组织部工作缺乏长期历史的传统，一年多来组织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组织部积累经验是重要的，仍要注意过去的经验，使党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要使延安的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过去组织部的工作主要是放在延安，现在各部门的工作都在积累全国性的经验，方法是找人来和派人去。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关于陕西省委工作的报告和关于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24日)

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都干起来，那还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我们不但能组织工农，训练工农，并且自己也做工农，这样我们就更加革命化了。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26日)

要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一个大的运动，反对纷〈分〉歧错杂的思想与贪生怕死等，说明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能服从。中央书记处作出一个提纲，从五月一日到三十日进行边区的大动员，动员反对反共，反对不民主，反对妥协，最重要一点是强调反对反共。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会议决定毛泽东在五月一日延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29日)

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就是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有它好的方面；同时也有消极意义的方面，这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29日)

在全国的工作是什么？是打日本，建设新中国，所以叫“抗战建国”。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的建设。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搞得很好。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有大工业、小工业，在边区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做出这些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上讲话的一部分。

为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题词

(1939年4月)

无产阶级是抗日的先锋队，应为坚持抗战到底建设新中国而斗争。

毛泽东
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题词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技术革命，降低成本
质量第一，永争第一。

毛泽东为陕甘宁工业展览会的题词。

为吕炎同志题词

(1939年4月)

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

陡峻山，深水，行向
艰苦工作，永
毛泽东

毛泽东为吕炎的题词。

为陈彪雄题词

(1939年4月)

请看今日之域中^[1]，竟^[2]是谁家之天下。

[1] 域中，宇内，天下。

[2] 竟，究竟，到底。

毛泽东为陈彪雄题词。

陈彪雄
有之无之
亦可一
城

毛泽东为陈彪雄题词。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1]

(1939年5月1日)

同志们：

今天延安各界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开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会，同时，今天又是“五一”劳动节，我们开了这样伟大的纪念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今天是五月一日，在今天，全世界所有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只要有可能，统统举行示威。同志们：向哪个示威？向法西斯示威！向侵略者示威！在今天，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民族，在各个地方举行游行示威，开大会，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强盗！

我们中国在今天这一天，所有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只要有可能，都在开纪念“五一”的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在全国各地，全国人民，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各党各派，在蒋委员长号召之下，开始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这就是今天开会的意义，我讲的第一点。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暨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

第二点，为什么要举行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呢？蒋委员长为什么要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呢？因为，我们的敌人，要达到他的目的，要贯彻他的主张，他要灭亡全中国，日本法西斯军阀，已在那裡进行动员日本全国的力量，来继续进行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来继续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强盗战争。还有，中国的坏蛋，汪精卫，汪精卫的徒子徒孙们，这些坏东西，又正在那里进行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活动，他们在进行“倒蒋反共”的活动，他们在香港、上海一带，组织什么“反共救国同盟”，汪精卫做头子，并要设立一个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府。因为日本同汉奸这样猖獗，所以我们要在全国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四万万五千万人大家团结起来，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汉奸，反对汪精卫，反对托派，反对一切狐群狗党，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要把我们的战争打到底，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所以蒋委员长就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国共产党就拥护蒋委员长的号召，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第三点，讲到国家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全国工、农、军、学、商，一切爱国人民的国家，不是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要把汪精卫这一类汉奸除外的。还有一些不明大义之徒，他们准备做汉奸，或者精神上被汉奸俘虏的人，如果他们一定要跟汪精卫跑，也要把他们除外的。我

们的民族，是数千年来独立自尊的民族，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民族中，只容许抗日政府存在，决不容许任何的汉奸政府存在。我们要保卫自己的祖国，我们要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们国家的独立，妨害着我们民族的生存，我们要打倒它。一切汉奸卖国贼，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也要打倒他。这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第四点，为了达到保卫祖国，为了达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就要使抗战得到胜利。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于抗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打胜仗，这就是我们的唯一标准。凡能使我们打胜仗的，凡有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做，就要拥护；凡属妨碍打胜仗的，妨碍抗战的，就不要做，就要反对。汪派、托派、捣乱分子的活动，顽固分子与阴谋家的活动，我们统统要反对。任何破坏抗战的人，我们统统要打倒！

第五点，要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要达到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目的，就要把全国人民的思想、意志、力量统一起来，集中起来，这就要实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蒋委员长所号召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一切意志都要集中到最后胜利这一点上，能不能够集中到别一点上去呢？能不能够同日本和平妥协呢？决不能够！一定要争取最后胜利，一定要达到这一点！一切力量要集中到抗日阵线这一方面，能不能够集中到别的方面去呢？决不能够！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就把他当汉奸打！

第六点，为了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要改造全国国民的精神，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错误的东西统统去掉。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这些东西好不好呢？这些东西要统统去掉。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是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首先是汪派托派的汉奸思想，反国家反民族的思想，一定要纠正。其他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也要纠正，例如有些人说：“马克斯主义不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这种话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孙中山先生明明白白地指示过：“马克斯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现在这些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指示，说两个主义不是好朋友，这是反对统一战线的思想，这是反对全国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的思想，也就是反民族的思想。所有这些错误思想，统统要纠正，统统要取消，才能使我们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七点，最后一点，讲到我们现在的总方针，抗战建国的方针，这就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要在抗日建国的斗争中全部实行的。民族主义，就要打倒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就是全国人民有自由；民生主义，就要全国人民有

衣穿，有饭吃，有事做。这些都是很好的，必要的，我们要坚决的实行。从今天起，全国国民都要实行三民主义！不但要口里讲，而且要动手做。有许多人，他们口讲信仰三民主义，但是据我看来，他们并没有信仰三民主义。因为信仰民族主义，就要同日本打到底，而他们却准备妥协投降，汪精卫就是已经投降了的一个。信仰民权主义，就不能压迫老百姓，而他们却不愿给老百姓以民主权利。信仰民生主义，就要照顾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问题，而他们却不愿改良人民的生活。这种人叫不叫做信仰了三民主义呢？这样的人叫不叫做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呢？只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始终不投降，不叛国，才叫做真正的信仰民族主义，才算是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忠实信徒。只有给老百姓以民主权力，给老百姓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不压迫老百姓，而且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实行“唤起员众”，才叫真正信仰民权主义，才算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的忠实信徒。只有努力于解除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痛苦，譬如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实行生产运动，使大家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才叫做真正信仰民生主义，才算是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忠实信徒。同志们！我们大家要做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要做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决不可做一个假信徒，决不可做一个坏学生。不要光是嘴上讲三民主义，而要全部的实际的做起来。那些口讲而手不做的叫做什么？我叫他们做假三民主义者。我们号召全国国民大家动手实行三民主义，大家都做真三民主义者。我希望全国国民大家实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大家实行帮助老百姓、唤起老百姓、给老百姓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大家实行使老百姓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的民生主义。在全国要求实行的，是这样的三民

主义，是真三民主义，我们要为真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今天我们开会，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全国国民精神动员也是为了这些事情。总而言之，要彻底的实行三民主义！要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我们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华民国！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交谈。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交谈。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交谈。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交谈。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交谈。

人民画报



《人民是中国革命可靠后方》(中国画)

五四运动^[1]

(1939年5月1日)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2]、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

[2] 1894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继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在战争中，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1895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了可耻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3000万两“赎还”该半岛），赔偿军费银2亿两，允许日本人在华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

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青年运动的方向^[1]

(1939年5月4日)

今天是五四运动的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延安的全体青年在这里开这个纪念大会，我就来讲一讲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2]。“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现在中国的革命正在前进着，正在向着胜利前进。历史上多次失败的情形，不能再继续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毛泽东在这个讲演中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

[2] 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规定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那时国民党在广大青年群众的爱国高潮的压力下，也同意了这个规定。后来国民党畏惧青年学习“五四”的革命精神，觉得这个规定很危险，又改定以3月29日（1911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来葬在黄花岗的革命烈士的纪念日）为青年节。但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则继续以5月4日为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了，也决不能让它再继续了，而要使它转变为胜利。那末，现在已经转变了没有呢？没有。这一个转变，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还没有胜利。但是胜利是可以争取到来的。抗日战争就要努力达到这个由失败到胜利的转变点。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你们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全国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觉悟起来，都具备这种必胜的决心，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就表示了这一点，我们正向胜利的路上前进，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第二，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

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苏联是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统统要跟它走，那是没有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全国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

第三，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怎么样呢？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

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五四运动是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北伐战争的革命也是一样，它胜利了，但又失败了。国民党反共^[1]以来，中国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于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红军战争。但是这十年的奋斗，也只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全国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便是只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没有永久的全国的胜利。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

[1] 指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和汪精卫在武汉所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讲到青年运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

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1]，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

[1] 指《五四运动》。

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個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第五，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经过了许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没有一次像现在的抗日战争这样广大的。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将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就是指的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步了，青年的进步就是明证。因此，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们应该继续要求统一，因为统一才有力量。你们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日到底。

最后，第六，我要说到延安的青年运动。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

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看，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们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今天的大会很有意思。我要讲的都讲过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

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对晋西北工作和河北磨擦问题的指示^[1]

(1939年5月4日)

我们在河北的根本方针要达到以八路军为主，使八路军力量扩大，主任公署和县政权无论如何不取消。对最近国民党在瓦窑堡的磨擦，我们采取强硬态度已取得胜利。现在磨擦中心区在庆阳，已发生武装冲突，庆阳附近五县我们坚持不让，如果打起来了，我们便提出与国民党谈判。

[1] 这是1939年5月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关于晋西北工作及河北磨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和萧三的谈话^[1]

(1939年5月5日)

《聊斋志异》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

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的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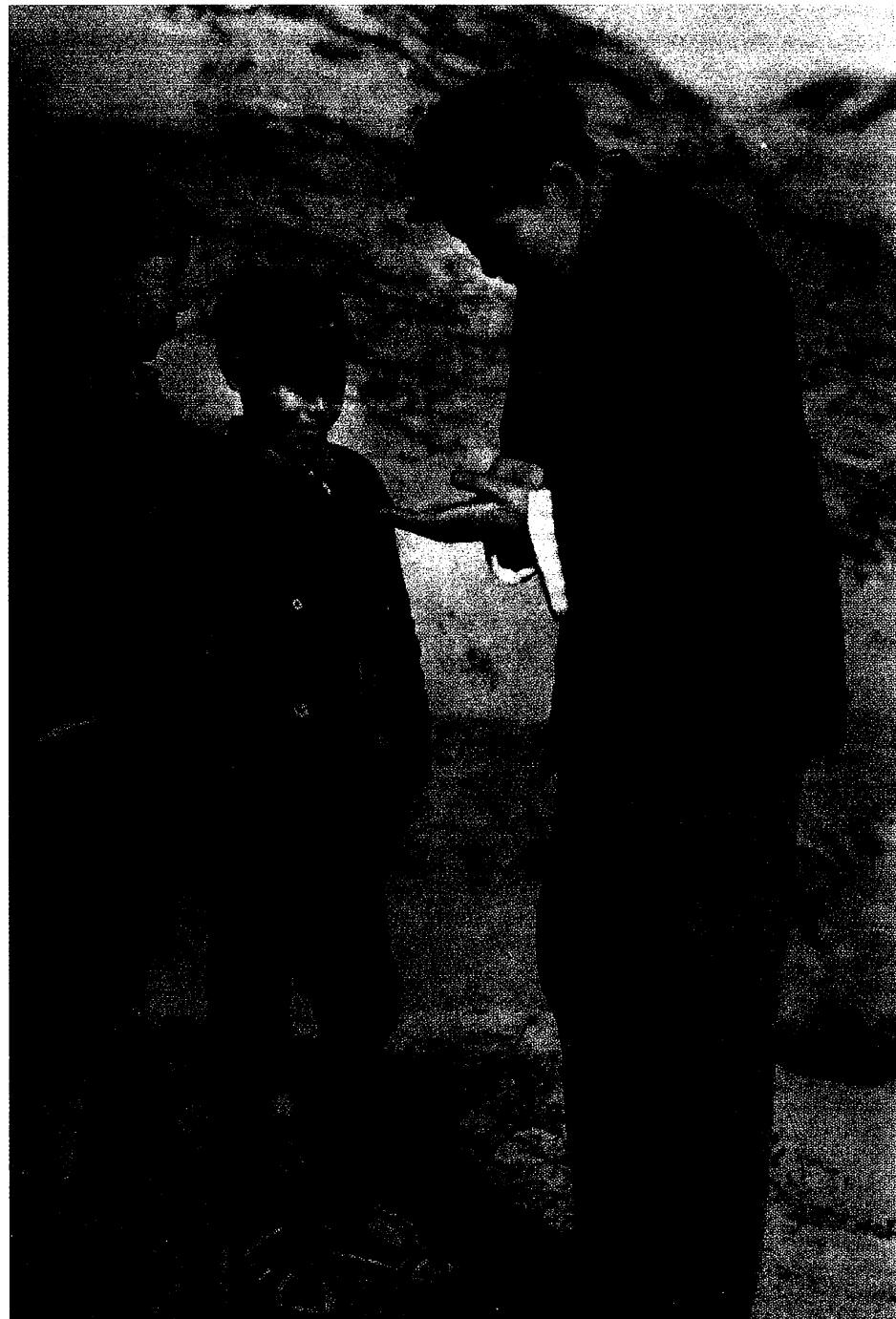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和诗人萧三会面时关于《聊斋志异》谈话的一部分。



1939年5月，毛泽东和萧三在延安杨家岭。



1939年，毛泽东、萧三和小八路在交谈。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小八路亲切谈话。

我叫毛泽东 元月一九三六年春毛泽东在延安两个小八路画



《“我叫毛泽东”》(中国画)



《路遇——毛主席与小八路》(中国画)



《毛泽东和小八路》(中国画)

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5月5日)

留守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准备对日作战，一方面是保卫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现在对陕甘宁边区确定了一个方针，叫做“四面包围，中间破坏”，就是在边区四周搞军事进攻，在边区内部派奸细搞破坏。我们巩固陕甘宁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保卫边区，主要靠武装力量——留守兵团与保安队。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

[1] 这是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关于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任务等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为鲁迅艺术学院建院一周年 纪念大会题词^[1]

(1939年5月10日)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1] 1939年5月10日，毛泽东参加“鲁艺”成立周年纪念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要求文艺创作既要反映抗日的现实，又要体现必胜的理想。

给潘梓年的信

(1939年5月11日)

梓年同志：

四月二日信收到，当转交这里的卫生部长姜齐贤同志查明复你。以后关于医药问题，由你，或由陶先生之侄等直接与延安卫生部姜同志函商，他们会回答的。去年接到来示后，曾复了一信，不知收到否？顺祝

健进！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1] 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当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

关于阎锡山问题的讲话^[1]

(1939年5月11日)

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磨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我们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拥护，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

[1] 193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关于阎锡山部情况的报告。王世英说阎锡山最近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基本上是右倾的。这是毛泽东关于阎锡山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



1939年，毛泽东和马海德在延安。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5月17日)

中央专门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是重要的，今后要两三个月讨论一次。党的大政方针要由宣传部组织具体的宣传工作，宣传部要注意宣传工作的组织与领导，要有领导的艺术；要注意全国各地的刊物，经常收集材料；要注意组织地方党组织的对外宣传；要指示各地方党组织首先建立对外宣传机关，这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还要注意国民教育的方针和方法，现在国民教育的方针是民主主义的。过去中央苏区国民教育方针是共产主义的，文艺政策是共产主义的，都不对。王稼祥在会上提出，现在国民党有许多怪论，我们应当答复。会议决定要注意回答国民党宣传中提出的问题，由毛泽东撰文答复坚持抗战三阶段问题、主流与逆流问题。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和讨论洛甫（张闻天）关于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在延安在职干部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5月20日)

同志们：

我们这个会筹备了很久，早就要开的，因为生产运动的关系，拖延到今天才开。现在各机关的同志，响应中央关于学习运动的号召，组织了学习小组，有的已经开始学习，而且有了相当的成绩，这是很好的。今天开这个会，把有关学习运动的几个问题来讲一下。

一、学习运动是必要的

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以及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是有普遍的意义和永久的意义的。

大家知道，生产运动是为了搞饭吃，搞衣穿。穿衣吃饭，我们是十分需要的，因此，现在我们的生产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全国都要吃饭穿衣，所以它在全国也是重要的。推而广之，不但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所以生产运动是有它的普遍性的。吃饭穿衣不但我们需要，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也是要吃饭穿衣的。因此生产运动不但过去要，现在要，将来还是要，这是生产运动的永久性的根据。

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1]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我们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有它的普遍意义和永久意义，这从一般地讲是如此。现在我来讲发起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现在虽然有一点，但是将来困难起来，就会不够吃、不够穿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预先准备。这样，穿衣吃饭问题就成了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

那末，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这是我们发起学习运动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有

[1] 参见韩愈《符读书城南》诗。

些老干部，他们从前在其他部队里搞过一个时期，一切工作都是靠下命令；但是在我军里，单靠发命令就不行了。人家不听你，就打人，结果，工作就领导不起来，战士逃跑的很多。在部队中发命令，这是威风，但光有威风而没有本领是无用的。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所有的干部，在有威风之外，还要有本领，这就要学习。现在我们的有些战士，他们识字比营长识得多，他们从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们的营长、连长，在指导员上课的时候，不去听课，他们以为这课是战斗员听的，他们去听，未免要“失格”了！为了要维持“格”，结果，他们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因此，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我们的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的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看到我们的有些教员，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因为大概他已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真是“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他不知道结合新的形势把书上的东西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在民众团体里，在军队中，在支部中，这种情形也有看

到。我们现在要打破这种现状，改善我们的工作，就要加紧学习。

使学习成为迫切需要的第三点，是我们党的特点。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过去是小的，现在要大，那末怎么办？现在正处于由小到大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在全国发展党员。可是某些人说“你们何必要大”，他们不要我们大起来。但是我们觉得大一点好，而且依照老百姓的意见，也要我们大，因为他们到处找共产党找不到，我们的党大起来了才好找。这方面，我们要顽固一些，同某些人不同，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时刻注意，我们要率领几万万人革命，现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我们六中全会关于学习运动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党历来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过去是有学习的，但组织得比较差，没有现在这样好。现在是更进一步了，有了组织，不像过去那样无政府状态了。

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是一样，要设立教育部，建

立起学习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

同志们：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

二、学习运动是可能的

学习运动必要虽然必要，但是不是可能呢？我们的回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并不多，只有两个，一个是大家忙得很，一个是看不懂。这两个问题完全是实情。这样忙的工作，外加生产运动，在前方的要作战，不能够学习，不但一般人如此说，甚至高级的干部也是这样说。“没有功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的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陈云^[1]同志有

[1] 陈云，1905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再一个问题看不懂。这种情形的确存在，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忙可以“挤”，这是个办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是不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让步，所以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从前人称“校对”为“校仇”，校对确实很难，非以仇人对之是不胜所为的。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对于仇人我们是不讲感情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固然很难，如果我们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无攻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垒攻下来。过去韩文公^[1]《祭鳄鱼文》里，有一段是说限它三天走去，三天不走，五天，七天再不走，那就不客气，一刀杀掉。我们要像韩文公祭鳄鱼一样，十天不通，二十天，三十天，九十天……非把这东西搞通不止，这样下去，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

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1] 韩文公，即韩愈（768—824），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三、学习运动是会有成绩的

学习运动现在已经看到了成绩，有许多学习小组已经组织起来。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等，而且已经见了功效，从前不懂哲学的人现在懂了一点，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也懂了一点。在军队里也有这样的组织，而且多少也有些成效。在外边许多地方，有读书会的组织，同我们在职干部的教育差不多，这是可供我们参考的。我们共产党员对学习是热情的。有人告诉我，有许多同志，自从学习运动开始后，非常热情，很高兴，本来要求调动工作的，现在不愿意调动了。这也是学习运动的功效。

学习运动的基础，是我们同志们自觉的热情。我们的方法是采取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互相配合起来。有些学校最初没有注意个人活动，不给他们以自由看书的时间，平常都是紧张得很，在组织活动方面算是不错，但这是一个不好的毛病，个人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关于这点，现在正在想法改正。我们是提倡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配合起来的，对学习既有自觉的热情又有健全的领导，因此我们的学习运动一定会有成绩的。

在这里我要附带地讲一点，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他们以为年纪大了学习没有希望，我以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年纪大一点谁说不行呢？有句古话：“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那末，你若是五十四岁的话，还是青年呢，哪有不可学的道理？！这是我附带说到的一点。

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讲到大学，我们这里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在外边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在外国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他们都是学习五年、六年

便要毕业，叫做有期大学。而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年纪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活着，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我们这样的大学，是延安独创。不过是任何人都可以进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不论什么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可以进这个长期大学的。

在长期大学念书成功的人，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

孙中山先生也是一样。当他在学校里的时候，并没有三民主义。大家知道他是学医学的，他的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之后才有的。而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是一下子就有，开始只是一民主义，后来有了二民主义，最后他到欧洲去跑了一次，看见欧洲发生了社会问题，工人要打倒资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

至于外国，有马克思，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马克思主义，学的是唯心论。后来他在学校外面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他的老师不同的。至于学历短的人，我可以举高尔基为例，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博士”，但他没有进过小学，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更没有进过，他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

所以进学校是可以进，但是这只是进一个门而已，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现在你若还不认得字，也不要紧，有希望的，只要你努力学习。

四、学习应该学到底

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

我们学的学问，如罗迈^[1]同志所讲，有党的建设，联共党史，这些东西我们要长期地学下去，把学习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下去，是一定可以把这些学问搞好的，但主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废，如果不是这样，那会一无所成的。

除了这些学问之外，还有时事问题与党的政策。这两项，过去的计划中没有包括进去，但这是十分需要的，因为这是实际的学问，也就是“今”的学问。关于时事问题，中央已在把时事问题的材料摘出来，准备编个综合文摘，可以供给同志们研究与参考。至于党的政策，六中全会的决议，大概大家都已看过一遍，但一看就丢掉是不对的，应该把党的政策经常地研究。六中全会与七中全会之间，一切会议报告，包括政治局会议的，都要研究。不研究党的政策，单学习那些理论是不够的，会跟实际脱节的。

现在在职干部教育的学习运动，是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我们的会开了之后，大家都要努力，互相帮助，把从前有书只管自己读不给人家读的作风改正过来，今后要互相帮助学习，互相做先生，互相做学生，做同学。中央的同志，也是一样，跟同志们一道研究。罗迈同志告诉我，底下已在催材料了，同志们已在研究了，这是很好的，充分地表现了同志们的热情。好吧！在座的同志，全党的同

[1] 罗迈，即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

志，研究学问，大家都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

我们相信，我们采取学到底的方针，一定可以克服自满的坏现象。

我们的学习运动是必要的。我们是能够学习的。学习已经看到了成绩，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成绩。我们是采取学到底的方针。在干部教育部领导之下，干部学习运动的结果我相信一定很好。我们尝试的这种办法，要推广到全党去，特别是华北的党。

抗大三周年纪念

(1939年5月26日)

抗大^[1]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対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它，称赞它，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它，污蔑它。

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它教成了几万个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它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革

[1] 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成立于1937年1月，前身是抗日红军大学。

命的学生。昔日之黄埔^[1]，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竟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它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它能克服困难。

抗大三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努力啊！

毛泽东

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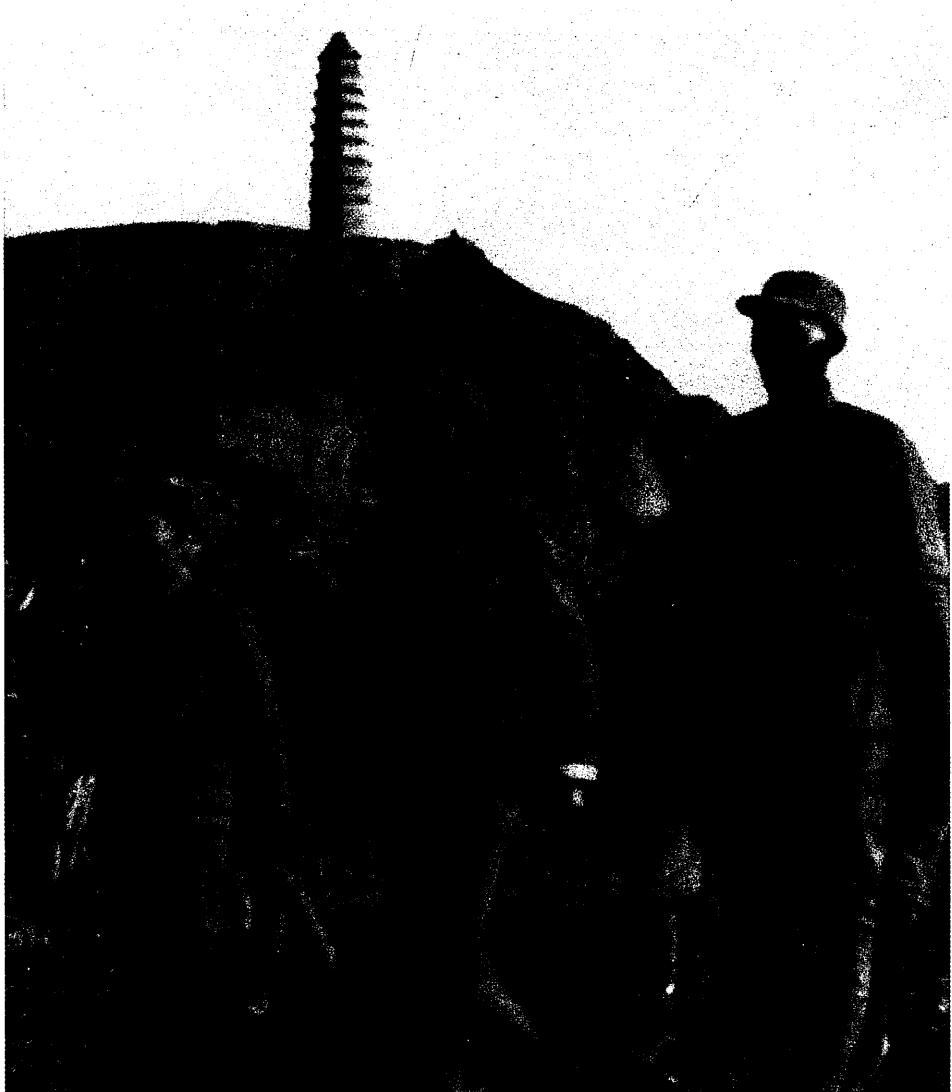
[1] 黄埔，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大门，毛泽东曾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亲自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图为毛泽东和抗大校领导林彪、罗瑞卿在一起。



毛泽东在罗瑞卿等的陪同下视察抗大。



毛泽东在检阅抗大学员队伍。



《挟雄风 破雄关 勇往直前》(中国画)

永久奋斗^[1]

(1939年5月30日)

同志们：

今天开庆贺模范青年大会，我听了非常高兴，所以也来参加。

刚才冯文彬^[2]同志已经讲了很多，而且讲得很好，其中有一句话，是讲“我们要永久奋斗”。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点。

从前我读书的时候，没有你们现在这样好的条件。起初读的是孔子的书，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一套。到后来进了洋学堂，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在学校里虽也听说过一点孙中山、马克思的话，但是真正的孙中山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出了学校门才学到的。现在你们什么都能够听到，仅仅孔夫子的少一点。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等等，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等，很多书都能够看到。这些书，我那时候一本也看不到。十九年前，《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印得很少，哪里去找这样好的理论？哪有现在你们这样幸福？你们生长的时代很好，是幸福的时代，比起我当学生时代来，是大不相同了。

你们模范青年是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选举出来的，这个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

[2] 冯文彬，1910年生，浙江诸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意义非常重大。二十年前，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是真正的模范青年，因为他们反对卖国政府，在五四运动中流了血，参加了那样的斗争。这些青年是革命的先锋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幸福，进行了那样的斗争，英勇得很。到今天留下来的还不少，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西北青年救国会^[2]中的许多优秀分子，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那时候的革命青年，后来有不少成为共产党员。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但是，也有一些人，五四运动时在北平奋斗得很英勇，后来变了，内中的一个就是张国焘，还有康白情、罗家伦^[3]等一些人。他们在五四运动时代都是先锋队，现在呢？变成了逃跑队了。

[1]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成立于1936年2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抗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1938年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在抗日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2] 西北青年救国会，即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于1937年4月，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西北各界青年进行抗日活动的群众组织。

[3] 康白情（1896—1958），四川安岳人。1918年与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文学团体新潮社，主张文学革命。同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3月与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1920年赴美留学。回国后曾在各杂牌军阀的军队和机构里兼任参军、参议等职。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1919年与傅斯年等出版《新潮》月刊，投身新文化运动。5月参加五四运动，曾作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南京、上海等地联络。1920年出国留学，1926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等，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期在国民党党政机关中任职。

汪精卫，“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杀宣统皇帝的保护人——摄政王。他在那时候是非常英勇的。但是这几天消息不大好，他从河内溜到上海，从上海溜到日本的京城去见日本的天皇，同日本内阁的首相平沼商议事情，讨论“精卫平沼协定”。我们不讲他这个协定里的字有多少，条文有几条，总之，就是“灭亡中国”四个大字。

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1]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

[1] 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所作《放言》中的诗句。原诗为：“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里的周公，是指周武王之弟周公旦。武王之子周成王继位时，因年幼由叔父周公旦摄政。

论定他的功罪是非。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緊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其他方面要做模范的是非常多的，例如，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我们对道德是这样的看法。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我曾经讲过，中国青年运动历来有两股潮流：一股是革命的潮流；一股是反动的潮流。在五四运动时代，一股潮流是要求民族独立，实现民主政治，改良人民生活，跟工人农民站在一块，跟老百姓站在一块，他们的立场是光明的。另外一股潮流则是跟帝国主义妥协，他们也说打倒帝国主义，但只打三天，第四天就不打帝国主义了，跟帝国主义做朋友了。他们说要革命，要民主政治，但也只有三天，第四天就压迫老百姓了。“唤起民众”这是孙中山先生临死时讲的，古入说“人之将死，其言亦善”，但有些人也只唤了三天，第四天就不干了。至于改良民生，那更是影踪全无。这是反动的潮流，我们名之曰“逆流”。

在大革命时代，广东有两个青年团体：一个是青年军人联合

会^[1]，另一个是孙文主义学会^[2]，这两个团体就是那两股潮流的代表。前一个是革命的，他们是跟全国广大青年在一块的，跟工农劳苦群众在一块的。后一个是反人民的，是反共的。他们曾反了十年的共，其中有些人因反共而发了财，做了官。现在他们还是举起两只手，一只手打日本，一只手打共产党。他们又要抗日，又要反共，这事行不行呢？有些人对历史很少研究，不大知道这些事。从历史上看，汪精卫奋斗来奋斗去，结果奋斗到日本天皇那里吃饭去了，跟全民族作对。现在反共的人相当多，他们一方面说日本帝国主义可恶，要打倒；另一方面又说共产党也要打倒。你们到延安来，就有人不准，把你们捉起来，你们到这里来是很辛苦的，是“过五关斩六将”才来到延安的。他们说你们不好，我看蛮好，是呱呱叫的模范青年。他们不准你们到延安来，说延安不好。延安的确不好，树木很少，经费不足；但是延安有民主政治，有政治自由，这在他们看来，当然是不好的。现在他们的一只手抗日，一只手反共，将来有可能两只手搞在一块，统统来打共产党，结果只能是跟日本帝国主义讲亲爱，向敌人投降，变为不抗日的。

“反共就是灭华”，这是蒋委员长讲的。这话要昭告天下，使全国青年都知道，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是反不得的。现在，

[1]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领导组织的革命军人团体。成立于1925年2月1日。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等校的青年军人组成，主要成员有蒋先云、周逸群等。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同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被解散。

[2] 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内一批右派分子为对抗革命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建立的反动组织。主要头目有戴季陶、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缪斌等。

我们共产党吃的是小米、黄米，而且还要自己搞饭吃，进行生产运动，而反共专家吃得又多又好，还尽干坏事。这里就有好的例子，延安县有两个县长，一个是月饷二块钱，一个是月饷一百八十块钱，拿二块钱的是共产党员，拿一百八十块钱的是反共专家。然而反共专家管的地方，只有窑洞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反共，破坏，搞特务工作。他们这样反共下去，一定要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天下没有不走之狗，也没有不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共专家。模范青年同志们，大家要知道，坚持反共是会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的。

他们反共，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说共产党不好，是因为共产党提倡艰苦奋斗。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够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我们共产党员“吃树皮”，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则“刮地皮”。所以把共产党搞掉了，中国就不妙。大家要拥护共产党，全国老百姓也要拥护共产党。相反，那些反共的、发国难财的、吃磨擦饭的坏家伙，应该统统清除掉。

今天在座的模范青年，要跟这些反共分子作斗争，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代表全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代表一切爱国的人，抗日的人，求中国独立、自由、幸福的人，并且是要永远的代表他们。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我们一定要这样努力去做，长期去做，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模范青年们，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斗”。

读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一书的批注

(1938年12月以后至1939年5月以前)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之所以称为辩证唯物论是因为他对自然界现象的态度，他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他对这些现象的认识的方法是辩证的，而他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他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他的理论是唯物论的。[第1页]

辩证法是根本上和形而上学直接对立的。

(一)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以下的基本特点：

甲、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把自然看做互相脱离、互相孤立、互相没有依存的对象和现象之偶然的堆集，——而看做联结的统一的整体

[1] 本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著。博古据1938年9月12日《真理报》译出。

是联结的，非不联结的。体，在这里对象、现象有机地相互联结着，互相依存着，互相范围着。

.....

是变动的，非不变动的。乙、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观察自然不把他当做静止和不动，停滞和不变的状态，而看做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不断的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在这里永远是某种东西产生着发展着，某种东西破坏着，过完了自己的时代。

.....

是量变到量〈质〉变的，非仅量变的。丙、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观察发展的过程不当做简单的上升的过程，数量变化不引起质量变化的过程，而看做这样的发展。在这里，从小小的隐秘的数量的变化转变到公开的变化，根本的变化，在这里，质量的变化之到来不是逐渐的，而是迅速的，突然的，出之于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跳跃式的转变，质量变化之到来不是偶然的，而是规律性的，是看不见的逐渐的数量变化底积累的结果。

.....

是内部矛盾。丁、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的对象、自然的现象都固有着内部矛盾，因为所有他们都有自己的正反两方面，自己的过去与将来，自己的衰亡方面与发展方面，而这些对立的斗争，新与旧之间的斗争，衰亡与生长之间的斗争，消灭与发展之间的斗争组成了发展过程底

因而变化的，非
只外部矛盾的。

内部的内容，从数量到质量转变底内部的内容。

因此，辩证法认为：从低级到高级之发展过
程不是在现象的和协的展开上发生的，而是在对
象、现象所固有的矛盾的发展上，在根据于这些
矛盾而动作的对立倾向之“斗争”上发生的。

[第3~9页]

原始生产制
度瓦解的条件
〔下〕，只能出现
奴隶制度。

奴隶制度在现代条件下，是糊涂，是反自然
的蠢事。奴隶制度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条件
下，是完全可以了解及合规律性的现象，因为他
较之原始公社制度是前进一步。

.....

在中国，资
产阶级还有一段前
途，但基本的应该
依据无产阶级。

在前世紀八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者与民
粹派斗争的时代，当时无产阶级在俄国较之占居
民绝大多数的小农乃是很少的少数。但是无产阶
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在发展着，而农民作为一个阶
级是在分解着，而正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正在发展着，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无产阶级。
他们并没有错误，因为大家知道以后无产阶级从
很小的力量生长为第一等的历史的与政治的
力量。

向后看则反
对游击战，反对
三阶段。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那么就要
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唯物论，那他根本

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

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

地和哲学的唯心论是直接对立的。

(二)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唯物论有以下的基本特点：

(甲) 与唯心论相反，唯心论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世界精神”“意识”之体现——马克思的哲学的唯物论底出发点是：世界按其自然之本质说是物质的；世界各色各样的现象，乃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各种不同的形态；为辩证法所确定的现象底互相联结与互相依存性乃是运动着的物质底发展的规律性；世界是按着物质运动底规律而自己发展的，用不着任何“世界精神”。[第 10~14 页]

.....

(乙) 与唯心论相反，唯心论断言：真实存在的只有我们的意识；物质世界、存在、自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感觉、想象、概念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唯物论底出发点是：物质、自然、存在乃是客观的真实性，他在意识之外离开意识而存在的；物质是最初的，因为他是感觉、想象、意识底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次的、派生的，因为他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高度发展的物质的产品——即脑子的产品，而脑子是思维的器官，因之如果不想陷入于蠢笨的谬误中就不能够将思维从物质脱离开来。[第 15 页]

物质世界是
可以认识的，不
是不可认识的。

.....
(丙) 与唯心论相反，唯心论怀疑认识世界及其规律底可能性，不相信我们的智识底可靠性，不承认客观真理，而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科学所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唯物论底出发点是：世界及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为经验及实际所考验过的我们的智识是可靠的智识，有客观真理的意义；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而只有尚未认识之物，而且这种物件将来亦会被科学及实践的力量所发现和认识的。[第 16~18 页]

假如自然现象的联结及其互相依存性是自然发展的规律，那么，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结及其互相依存同样亦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抗日战争应
根据于抗日战争
规律性的研究。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行动不应根据于“杰出人物”之良好的希望之上，不应该根据于“理性”“全部的道德”等等的要求之上，而应该根据于社会发展的规律上，根据这些规律的研究上。
.....

不应只看偶
然的现象。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行动不应该由任何偶然的理由来领导，而应该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以这些规律之实际结论来领导。[第 20~21 页]

为缪敏题词^[1]

(1939年春)

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人的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为方志敏烈士的妻子缪敏（原名李祯祥）所写的题词。1939年春，缪敏在中共中央妇训班学习，学习结业时她在政治测验中得奖，毛泽东在其奖品上题词。

以质朴的风格和民族化的人文色彩，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国书画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活力。

毛泽东

毛泽东为缪敏的题词。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1]—书批注

(1939年5月以后)

绪论 哲学的党性

二 哲学是党性的科学

.....

辩证唯物论 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在其发展上把握
就是这两语。 现实，在现实当中发现某一现象的发生与死灭，
 所以是最彻底的唯物论。[第7页]

互相斗争的种种哲学体系的多样性，总归著于两个党派、哲学上的两个根本流派。互相斗争的主要阶级之一，如果不站在一派的方面，在政治上就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同样，在哲学上要逃

[1] 《哲学选辑》，这是艾思奇从当时苏联和中国出版的几本哲学著作中分别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部分编辑而成的。“绪论”选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绪论；第一、二章选自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第二、三章；第三章选自李达著《社会学大纲》的第三章；第四章选自米丁等著的《新哲学大纲》的第八章。附录的第一部分，选自博古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第二部分《研究提纲》，系艾思奇本人撰写。

凡事应从现象看出本质，从效果看出动机。

学马克斯的
精明

出两个党派的阵营，也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指出了：波格达诺夫及其他哲学家想要超越于哲学的根本党派而创造“客观的”哲学的尝试，把他们引到了观念论。波格达诺夫超党派的哲学的说法，只是欺骗，只是背叛了唯物论的党派。“想逃出哲学上这两个根本流派的尝试，不外是想妥协的欺骗。”^[1]（列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这种尝试，实行过毫不假借的斗争。他们能够在一般用学者式的语句所凑合的掩护之中，在用所谓“最新的发见”作招牌的掩护之中，暴露出哲学上主要党派的斗争。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始终一贯是党的。他们对于一切最新的流派，能够发见其对于唯物论的背叛及其对于观念论和信仰主义的默认。^[2]”

在哲学上也和在政治上一样，两个党派互相斗争着。特定的阶级在政治斗争上，或^[3]为一定世界观的担负者而出现，这件事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世界观依存于特定阶级的历史地位与那阶级在社会的发展中所演的任务。……[第8~9页]

[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7页）

[2]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6页）

[3] 毛泽东将“或”字改为“成”字。

党的，即谓是革命行动的。

同敌人斗争，敌人就归我们管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归我们管了。

哲学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

对于在哲学上新的列宁的阶段的理解，特别重要的就是关于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的学说。列宁在认识论上指明了我们的哲学是党的，指明了我们的哲学之能动的革命的性质。他说：“只有唯物辩证法，对于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之不可分的统一，建立了更高的基础。”

特定的阶级知道在其实践的活动上，把周围的现实隶属于自己，而改造周围的现实。唯物论者费尔巴哈以及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们，只是说明了世界，但重要的事情，如马克思所说，是变革这个世界。当作认识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要点——列宁说——就是革命的变革客观的实在，把必然性转变为自由。用阶级斗争的语句来翻译这句话，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第10页]

世界划分为两个斗争的阵营：社会主义的阵营与资本主义的阵营；两个党派：革命党与反动党，互相对抗着。

在任何科学中，都行着两个世界的顽强的斗争。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之哲学，也一样更加明显的反映着这个斗争，所以从无产阶级的阵营退却这件事，总是伴随着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背叛。第二国际所以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是从修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从修正唯物辩证法

叶青^[1]

开始的。伯因斯坦在前世纪九十年代，就使用这种方法，他之背叛马克思主义，是从攻击辩证法开始的。

伯因斯坦，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最重要方面
是能动性

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

旧唯物论是被动的纯反映的。

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因斯坦不去提高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之不可能。[第11页]

.....

普列哈诺夫虽然为唯物论斗争过，但有时却无批判的倚赖于旧唯物论，即马克思曾痛骂过的那种被动的“纯反映的”性质的旧唯物论。.....

[第12页]

而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

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暴露了曲解马列主义的两个主要形态，即机械论与少数派的观念论；更指摘了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一切尝试，必定要引起

[1] 叶青，即任卓宣（1896—1990），四川南充人。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被捕后叛变，从事反共宣传活动。1939年年初加入中国国民党。1949年以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政治的错误。

哲学上的这两个偏向，与离开党的方针的偏向，密切的联系着。哲学上之主要的危险的机械论，同时变成了政治上之主要的危险的右倾派的哲学基础。机械论者的哲学否定了内的矛盾、飞跃、某一发展阶段与另一阶段间之质的差异的辩证法，它与右倾派的见解有很多的照应。右倾派的阶级协调论，豪农平和的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说教、新经济政策各个阶段间的质的差异的抹煞，及其他等等，都在机械论当中找出方法论的基础。[第 14 页]

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斯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斯主义抽出革命的内容、从具体的现实分离了的那种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之抽象的命题，根本上是以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说的话为其特征的。完全无视具体的历史的情势，放出与实在的现实无关的抽象口号，这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特征。由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实践上就跳过必然的发展阶段（一九〇五年托洛茨基的口号“废止俄皇、劳动者政府”，以及第十四次党大会时代的过渡工业化等等），因而在理论上把马列主义原理公式化了（他们不适合于实在的现实的、机械的、全然从外面的去应用马列主义的原理）。[第 15 页]

原理”。

中国的速胜论者不单是主观主义，同时又是片面看问题的机械论。唯武器论与亡国论者不单是机械论，同时又是主观主义。

当然，“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机械论者与右翼派，并不是同一的东西。例如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根本上赞助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的哲学，但同时又是机械论者。和这同样，右翼派也把机械论作基础，在许多问题上，却转入了观念论。……[第 16 页]

三 为党性的哲学而实行的 列宁与少数派的斗争

.....

.....列宁严格的批判了机会主义之屈服于自然生长性之前的那件事，并与它相对抗，指出了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与理论斗争的三个阶级斗争形态，指出了理论斗争的意义是劳动运动的指针。理论包含于当作计划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隶属于后者，构成后者的重要因素。[第 18 页]

理论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组成部分。

实际上，如果主体阶级和党的一切活动，终于只是迎合现存物；那么，对于现实的这样的态度，能够产生出具体的理论来吗？这不是单单自行迎合下去吗？这是在原则上否定，由于阶级

张国焘 (当时是无产阶级与农民) 之积极的独立的斗争，在阶级战线上对于现存势力关系造出别种势力关系的可能性。[第 18~19 页]

在中国，有时以与资产阶级联合，但同时进行独立的宣传组织工作为利益。有时以与资产阶级决裂，以便独立进行斗争为利益。

中国也有这种人

折衷主义

我们为甚么以打开后一发展方向的策略为利益呢？——列宁这样质问着。为甚么这两个发展方向对于我们没有同等的意义呢？我们为甚么用全力向着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的民主专政的方向进行呢？这是因为劳动者与农民的革命，能够以最大的速度及最少的牺牲，接近于革命的下一个环——社会主义的变革。[第 19 页]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过少数派的手，从一九〇五年俄国现实基础上实现出来的那种具体条件被割离了。一方面原理变为空虚的一般的命题——公式化；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理的新事实的记载，提供了爬行的经验论。就是提供了只记载在一般联结之外的个个散乱的事实就觉得满足的那种理论。[第 21 页]

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更加是那样，它们偶然的从现实把事实分离出来，往往表面的机械的使它互相统一。在这种情形下建立了孤立的解释那个事实的基础。这叫做折衷主义。在折衷主义之下，丧失一般的基础及个个事件间的联结。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

这种错误很多人犯着

现实，即一定的社会。如果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极抽象的理论的命题出发，在这种情形便丧失一切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各种事实才不能不在特定方式上被统一起来。在一般的基础丧失时，联结就变成人工的任意的产物，重要的各种事实被放弃了。列宁说：“在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无益的方法，莫过于分离个个小事实和玩弄实例。为要在事实上奠定基础，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所考察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个别的事实。否则就会任意的选择并搜集事实，就会无视整个历史现象之客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注重无意义的事情，而采取‘主观的’处理方法。”

.....

类推法的危险，中国人犯的太多了。类推须是真正的同类。若是形同类而实不同类，而妄用类推法，没有不错误的。如拿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比，拿北伐战争与苏维埃战争

列宁分析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这样说过。一九一四年的战争表现最高发展阶段的资本之内在的矛盾。这个战争，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时代的必然的产物。战争由于掠夺殖民地与重新分割世界而发生。我们不能拥护这个掠夺战争。我们要用内乱的口号对付这个战争。拥护祖国的人们，却向着列宁一派叫嚣，说这种主张错了。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具有积极的方面。因为这个战争引起了各国国民（巴尔干，比利时）的民族解放。马克思在一八五四年到七六年的战争时代，不是曾经表同情于交战国的一方面吗？——少数派这样

比，拿第一大〈次〉大战与现在的大战比。把进步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斗争时代的民族战争的情势，无条件的移到资本主义的腐朽时代了。

诡辩论即是折衷主义。

列宁这样写着：“这样的论断是诡辩，因为它把老远的过去的历史的时代，代替现在的形势。”^[1]一切这些折衷主义，都用马克思的名字掩护了。装作真理曲解事实，被粉饰了的折衷主义辩证^[2]论——少数派用这个代替具体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少数派与其他类似者为辩护自己的背叛而树立的防卫祖国的有名的口号，在诡辩中使保护祖国的运动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国际主义与保护祖国运动并不是不能相容的——第二国际阵营中发出了这种话。不但如此，他们又说保护祖国运动，只是听任各国劳动者保守自己的祖国，依照自己的志愿去实行，少数派从整个历史形势的联结，割取个个事实，各个方面，提供了直接拥护资产阶级之“理论的”辩明的断片。

但是少数派用一种作招牌看的理论的基础，掩饰了自己的失节。这正是当时第二国际阵营中流行的诡辩论的显著的特殊性之一。诡辩论——掩饰了的失节——往往用说谎的招牌代替现实的

[1] 参见列宁《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2页）

[2] 毛泽东将“辩证”一词改为“诡辩”。

现今中国的
无数诡辩论

诡辩论是主
观观念论之一
种。

机械论也同
样
只学个别科
学，不学基础科

内容。表面上好象伸缩性，实际上却从某一命题逃到别一命题。表面上好象有理论的根据，实际上却是诡辩。诡辩论是虚假，是伪善，即说话与行动完全不同。诡辩论投合于少数派的迎合性，最切合于少数派的精神。列宁说：一切机会主义的特征，就在于他的迎合性。我们必须了解并考虑少数派这种特殊性。

服役于垂死的资本的政党，也有与他相照应的特别的世界观。不想推测人类的未来，并且害怕未来，使得他们走到卑俗的观念论、迂回的经验论、用主观的诡辩论解释现实的立场。完全背叛劳动阶级就是完全背叛辩证唯物论。[第 22~25 页]

四 两个战线上的斗争

.....
从多数党的斗争分离哲学、分离理论与实践，这是复活了第二国际的最有害的传统与信条之一。所以党的中央，把德波林一派的全部事业，鉴定作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

观念论是在认识上把现实的诸特征诸方面之一，延长并夸大了的东西——列宁说。[第 34 页]

与普列哈诺夫不同，列宁把唯物辩证法当作统一的体系，贯穿于政治的，哲学的著作之全体

学（唯物辩证法）是不对的。

哲学的党性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中。唯物辩证法，在列宁一方面，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第36页]

……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学说之本质的方面——认识在理论与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之不可分的统一中深化——是德波林一派完全不知道的。关于比较任何哲学都彻底的我们的哲学的党性之列宁的思想，包含着隶属于唯一目的的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之不可分的统一——这种思想，被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们所曲解了。从社会主义的实践分离理论，这件事从另一方面到达了与机械论相同的处所。即，实践失掉哲学的基础，变成了服役于阶级的敌人的很卑俗的拜金主义。于是机械论者与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互相接合着，在这一点，再现出与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之典型的特征相结合的，即与抽出内容的空虚信条相结合之“事实”的粗杂的经验论。只是理论上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的机会主义的这方面，更加用马列主义的文句来粉饰，来掩蔽。……[第36~37页]

第一章 唯物论和唯心论

一 哲学中的两条路线

.....

最初的唯心论发生于原〔始〕人的无知，后世的唯心论的发展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

天赋人权论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发生的。

在全部历史过程中，这两条不可调和的哲学路线底生存底社会根源，是应当从阶级的、矛盾的社会结构中去找出来的。最初唯心论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迷盲无知底产物。此后，由于生产力继续不断的发展，促使科学知识也随之而发展；科学既日趋昌明，则唯物论应该是可以达到完满的胜利而把一切唯心思想都消除下去的。然而从原始社会迄今，唯心论不但不曾消灭，而且还在继续地发展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它底基本原因是在：社会有阶级底划分；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所统治，它为着自己的利益而竭力巩固其唯心的理论和学说。

唯心论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代表着剥削者群底意识形态，而往往起着反动的作用。唯物论底发展，是革命阶级底宇宙观抬头底表现；它在阶级社会内，要从对反动哲学——唯心论——的不断斗争中开拓出自己的道路来。自然这里我们不能规定出呆板的历史图表来，以为革命者一定都相信唯物论，保守者一定都站在唯心论方面。我们知道常有这样的场合，即未成熟的社会阶级往往用唯心论底口吻（例如十九世纪初德国的唯心论，天赋人权论，以及一部分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其实例），来表达他们新的革命的要求。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战斗唯物论因为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底意识形态；

可是十七世纪的唯物论，照恩格斯底指示，却是贵族“出身”的（……）。同样的在历史发展现阶段上的唯物论，假使它是庸俗唯物论或机械唯物论的话，那末在现今的条件之下，它也可以发生反动的作用。然而一般地讲，唯心论总是为保守的社会阶级所利用的最方便的武器。[第 40 ~ 41 页]

哲学之具体
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内只有阶级的科学。它总是适应着一定的阶级任务和阶级利益以尽其职能。当统治阶级的意识及其利益要求真实地认识现实以达到发展生产力底目的时，科学中就包含着唯物论的原素；……可是当剥削阶级底社会生活条件不让它们忠实地去认识现实时，当它们底生活条件歪曲和限制着它们底见解，当真理底认识足以危害它们底阶级利益的时候，它们的科学就变成唯心的了。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会了解哲学争斗中的一切。谁不同意科学和哲学底阶级性，就证明他是企图掩盖自己哲学底阶级性。[第 41 ~ 42 页]

之一

唯物论者恰恰相反，他们认定宇宙底一致就在于它底物质性。意识，思惟，是物质的本性之一；这种本性只是当物质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阶段时才发生的。……[第 43 页]

这种情形机
械论同样

所以我们反对唯心论的争斗，反对历史上统治得很久的那种神秘理论的斗争，不仅是要我们自己抛弃旧的唯心哲学底全部理论内容，而且还得把唯心论用批判的手段征服下去。我们必须把唯心论底阶级根源揭露出来；同时我们不能撇去唯心哲学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而不加以思索。我们揭露了这种或那种唯心论体系底内部的逻辑，并予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同时阐明了唯心论解答问题的偏面性，它底主观的盲目性以及它对于现象底一片段和一方面之唯心的夸张。[第 49 页]

只有两大特
点

.....
旧唯物论底历史的限制性，表现于下列三大基本特点：机械观形而上学性和不会把唯物论应用到社会生活底领域中去。新的唯物论底任务，就在克服这三个缺点；这一新唯物论是在另一个社会关系底阶段上和科学发展底新水准上生长起来的。[第 61 页]

交流

.....现今的机械唯物论者.....他们不能理解物质现实界之复杂的辩证法，不能理解它底矛盾、转变和交流底重要性，它的质的繁杂性及其各个领域底特殊性。他们把高级的、有质的特殊性的法则（例如社会的法则、生物的法则等

等），简化为纯数量的、从机械学里抄袭来的法则，简化为均衡论底原则和两种相反的力底交叉底原则了。他们又把质地不相同的各种运动形式打成一片而都归纳到空间的机械的转移位置底运动体系中去。……[第 62~63 页]

第二章 辩证法唯物论

二 世界底物质性和物质存在底形式

承认相对的
均衡

辩证法唯物论不承认有绝对的静止。但是它当然承认有相对的静止、相对的均衡，这是运动底成素之一，是运动底特殊场合。辩证法唯物论承认“物体之相对的静止底可能、暂时的均衡状态底可能，是辨别物质、因而亦即辨别生命的最重要的条件”。^[1]（见恩格斯著，《自然底辩证法》，页十三）[第 172 页]

四 客观的绝对的和相对的真理

.....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63 页）

到了每一相对真理，就是到达了绝对真理之一部分。除开相〈绝〉对真理，无绝对真理，同样除开绝对真理，就无相对真理。

在理论应用时

德波林本人也说：“一切现有的真理，皆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真理本身，我们却永远不能把握着的。我们只是在我们底认识和行动过程中接近着它”。（见德氏著《思想家的列宁》，页二七）我们只是接近着绝对真理而永远不能把握它——这是德波林底观点，这种观点跟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列宁底见解完全相抵触的。

五 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

.....

照列宁底说法，“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有一般性底价值而且还有直接的现实性底意义”。（见《列宁文集》卷九，页二六一）人类关于外界和外界中所发生的过程之理论的认识，揭露了历史发展底规律性和倾向；但是只有社会的实践予理论以彻底的证实，从实物之历史的具体性上去把握实物。列宁说：“理论的认识应予吾人以实物之必然性、它底各方面的关系和它底‘自在’和‘自为’底矛盾的运动。但是只当人类的观念变成‘自为的存在’（即在实践中）时，这种观念才能‘彻底地’抓住、把握住这一客观的真理。这就是说，人和人类底实践

是认识底客观性底标度证据。”^[1]（见列宁著《再论职工会》）……[第 205 页]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

一 对立统一的法则

.....

退步谓旧物
死去。

至于辩证法的发展观，却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不同。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承认世界的运动性与可变性。……“所以关于全宇宙及其进化，人类的进化，以及那些进化在人类头脑中的严密的反映，只有依靠辩证法的方法，只有依靠于成长与消灭、进步的变化与退步的变化之普遍的相互关系作不断的考察，才能成就”。辩证法把任何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当作由其内的特殊性所规定的、从一种形态到他种形态的转变去考察的。换句话说，辩证法把事物的发展当做事物本身的自发的发展去考察，当做事物本身中所固有的必然的运动去考察，当做事物本身的自己运动去考察。[第 223 页]

运动是矛盾，是矛盾的统一。先就力学的运

[1] 所注引文出处有误。这段引文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27 页）

动举例说明：力学的运动，是作用与反作用，运动与静止的对立的统一。……

精神与物质，内部与外部，现象与本质，质与量，肯定与否定，绝对与相对，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现象与本质，^[1]根据与条件，内容与形式，目的性与因果性，必然与偶然，必然与自由，可能与现实。

其次，物理学的运动，是阳电气与阴电气，阳磁气与阴磁气的统一；化学的运动，是原子的化合与分解。

再次，就生物学的领域来说。一切生命现象，都是生与死的统一。生命过程，与死的反对过程不可分离的联结着。

……

再次，进而说到社会的领域。社会现象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内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社会的发展是阶级的对立的发展。

以上所述，是客观的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物质世界的这个客观的辩证法，反映于人类的思想上，就成为主观的辩证法，成为概念的辩证法。必然与偶然、绝对与相对、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等一切概念的矛盾，都是物质世界的客观的矛盾之反映。由概念的矛盾，促进概念的运动。而概念的运动是适应于客观对象的运动的。[第

224~225页]

[1] 该段批语中出现两处“现象与本质。”

二 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

.....

但是，我们为要完全的表现事物过程之质的规定性，首先要从最单纯的判断出发。例如，行星是太阳系的要素，资本主义是社会的构成等，都是最单纯的判断。我们从这种最单纯的判断出发，即是从“个别是一般”的判断出发。各种的质，都因其特殊性，因其固有性而成为一般的一部分，并包含着一般。各种事物各有其质的固有性，在其质的固有性之中表现出全体。因而个别包含一般。行星在其特殊运动中，表现出太阳系的一般联系；资本主义在其特殊规定性之中，表现出社会的一般发展法则，表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第238页]

个别与一般的相互渗透

个个事物的质，正因其存有矛盾、内在的不完全性，所以不能孤立存在，它必须以别的对立的质的规定性为前提，并在其与对立的统一中才能存在。行星正因为有太阳，才成为行星而存在。猛兽只在草食动物存在的处所才能存在。因此，具有一定的质的个别事物，并不是绝对的孤立存在的。各个事物都和其他一切事物有共通之点，常与别的事物有一定种类的客观的联系。我们当暴露各个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之时，必须暴露

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的互相渗透、互相联系，一质与他质相需相成。

一个事物与别的事物的深刻的联系，证明种种质的相对性及其互相渗透。[第 239 页]

要吗是一系列的新，要吗是一系列的旧。

客观世界，处在永久发展的过程中。不但各个事物是变化的，是过渡的，并且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也和它们本身的变化相联系。不但各个动物有生有灭，并且动物一切的种也有生有灭。在社会方面，社会构成的变化，都是通过人类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的变动而发生的。所以结成新联系的过程，形成新的一般的过程中的个个事物的改造，同时是破坏旧联系的过程，是消灭旧的一般的过程。个别和一般的发展的内在矛盾之理解，是理解质的变化、质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及两者的相互联系的关键。[第 240 页]

不能无条件完全认识属性，感觉只能反映一定属性。

依据实践才能认识许多属性。

事物的属性，是在事物的运动中显现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展开的各种属性，表现出事物的各个方面。我们通过事物的属性，去认识事物的质。事物的一切属性，一切方面，我们固然不能无条件的完全都摄取出来，但在我们的感觉之中，可以反映出事物的一定属性和一定方面。我们依据实践，能够认识事物的许多属性，许多方面，暴露它们的内的统一，更深入的认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

质与属性是统一的。但这个统一，是辩证法的统一，是充满矛盾的流动的统一。具有一定的

质也发展，即质之量的发展。

质的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种种不同的阶段。在各个阶段中，展开出种种的属性。这一定的质，必在种种属性中显现，并通过种种属性才能发展。各个阶段上所展开的属性中所显现的这一定的质，具有种种不同的程度，显出种种的差别。但质与事物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结合着。在这事物存在的限度内，在这事物的发展过程未终结的限度内，这一定的质在各个发展阶段上虽显现出种种差别，而该事物仍当作该事物而存在，即一定的质仍是存在。……

相需由于不足（有限性）

在说明了质与属性的关系以后，再说起质的界限的问题。如上面所说，凡是具有一定的质的事物，都具有内的矛盾。从一个方面说来，这事物具有全体事物的性质，即个别中包含着一般；从另一方面说来，这事物在自己的特殊性上是被限制着。正因为有这个矛盾，所以特定事物与其他事物相结合，与其他事物互生关系。但特定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外的联结，并不解决它的内的矛盾。反之，质通过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而发展，因此完全暴露自己的有限性。……[第241~242页]

三 否定之否定的法则

.....

设定
展开
解决

……所以肯定、否定及否定之否定，必须当作现实过程的矛盾的发展及其解决的形态与阶段去考察。第一阶段，是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设定的阶段，是肯定中孕育着否定的萌芽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事物的矛盾的发展的阶段，是否定肯定而又孕育再否定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再扬弃否定的阶段，是由先行诸阶段的发展所准备的矛盾之相对的解决的阶段，是新事物的出现而又成为新事物发展的出发点的阶段。……[第 265 页]

五 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 法则与因果性

原因与结果，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为对立的统一。在相互作用上，原因变为结果，结果又变为原因，两者互相转变，互换地位。例如，我们从任何物质运动过程中抽出任一现象而追溯其因果时，就知道这一现象是先行现象的原因^[1]，是后一现象的结果^[2]，同时又知道原因的现象更有原因，结果的现象，更生结果。……

[第 311 页]

.....

[1] 毛泽东将“原因”一词改为“结果”。

[2] 毛泽东将“结果”一词改为“原因”。

某种事物的
存在

可能性也是客观的实在。某种事物的存在条件虽然存在着，而它的存在不能当作必然性主张的东西，叫做可能性。……[第 316~317 页]

第四章 认识的过程

一 经验的认识、感觉

.....

那时，人类
还只是自然物。
后来，生产发达，
才加上社会性。

如果说在人类最初的发展阶段上，他们狭小的视野外的自然对于他们一方面是反抗的、没交涉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把自己从自然分离开来，那么，也可以说，物质生产的发展，就是要把自然的这种乖离和人与世界的这种直接的自然联结渐渐废弃。历史的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的统一，它的真正的基础，是社会的、物质的、实践的活动（即劳动）。农业、工业、物质生产力的发达，生产的发展和分化，分化了的生产部门的结合，新的生产手段和消费资料的发生——就在这里，有着了人类的感性视野发达的基础。……[第 332 页]

.....旧唯物论把感觉当作认识的出发点，是不错的。唯心论就是“忘却了”这个端初，所以对于“终结”的概念虽然发表了贵重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论），但它的整个方向，却根

将毕也钜。^[1]差之毫厘，谬以千里。^[2]

如果“之前”发生，就是意识规定存在了。

本不正确，根本包含着错误，它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僧侣主义的泥沼里。……[第337~338页]

……人类是实践活动的主体。而人类的社会意识，通常又常是落在人的存在之后，落在人的物质状态之后，落在人的实践之后发生。不是意识规定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规定了社会的意识。……[第339页]

三 概念

……
人类有在原则上反映客观实在性（以及客观实在性的运动和矛盾）的能力，实际上也只有把所反映的表象甚至感觉普遍化以后，才能够获得有机体的成长的概念，以及资本主义的榨取的概念，物质的无限性的概念，微分的概念等。人类用感觉或表象的形式去获得客观的实在对象的形象，但还一点也没有透入到它的本质。只有用思维形式，人类才能在內的、必然的、有规律的联结中去认识对象。……[第345~346页]

在十七、八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中，概

[1] 参见《庄子·人间世》。原文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钜”，同“巨”。

[2] 亦说“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或“毫厘千里”。参见《礼记·经解》。原文是：“《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谬）以千里。’”

念已经不是象唯名论的“共通名称”那样主观的空洞的东西了，相反地，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对于普遍概念给与了绝对的、必然的、普遍的、客观的意义。但它的概念也决不是辩证法的。第一，它的概念只是被看做普遍的东西，却决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们把客观实在性里仅只具有片面意义的，或只会在一定部分发生的现象、属性和关系等过度地普遍化起来。象不可入性、机械的惰性、质量——这一切的属性，不过“只是物质的某种状态上固有着的相对的东西而已”^[1]。（《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就因为把这一切的属性强压到物质界全总体上，所以就必然地不得不带着纯外在的形式的性质。第二，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概念中反映出来的东西，是（成为十七、八世纪科学中一般周知的通常对象的）物质的属性。因为当时科学还是未发达的，所以不能在这些概念中把客体实在性的更深刻的联结和关系寻找出来。第三，十八世纪大多数的唯物论者们所理解的物质，都只是外的地空间的地相互冲突着的、现成的、完成了的事物的总和。对于事物交互作用的法则，也同样机械地去解释。因此，形而上学的唯物论的概念，必然只反映着它们的外的联结和关系。……[第
二与一重复
不是寻找，
是反映。

[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348 ~ 350 页]

研究提纲（附录二）

第一部分 哲学和政治

三 辩证法唯物论的阶级性和党性

.....

三，在中国，无产阶级是属于坚决抗日的党派的，无产阶级的哲学，也是抗日的党性的哲学。

抗日的战争是进步的革命战争，抗日的党派是进步的党派。凡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垒里的阶级党派，都是进步的。

但是有差别的。

抗日阵营以内有两条政治路线，一条是彻底的，一条是不彻底的。哲学路线也一样，前者对后者必须批评并克服之。

凡代表抗日党派的哲学思想，即使不是辩证法唯物论，也是有进步性的。

无产阶级与一切抗日党派联合。

无产阶级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也与一切抗日党派中的哲学联合。

联合的目的是，共同努力完成抗战建国的任务。

不但 是 帮 务，用哲学的力量来帮助完成这任务。[第 434～
助，而 且 是 指 导。 435 页]

四 辩证法唯物论的发生和发展

不但 是 帮 务，用哲学的力量来帮助完成这任务。[第 434～
助，而 且 是 指 导。 435 页]

不但 是 帮 务，用哲学的力量来帮助完成这任务。[第 434～
助，而 且 是 指 导。 435 页]

不但 是 帮 务，用哲学的力量来帮助完成这任务。[第 434～
助，而 且 是 指 导。 435 页]

不但 是 帮 务，用哲学的力量来帮助完成这任务。[第 434～
助，而 且 是 指 导。 435 页]

不但 是 帮 务，用哲学的力量来帮助完成这任务。[第 434～
助，而 且 是 指 导。 435 页]

不但 是 帮 务，用哲学的力量来帮助完成这任务。[第 434～
助，而 且 是 指 导。 435 页]

第二部分 唯物论与唯心论

二 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产生基础

.....

三，唯物论的进步性也是有例外的：

抗日阵线中
唯心论与机械唯
物论的两面性，
在其向日本帝国

机械唯物论在近代辩证法唯物论出现以前是
进步的，在后者出现以后，却成了反动的逆流。

因为机械唯物论所代表的阶级，这时已不是
进步的了。

主义斗争上与在其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时是进步的，在其向辩证唯物论斗争上与向辩证唯物论斗争时是反动的。这种同时存在的两面性，规定了辩证唯物论应该联合唯心论与机械唯物论，同时又批判之。

四，唯心论一般地是剥削阶级的哲学，所以不是进步的。

它的反动性表现于用主观空想的迷梦掩蔽了客观事实的真理。可以分为三点来讲：

甲，唯心论巧妙地使宗教迷信合理化，精神支配物质的思想，即是神支配世界的信仰在哲学形式上的伪装。

乙，唯心论常把夸大的理想，蒙蔽着人的如实观察事实的眼睛，这样把压迫现状合理化，使人安于被压迫的状态。

丙，唯心论常是利用人类知识不足的地方，用空想来填补它，在科学的有缺点的地方寄生地存在着。[第 444~445 页]

六 二元论

.....

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

七，二元论在中国也有传统，中国的中庸思想常常就被人曲解为折衷主义，或妥协调主义，张君劢^[1]在他代表国社党给蒋委员长的信中说

[1] 张君劢（1887—1969），江苏宝山人。1932年4月发起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鼓吹社会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1934年4月，被选为国社党中央常务委员兼总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4月代表国社党致函蒋介石，表示愿共赴国难，并称：中国的民族性是“不走极端而好调和”，当时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中庸性之重要文献。”

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是这样的。

到中国的民族性是中庸主义时，也就有这样的意味。

想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中间找一条另外的路的企图，在目前的中国可以看见不少例子，然而都是不能不成为二元论性质的东西。

只看见调和的方面，而忘却了斗争的方面，在今日对敌人抗战的中间是有危险性的思想，是在坚决抗战前面的动摇。[第 462 页]

七 客观唯心论和黑格尔的思想

英雄造时势，主要的是主观唯心论，他并不必承认什么客观的心。教育救国也一样。

二，客观唯心论在社会变革的问题上的表现，就是英雄造时势的思想，社会的变化是英雄的目的和意志的实现，而不是依着一定的物质法则的社会的运动。

要动员群众作社会变革的运动，也只要完全依据精神上的鼓动，而不必从物质上作丝毫的改善，——这见解也是客观唯心论。中国过去的教育救国的主张也是这一种唯心论。

三，客观唯心论的反动性：

甲，与宗教上的宿命论观点联系：一切都是神或伟大的精神的目的意识作用，被压迫者的反抗是无用的。

乙，英雄决定一切，故人的生存只能绝对

因此，馬克思主義是超經驗的、超於階級利益的東西，這樣割倒了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性，革命性。

考茨基把哲學看做「私事」，沒有反對康德主義的影響。

否未有無
主客之分
（主張認識不是客觀的反映而是與客觀物質不同的「象形文字說」）。

七，二元論在中國也有傳統，中國的中庸思想常常就被人曲解為折中主義，或妥協和主義，張君勸在他代表國社黨給蔣委員長的信中說到中國的民族性是

中庸主義時，也就有這樣的意味。

制又反对而

只看見體和的方面，而忘却了鬥爭的方面，在今日對敵人抗戰的中間是有危險性的思想，是在堅決抗戰前面的動搖。

制制制制

八，新康德主義在中國也有個別的影響，如張東蓀的思想就是明顯的例子。

七 哲學唯心論和黑格爾的思想

一，客觀唯心論是人類思想主觀的能動性的誇大，把它擴張到客觀世界的一

毛泽东读《哲学选辑》批注的手稿。

他本來是物事物裏去。

二、承認客觀事物的存在，却以爲一切客觀事物都是某種精神活動的產物，而不是物質的自然運動。

客觀唯心論多少總有着目的論的內容：一切事物都是偉大精神的有目的的活動，或一定的公式規定下的運動，世界的發展就爲着完成這目的。

把精神的原理作爲世界發展的基礎，以爲抽象的原則、公式高於具體事物，因此就有公式主義。

三、客觀唯心論在社會變革的問題上的表現，就是英雄造時勢的思想，社會的變化是英雄的目的和意志的實現，而不是依着一定的物質法則的社會的運動。

要動員羣衆作社會變革的運動，也只要完全依據精神上的鼓動，而不必從物質上作絲毫的改善，——這見解也是客觀唯心論。中國過去的教育救國的主張也是這一種唯心論。

三、客觀唯心論的反動性：

甲，與宗教上的宿命論觀點聯繫：一切都是神或偉大的精神的目的意識作用，被壓迫者的反抗是無用的。

乙，英雄決定一切，故人的生存只能絕對依賴和服從於大人物。

丙，物質痛苦要絕對忍受，絕對只要精神的快樂。

毛泽东读《哲学选辑》批注的手稿。

依赖和服从于大人物。[第 463 页]

第四部分 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

一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反映论

.....

形而上学唯物论以为真理的认识就是绝对完全的客观反映，以为真理可以一次把握尽净。

辩证法唯物论认为客观的绝对真理不是一次可以把握尽净，真理的认识是不断地更深刻和更完全地反映现实的过程。

因为客观物质是多样性的，有着无限的多方面的内容，有限的认识能力不能一次汲尽。[第 478 页]

认识能力在各个阶段是有限的，在全历史上是无限的，方能逐渐地把握绝对真理。不承认这个认识能力的历史无限性，就要陷入不可知论。

第五部分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

二 质变量、量变质的法则

.....

二，什么是质？质就是一事物本身的规定性，是使此事物与他事物有区别的规定性，.....

.....

三，质和属性。我们凭什么来把握一事物的

质为主要矛盾所规定，属性为次要矛盾所规定。

质的规定呢？凭属性。

甲，属性就是特点，或特性，又叫做“固有性”，一种质里包含着无数的属性。

乙，属性是一事物在对外的关系中反映出来的质，事物有无数的关联，所以也有无数的属性。

属性的认识，就是要把握“这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的全总体”^[1]。

丙，属性有主要的和次要的分别，主要的属性是和一事物的质分不开的，质的规定决定于主要的属性。[第491~492页]

一切属性由质所决定，质为主要矛盾所决定。^[2]

这样，质的规定性自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把握到的，必须经过各方面的观察和考察，但因为根据这观察、考察所得的感觉经验，就可以作具体的规定，所以费尔巴哈说：“质就是感觉。”

那么，什么是理性？

质是根据感觉经验在理性上把握的，感觉得到的只是规定质的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8页）

[2] 以这样排印的是毛泽东写的批语，下同。

矛盾的物质体。

单只把握属性还没把握质，要根据属性进一层研究才能把握质。

在于肯定质的安定性
旧统治阶级的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

把握了属性，就把握了具体的质，就能够认清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种类的对象有什么不同。

[第 492 页]

六，量变质。……

……

乙，量变质是中国的中庸观念的基础，也是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基础，要维持一定的质，人的行动必须在适当的量的限度内，不能过或不及。

中庸观念是有一定的真理内容的，它的错误不在于了解量变质的道理，而在于从形而上的观点上把这道理绝对化，使它变成死的不变的道德标准。

两条战线斗争的标准，因实践的发展而不同，但中庸主义则是不管时代的发展，只定下死的永久的质量的标准。

对主义。

虽然是各方面的量变，但是属于两大主要方面的各方面的量变，这两大主要方面之一方面的量变小了，另一方面则变大了，于是过程的质就变了。

质为矛盾的统治方面所规定，质变即矛盾的被统治方面转变为统治方面。

新质就是同旧质的矛盾方面相反对的矛盾方面所规定的质，这种反对方面的量变到了最大限度，就引起整个过程的质变。

七，质变量。

甲，旧质转化为新质，在新质的基础上立刻有新的、更迅速的、更高度的量的发展，这就是质变到量变，或质变量。

丙，事物的质有各方面的规定，所以量变是各方面的量变，研究量变质的过程，也要从各方面的量变来考察。

质变是各方面量变的互相关系的变化的结果。

丁，量变的中间，同时就有新质的准备，所以结果才达到质变，新质的出现不是无根据的。

乙，质变量表示量的发展^[1]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在一定的阶段上要有突变和飞跃。[第494页]

八，渐进与飞跃。……

……

丙，飞跃有各种形式，因着事物不同而有差异，飞跃也不是毫无时间性。飞跃完成的时间长短，也因事物而不同。[第495页]

这一句是多余的，而且不甚正确。

三 对立统一法则

……

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意义：……

甲，同一性可以从三个意义上了解：

(一) 互相依赖，……

坟墓都是自己掘的

物本身，就包含着或者发生着与自身对立的作用，如资本家要发展自己，就不能不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发展的作用。速决战斗发生持久战的作用。日本侵略中国就不能不产生唤醒中国的作用。

用。……

(二) 互相渗透的关系上的，即是说，一事

物本身，就包含着或者发生着与自身对立的作用，如资本家要发展自己，就不能不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发展的作用。速决战斗发生持久战的作用。日本侵略中国就不能不产生唤醒中国的作用。

(三) 互相推移或互相转化，……

乙，斗争性的意义。斗争性表现在互相压

[1] 毛泽东将原文“量的发展”改为“质的发展”。

抑、互相排斥的作用上，事物必须压抑自己的否定或对立的方面，以显出自己的存在，以保证自己的存在，以维持自己的质的安定性。质的不变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维持的。……

质的暂时不变就是在这样情形下维持的，质的终久必变也是在这样情形下出现的。原文只说了斗争的片面意义，而且是保守的意义。

丙，斗争性并不一定表现为对抗。对抗是对立发展到成为物理上的外力冲突的形式时的表现。它只是矛盾的一种形式，矛盾不一定要采取这种形式，没有这种形式也不见得就没有矛盾，没有内的对立和斗争。

均衡是统一的一种状态，一种暂时的过渡的状态，如凡尔赛条〔约〕^⑩后的暂时相对稳定局面；也有互相依

丁，同一性或统一，也不是均衡。均衡是两种相反的力量互相抵消的状态。这里没有对立的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作用。对立的统一不需要两种相反而又相等的力量，否定的方面在发展的当初可以极小，而在发展中可以壮大起来，原因是正面的东西不能不依赖它。所以，辩证法的信奉者要看重发展的方面，不管这方面

[1] 凡尔赛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签订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简称《凡尔赛和约》。条约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暂时缓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作用。对立统一体对于此种暂时地相反而又相等的力量，不是什么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此种状态必然成为暂时过渡之一形态的问题。均衡论是均衡绝对主义。承认暂时过渡的均衡，不是均衡论；否认了它，则必变为诡辩论。

的力量是如何小。如果相信均衡论，就会对于发展方面不能自信，而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戊，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一定条件下的斗争与一定条件下的统一，原文忽略了这种一定条件，说了结果忘了原因。

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的，而且互相推移的。没有一定的斗争不能有一定的统一，所谓“不打不成相识”。没有一定的同一性也不会有斗争，日本侵略中国就是由于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有同一性的缘故（即前者不能离后者而生存）。

.....

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

但这分别也不能太绝对，统一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一定的统一形式，但这里也就包含了这样的意味，即：只要条件具备，只要在这样的意味，即：只要条件具备，只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那统一也是绝对可能的。所以列宁说：“相对的东西中间，也包含着绝对的东西。”^[1]（《哲学笔记》）[第497～500页]

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

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这才是列宁“相对中有绝对”之意，不是什么“统一之绝对可能”。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承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至上），而在整个历史上又否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是暂时的）。

五，矛盾的特殊性。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是以多种多样的矛盾为其原动力的，运动的特殊性，是由于矛盾的特殊性。

依时间说不是并存的，依空间说是并存的。

矛盾的多样

甲，矛盾的多样的性质，不是并存的。而是在发展和转化中互相关联的。矛盾的存在，首先用对立的互相刺激、互相促进（由于同一性）而引起事物的量变的发展，量的发展愈前进，对立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2页）

性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事物在历史发展中表现的多样；第二，是在空间中各种不同矛盾的并存。

的斗争性愈尖锐，最后不能不形成对抗或破裂的状态，也就不能不要求矛盾的解决。矛盾的解决并不是矛盾的消灭，而是新的运动形态或新质的产生，在这时，就又同时发生新的矛盾，这就是矛盾的发展和转化，是矛盾的多样性的来源。
[第 501 页]

一切皆有消灭。一切具体的矛盾皆要消灭的，这是相对的消灭；但消灭了又发生，这是绝对的保存。

是旧矛盾的消灭，新矛盾的发生。

决定基本性质的是那基本矛盾的基本方面，即占统治地位的方面。

丁，基本矛盾和主导的矛盾，一事物（或过程）虽包含着不同的许多矛盾，然而决定这一事物（或过程）的根本的性质的东西，是那基本的矛盾。例如社会的生产和私人的占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的矛盾。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是决定于中国的对内的反封建和对外的反帝国主义的矛盾。

基本、主导，主要意思是一样的，将他们区别起来是不对的。

但一过程的各阶段也有质的变化，其运动形态不同，决定于各阶段的主导的矛盾，例如中国目前的革命采取了抗日的形式，这是由于对日的矛盾在目前阶段上成了主导的东西的缘故。

.....

基本的方面不一定就是发展的主导方面。物

质决定精神，然而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作用有主导地推动发展的力量，如社会运动中的文化运动之类，主导的方面决定一定发展阶段的质，正如主导的矛盾一样。

这是不对的，基本方面就是主导方面。物质对精神主导，他就包括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五四运动之成为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他反过来又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原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

可能性基本的只有两个，并没有多个。这是因为一事物在一过程中，只有一个基本矛盾，而这个矛盾的两方面各有一种要求，故有两种可能性。但现实性只有一个，则是因为矛盾斗争的一方面被另一方面压倒，破坏了一个可能性，故只

主导方面的存在，对于事物的发展前途有很大的意义，要看事物从那一个方向发展，就要看那一种矛盾或矛盾的那一方面起主导的作用，因为所谓能起主导作用，就是能够压抑对立的方面而使事物向着自己所向的前途发展的意思。政治上的领导权，战争上的争取主动，都是主导作用在人的努力中的表现。任何事物发展的前途都不会只有一个，这就因为可能成为主导的方面不只一个的缘故。[第 502~503 页]

剩下的一个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也有第三种可能性的，则是因为次要矛盾的存在，如社会中有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之故。然基本上只有两个可能性，因为基本的矛盾方面只有两方面之故。

矛盾的两方面，可能成为主导方面的基本上只有一个。如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只有无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中国民主革命在无产阶级幼〈幼〉稚时代，只有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同盟会）；而在无产阶级政治上觉悟了的时代，他就成了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主导方面。

.....

（五）这样，辩证法要反对两种对于自己的曲解：诡辩论和折衷主义。

诡辩论就是把否定的方面夸大，把肯定就认作否定，把同一性看成对立性的曲解，……

折衷主义是把肯定和否定同等看待，是一种

“模棱两可”的思想，……

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平列看待。

诡辩论是简单地抛弃了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折衷主义是把同一律和矛盾律机械地平列起来，其实两者都是形式论理学的变形，而不是辩证法。[第 508 页]

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

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四 否定之否定法则

.....

一，什么是否定？这里先要了解的，有以下几点：

.....

乙，否定不是简单的绝对消灭，而是旧质的

发展。……

简单的绝对消灭，是形式论理学的了解，诡辩论把否定片面夸大，也是形式论理学的一种。否定中包含发展的理解，在生活上是很重要的，它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可以以后退的方式来促成前进运动，军队上的以退为进，中国旧思想中的相反相成（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1]），就是一样的意义。

丙，因此，否定的范畴，是对立统一法则的展开，这就是说：在发展的否定阶段上，仍有肯定的要素；否定不是怀疑、动摇的否定，而是更进一步的肯定。

这也表现辩证法是大无畏的思想方法，工作中的任何失败、退后，在辩证法看来，都有着进一步地成功和前进的要素，“失败为成功之母”，因此可以再接再励。

后退现象，是矛盾双方一方被他方击败而发生的；而且被击败的一方是新质，若击败旧质，则不叫后退，而是前进。因此，后退是过程内部的现象，是量变现象，不是新过程代替旧过程的质变现象。此书弄错了。

过程内部新质与旧质斗争，因旧质处于优势，故常能打败新质。然败者继

丁，发展过程的中断，不是辩证法所要求的否定。是不是一切退后或失败都是前进和成功的基础呢？如果在这中间不能依据失败或退后的经验而继续努力，那就成了单纯的否定，这种单纯的否定，是把发展的进程中止了，所以不是辩证

[1] 参见《老子》第四十章。

续积蓄力量（量变），到了自己处于优势时，就能打败旧质，完成一个质变的否定。

麦苗、私产都不是后退。

战争辩证法是和平——战争——和平，此书也错了。

法所指的否定，因为它没有进一步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如人吃了鸡蛋，或揉碎任何一朵花，都不是辩证法上所指的否定。因为这不是鸡蛋和花的本身的发展，而是它的生命的中断。[第 509~510 页]

二，什么是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法则，在形式上就是把否定的阶段再否定一次，但从内容上来说还有更深刻的意义：

甲，否定之否定是一事物从开始发生直到充分发展（或完成）时所经过的过程的规律。这过程在形式上是经过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肯定事物的萌芽形态，否定是萌芽的展开，它表现为与萌芽形态对立的发展形态，表现为发展的退后或否定的形态，……。如植物是麦子的否定，同时也就是麦子的生命的展开，因此终于发展到生出新的麦子的阶段。私有财产是原始共产的否定，同时也是生产力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也准备了将来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放弃大城市及抵抗中的一切退却，都是抗战的否定形式，然而这也正准备反攻力量的不可免的发展阶段，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可以发展到实际反攻完成抗战的阶段。十年内战否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然而也并不是白打的战，因为经过这十年的经验教训，使两党都有了必须要长期合作，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使今天的统一战线

得到一个有力的保证。

整个宇宙发展即无数过程的继续，是向上的、直线的；每一过程内部是前进与后退交错的、曲线的。

每一过程对下一过程言是肯定，对上一过程言是否定，对再上一过程言是否定之否定。说一过程内部有质变三阶段是不对的。

乙，这样，否定之否定法则又表示，发展不是直线，而是螺旋的发展，从出发到完成，中间总要经过一定的退后和挫折阶段，前进运动和后退运动是互相交错的。在革命的斗争中，不单只要懂得前进，而且也要懂得退守，懂得以退为进，和在退后的运动中准备力量。

丙，这样，在否定之否定的阶段上，常常表现着肯定阶段上的许多特征的恢复。……

丁，否定之否定是不是绝对的完成呢？当然不是。它只是表示发展的一个段落的完成。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是旧的发展段落的结束，同时又是新的发展段落的开始。因此它对于新的发展段落，又是一个肯定，又是一个出发点。然而这出发点是新的发展的出发点，不会再回复到以前的否定阶段。

……

己，三个阶段中间的关系是：否定阶段在否定形式上包容和发展了肯定阶段的积极内容，否定之否定又包容和发展了否定阶段上的积极内容，所以否定之否定不仅外表是肯定的复归，不仅把第二阶段再否定，而且是前两阶段发展成果的综合。所以黑格尔又以正、反、合三个范畴来表示三个阶段的关联。[第 511~513 页]

否定之否定法则只能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向导，而不是绝对的公式。我们根据这公式，要看出每一事物在什么条件之下发生，在什么情形下发展表现为退后的形态，……一切都要作具体的研究。[第 513 页]

发生、发展、消灭是一个过程的事，不是三个过程。固然发生又表示上一过程的消灭，而消灭又表示一下〈下一〉过程的发生。然而，每个过程都有这三阶段，不是说三个过程，其第一叫作发生，其第二叫作发展，其第三叫作消灭或完成，这是错了的。

第六部分 唯物辩证法的诸范畴

二 本质和现象

.....

本质即为矛盾所规定的该现象的性质。矛盾体的斗争表现为现象，又规定该现象的性质。不了解矛盾，不能了解本质，也不能了解现象的发

一，本质和现象的范畴，是反映一切事物都有“外表形态”和“内部关系”的两个侧面。前者就是现象，后者就是本质。本质常常被现象所掩蔽，认识的任务就是要分析现象，揭发本质。为什么呢？

甲，要从联系上来看事物时，我们需要揭发本质。直接从外表来看事物时，只看见事物的外部关系，不能了解深刻的联系。例如政治与经济，在外表上是两个东西，而在实际上却是同一

生与变化。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是没有区别的，只在本质上是有区别，这就是内部的区别。

社会机构两个方面，而且经济关系是政治的本质。

乙，从发展上来看事物时，也必须揭发本质。因为事物的发展，正是它的本质的发展的表现，不了解本质，即不了解发展的内部的源泉，在这样的意义上，本质就是事物的“内蕴”。

丙，因此，在对立统一法则上来看事物时，首先就要求本质的认识。因为直接的现象中只看见事物的对立或事物的同一性，不能同时看见对立而又同时把握同一性。一事物在直接表面的现象上看起来就是这一事物（即只看它自身的同一），但从本质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事物的同一性，尤其是和它的对立的东西的同一性。要真正深刻的了解事物，必须从它和其他事物的这种同一性上来了解。如从抽象劳动上来了解商品的价值，从经济发展法则上来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等。[第 519~520 页]

三 根据和条件

.....

根据即基本矛盾，而基本矛盾即是规定事物本质的。

一，什么是根据？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应该这样来了解根据：

甲，根据和本质是同列的范畴，本质的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就是根据。

乙，事物的根据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又叫

做“理由”，发展以一定的根据为基础，“主张”以一定的理由作基础。理由必须是从本质上去找，以表面现象为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汪精卫以近卫的声明^[1]为理由而主张妥协，就是一例。

丙，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如中国革命的基本的矛盾就有民族矛盾和民主的与封建的矛盾的两方面。把各方面的矛盾都把握了，就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或有了充足理由。[第 522~523 页]

根据只能有一个是基本，其余均是次要的，被基本根据所规定的，即基本理由与次要理由之别。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封建势力一般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充足理由，即是把握了基本矛盾即基本根据；次要矛盾与外的矛盾都是条件。说理如把根据与条件都提到才算完备，这是对的。但这种“各方面矛盾都把握”，不能仅称“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1] 近卫，指近卫文麿（1891—1945）。1937年至1939年、1940年至1941年任日本国首相。1938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发表声明，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同时声称，如果国民党政府仍继续“策动抗战”，日本政府“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在华扶植新的傀儡政权。同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近卫又两次发表声明，对蒋介石威胁利诱。早与日本政府进行勾结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近卫声明后，进一步主张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并于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三，条件：……

甲，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

乙，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

丙，本质的条件和非本质的条件，也就是重要条件和次要条件。……

丁，顺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条件不只促进发

展，也有阻碍发展的。认识的任务就是要看出这两方面的条件，以便在实践中造成胜利条件，克服困难条件。[第 523~524 页]

条件不顺利
即是条件不具备，也即是敌人的条件是具备的。此一条多余了。



毛泽东批阅的《哲学选辑》。

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6月1日)

今天是你们的三周年纪念日。抗大办了三年了，我们的抗战快两年了。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抗大三年以来创造了很多的坚强的抗日干部，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今天，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汪派的人——投降主义者，投降派；他们不赞成抗战到底，他们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讲和，主张妥协投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是蒋委员长所号召的，全国人民所拥护的。“反对投降，抗战到底”，我们抗大，一致的拥护。我们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人不抗战到底，不能有一人不反对投降，不能有一人赞成和平妥协的；如果有一个，就不是抗大的学生，是抗大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全国各党派也是一样，不许有一人讲和，要全体一致的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根本主张。过去三年是这样，以后三年，以后很多年也是这样。“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政治方针。……



1939年6月，抗大举行三周年纪念大会。

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1]

(1939年6月1日)

正当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坚决不挠的抗战到了第二周年的时候，英国的援华委员会在全国各地举行了“中国周”以表示援助我们的抗战。我代表朱德同志与八路军的将士，代表我们前线与后方医院中的士兵，并且我自己也想说一说，这种同情与关切的表示，是多么使我们感到兴奋的鼓励啊。我们向在国际反侵略阵线中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英国人民表示感谢并致热烈的敬礼。

中国两年来的抗战已经证明了民主势力抵抗侵略的力量。这两年来的抗战指出了，甚至一个工业落后的，在民族生活上受着各种各样的压迫与侮辱的国家，也能满怀着胜利的信心抵抗最野蛮最横暴的法西斯进攻。而且还证明了，不仅不能把中国的抗战和全世界反侵略的力量分开，而且我们给侵略者的打击，已使我们的国家，在维护全世界的民主与文明的国际斗争中，在反法西斯的主要阵线中，站到了最前线。

战争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英国人民以物质援助我们的抗战，捐给我们医药用品，派送救护队到中国来服务，对我们作了许多实际上同情的表示，这正说明了，虽然我们与英国相隔很远，我们的抗战对于英国人民并不是一件无关轻重的事情。但是由于我们抗战在

[1] 这是毛泽东为英国援华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周”写的文章。

全世界反侵略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我们有权利要求得更多一些，要求比以前所给我们的更多的援助。

首先，我们要求你们严格注意你们政府的态度，你们要压迫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不再输出军火给日本。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英国在重庆的大使馆与总领事馆，在日本来首都滥肆轰炸的时候受了损害。对于这种侮辱，英国政府却只表示了一种外交上最软弱的姿态，只报以一纸抗议。正是这种态度鼓励日本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就到处扫除英国的利益。英国人民抑制远东强盗并且同时援助中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对他们的政府施以断然的压力，要它立即实施对日制裁。

日本的共谋犯，法西斯的德意两国，在这两年内，与它狼狈为奸地破坏和平，摧毁国际条约，掀起血腥的惨无人道的战争。它们的活动已经形成了对英国安全的一种直接威胁。这里就有了另一个理由，使英国人民一定要强迫他们政府支持中国的抗战，并且自己也要采取与中国对反侵略的阵线所作的贡献相辅的步骤，反对法西斯主义并不需要我们从事于个别的战争。威胁是普遍的，因此现在必须在全世界和它作斗争。

举例说，最近日本在占领区域里加强了反英的宣传。因此，援助中国，援助那跟远东的敌人作战的国家，对于英国人民的自卫也是必须的。

鉴于上述的种种情形，我们向你们建议，请你们采取具体有效的办法，加强英国的政策，使英国政府与人民在遏制日本侵略者的愿望与行动中得以站在一起。

为了我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与自由，我们已经坚决地斗争了两年了。在这两年中，日本军阀利用了汪精卫之

类的卑鄙无耻的失败主义者，想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破坏我们的抗战。

但是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在这过去两年中，中国人民的团结已经成熟，而我们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决心也大为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都更坚决地执行着我们共同的决议，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战。像汪精卫之类的失败主义者，以前还能躲在后方阴谋投降的，现在已不能够隐藏他们的真相而被揭穿被赶跑了。

英国与中国地理上是相隔很远的，但两国人民要打倒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愿望却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了。让我们拉起手来打倒人类的公敌。

中英两国人民联合起来！

为《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1]

(1939年6月1日)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竞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毛泽东

[1] 《中国妇女》，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办的刊物，月刊。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创刊所写的题词。

革命潮流，卷起至高，而弟一策，为甚
作。男女平等，天日方东，以此制敌，而於敵
制之大，此其功也。故予追下，有是
光成。有辱人矣，不平之念，以備
之仰，仰首向天！

毛泽东

中国妇女出版社

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的题词。

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名^[1]

(1939年6月1日)

中国妇女

中 妇 女 闻 古

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的刊名。

[1] 《中国妇女》杂志于1939年6月1日在延安诞生。是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本全国性的妇女刊物。毛泽东同志热情关怀和支持《中国妇女》杂志的创刊，为创刊号写下了热情洋溢的题词并为其题写了刊名。

在延安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6月6日)

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模范青年是代表中国老百姓，要一生代表他们。

自己代表还不够，并且还要教训儿子，中国革命没有成功，要长期斗争，永远奋斗。



1939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

[1] 1939年6月6日，西北青救会在延安召开模范青年授奖大会，毛泽东为模范青年授奖并讲话。这是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6月7日)

蒋介石有借口对付日军而占领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河防必须坚守。对国民党的态度，须准备在对方态度急转直下时我们的应付，在某些方面可采用较温和的态度。庆阳方面必须守住，那是我们的生命线。延安应召开干部会议，延安机关学校实行必要的军事布置。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河防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反投降提纲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

(1939年6月)

报告

(6月10日)

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

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一、日本的诱降政策，二、国际的压力，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今分述于后：

一、日本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

(一) 日本对华基本方针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这是坚定的、不变的，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也是变不得的。

今年一月二日东京《国民新闻》（军部机关报）的社论说：“眼前现实的课题，已不容寸尺后退，瞬间踌躇。事变入于收拾期，万一国步的统制有疏漏，则不但将丧失战果，且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后期是比初期困难好几倍，历史上有过教训，欧洲大战时代德国和俄国不幸的事例，为政者和国民须得深加洞察。”（《世界知识》二月一日出版的九卷一期）

做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针非贯彻不可，否则有德、俄革命的危险。由此可知，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卢沟桥以前状态（蒋介石，国民党许多人），只是梦想。

（二）它的“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针（总路线）是坚定的，不会自己动摇的，但是它执行此基本方针的方法（或策略）是软硬兼施的，有伸缩性的，并可作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让步，以求达其根本目的。

大体上：卢沟桥以前——政治诱降为主；卢沟桥至武汉——军事打击为主；武汉到现在——再以政治诱降为主。

（三）为了明白敌人根本方针的坚定不移与其施行策略的软硬兼施，只要看下列各种材料就可知道：

1. 卢沟桥以前——规定硬的方针，并实行占领东三省，对全中国则采取外交诱降办法。

（1）满洲事变前的田中奏折（一九二七年即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函致宫内大臣一木喜法，请代奏明天皇者）有云“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规定了灭亡中国的方针。

（2）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占领满洲。

(3)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1]声明（天羽代表外务省发出声明）有云：“东方和平日本负责为之，反对中国与东方和平抵触之行为，反对他国任何妨碍东方和平之举动。”公开表示其灭华方针。

(4)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广田三原则（广田在议会正式宣布三原则），即：第一，对日亲善，第二，承认满洲，第三，共同防共。

(5) 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秘密条呈，结论六条，均表示施行方法之软硬兼施。

2. 卢沟桥到武汉——为执行其硬的方针，采取坚决的军事进攻方法为主，辅之以政治诱降。

(6)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外相广田宣布不扩大主义。我党八月决定^[2]曾指出这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但同时含有“降则免打”之意。

(7)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陆相杉山在特别议会的战争演说，“断然决定膺惩，陆军当局已采取重要措置”。表示方法是硬的，打，为着降。

(8) 开战以后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据英国《标准晚报》称，日政府负责人曾以这些条件提交蒋介石，内容凡六条：A. 内蒙独立；B. 华北自治；C. 上海占领地作为日本租界；D. 山海关到安南^[3]沿海的捕鱼权；E. 中国退出国联；F. 不得设空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解放报》）表示所要的东西，至今大体上不出这

[1] 天羽，即天羽英二（1887—1968），当时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7年8月25日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3] 安南，今越南。

个范围。

(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后，二十七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凌发表谈话：“日本帝国决不满意于今日的成功，盖距总局之前途尚远，帝国军人基于帝国之总意，为东洋永久之和平，希望达到彻底进步的目的。”表示要继续军事进攻。

(10) 广田的除夕（一九三七年）演说：“友邦中国若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能免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于一九三八年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表示方法是可以用软的，只要降。

(11) 有名的一月十六日宣言。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占领前两日）阁议决定，十二日御前会议通过，十三日占领南京，十七日中国蒋委员长发表告国人书，到一月十六日政府就发表此宣言。其大意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新政府成立。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与列国在华权益。表示方针是硬的，方法也是硬的。

(12)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驻华大使川越茂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奉令返国，参赞日高留沪，但留沪目的，并非尚欲与中国政府交涉，而是与外国外交人员接洽可能发生之事件。与国民政府重开交涉之门户已经关闭，即使国民政府将来重新考虑其态度，亦仅能与中国新组织交涉，不能以日本为对手。”从一月十六日宣言后，以战为主，以和为辅，打倒蒋介石，建立新政府，此谈话最露骨。

(13) 但战中仍有和。一月二十日路透电所传广田在七十三届议会中宣布德国调解的和平条件四条：A. 放弃联共抗日，承认“满洲”；B. 在若干地带成立非战区，在此区内设立管理机关；C. 中、日、满经济合作；D. 中国赔款。此为最低议和条件，即陶德

曼^[1]交蒋之条件。蒋曾拟考虑接受，汪精卫的《举一个例》即指此（蒋、二陈、何^[2]，还有孙、于、白^[3]都参加讨论接受问题）。最后蒋拒绝，广田乃在议会宣布。

(14) 一月下旬在七十三届议会中：

近卫^[4]的开幕演说——“战争之解决，尚须长久时日”“现政府采取坚决之政策，嗣后不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

广田演说——宣布陶德曼提交之四条件（见前）。

民政党议员——要求政府保证，嗣后决不与国民党政府讨论媾和条件。

议员岛田俊雄——质问为什么不对华宣战？

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要点：A. 绝对不与国民政府交涉；B. 为阻止军火运华，仍可对华宣战；C. 对华北新政权居监护人地位；D. 绝对不容第三者调停。

但至一月二十九日那天，近卫又在本届议会表示：“宣战之举仍在考虑中，视中国将来态度为断。”和平之门仍然是开的。

此乃反映日本政府中主和派与主战派之斗争，杉山为此曾于此

[1] 陶德曼 (1877—1950)，当时任德国驻中国大使。

[2] 二陈，指陈果夫 (1892—1951)、陈立夫 (1900—2001)，浙江吴兴（今属湖州市）人，当时均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何，指何应钦 (1890—1987)，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3] 孙，指孙科 (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于，指于右任 (1879—1964)，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4] 近卫，即近卫文麿，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时发表“必须准备长期战争”之文告，与主和派对抗。

(15) 日本驻沪大使（维新政府^[1]的）谷正之，三月九日发表谈话，谓：“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但须继续加紧战争促蒋政权倒台，并使第三国放弃援蒋企图。战争以外之法如能使蒋氏议和，则耗费较少，效力更大。”一个人一次谈话中主战又主和。

(16) 五月二日近卫演说准备长期战争：“为推翻蒋政权，铲除东亚祸根，虽费数年光阴亦所不惜。同时，全国国民应极力援助华北、华中两亲日防共政权。”

(17) 五月九日广田在地方长官会议演说，主张慎重处理事变：“中国事变进到第二阶段，蒋介石政权宣传长期抗战，从事于国内之团结，但未能达到团结之目的。〔其〕他方面，各国军需品之输入及苏联援助中国，这是事实。因此，帝国政府必须顾及此种事实，慎重处理此次事变。津浦线占领之时，临时^[2]、维新两政府即刻实行合并，帝国政府对此极力加以支持，使能合并统一，并圆满健全发展。”敌以军部与外务省一个代表硬，一个代表软，但或硬中带软（军部之特务机关），或软中带硬（外务省），装红白脸。

(18) 徐州陷后，敌声言打到昆明。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二十二日敌前线指挥官发表谈话，谓：“徐州攻陷，战争并未停止，战争步骤有三：第一步即徐州大战，第二步进攻汉口，第三步进攻重庆

[1] 指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它在名义上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日本占领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1940年3月并入汪精卫伪政府。

[2] 指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它在名义上管辖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日本占领区和北平、天津两市。1940年3月并入汪精卫伪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

或昆明。”不亦硬哉！

(19) 六月十七日永井递信大臣发表谈话，谓必须打倒蒋政权：“目前政府之对华政策在于打倒蒋政权，援助新政府，建设新中国，奠定东亚永远之和平。其他政策亦须沿此路线进行。”

(20) 张高峰事变^[1]时，外传日本向中国提出和平五条件：“日苏边境纠纷日烈，有成为大规模战争可能时，中日和平空气今日（八月五日）又盛传于香港，上午《孖剌西报》首传日本向中国求和五条件，下午各晚报均刊载。五条件是：A. 日军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军；B. 承认“满洲国”；C. 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九十九年；D. 赔偿此次战争损失；E. 共同防共。”

(《星岛日报》二十七年八月五日，香港通讯)

(21) 板垣^[2]的强硬论。七月一日板垣发表谈话：“在蒋政权依然存在之时，中日间绝无和平可能，今日日本不能再与蒋介石携手开和平谈判。”七月七日，事变一周年纪念日，板垣发表谈话：“今后战争，无论延长多少年，帝国所走之路只有一条（按：指以武力征服中国），除此以外，不能达到东洋百年之和平。”

(22) 设立对华院，总揽对华统治大权——总裁副总裁即五相。不但占领区，而且非占领区，均归其管辖。

(23) 九月二十九日军部赶走宇垣^[3]。宇垣因对华政策与军部不

[1] 张高峰，即张鼓峰。1938年7月底8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交界处的张鼓峰地区，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军战败求和，在莫斯科订立张鼓峰停战协议。

[2] 板垣，即板垣征四郎（1885—1948），当时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

[3] 宇垣，即宇垣一成（1868—1956），1938年5月出任日本内阁外务大臣，同年9月辞职。

含愤而辞职。

3. 武汉到现在——策略改变，由硬到软。

(24) 十月十二日占领广州，二十五日占领武汉，看见三十日蒋介石发表主张长期抗战的告国民书，故日本政府择了十一月三日明治纪念日即所谓天长节这一天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明显地表示改变策略。其要点为：A. “国民政府已为一地方政府，如继续抗日，则该政府歼灭以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B. “日本之目的，在于建设东亚长治久安之新秩序，即日、华、满三国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C. “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予以拒绝。”政策已变，宣布废止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必须建立伪政权之政策，声明可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须蒋下野。

(25) 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即汪精卫通电拥护、蒋介石演说痛驳之声明。其要点：A. “中、日、满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互相结合，互相亲善，并实行共同防共，以及经济提携”；B. “因此，中国必须与‘满洲国’树立完全之国交关系”；C. “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在特定地点驻军防共，以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区域”；D. “中日经济提携：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之自由，在华北与内蒙予日本以开发与利用资源之便利”；E. “日本允许考虑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重申十一月三日宣言的基本政策，加具体内容。只要降日，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允许蒋存在自此始）均可存在，华中、华南可以退出，华北是要的，但主权名义仍可不要。

(26) 平沼^[1]内阁继续此方针，至今不变。

[1] 平沼，即平沼骐一郎（1867—1952），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27) 日本在中国策动广大的“和平运动”，设立所谓“和平息战会”，到处开大会、发传单。设立统一中央政府，很久不提了，虽偶一提及，无外吓蒋，除非蒋抗战到底，它是留以待蒋的。

(28) 离间国共合作、利用三民主义的大阴谋。日人松本慎一做了一篇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的文章，其中说：

“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彻底打击抗日政权及军队，第二在要日支两民族提携、融合及东洋和平之确立，前者乃达成后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证诸支那之现实，实为互相对立之矛盾。试观事变以来之经过，抗日政权之指导原理虽属谬误，但蒋政权已具有民族政权之本质，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数之支持。现政权所以能得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和抗日联合各界以及旧军人之热烈拥护者，即缘于此。今吾人，一方欲击灭蒋政权，他方欲与支那民族相提携，事实上诚不啻缘木求鱼。盖欲倒蒋，愈使支那民族拥蒋。要倒蒋就不能抓住民众，要抓住民众即不能倒蒋，故我国根本困难即在于此。”

“临时、维新两政府，尚无民众基础，有民众基础则南北两政府自不难合流。而新政府之纲领，应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旗帜，新政府之任务应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实现。或曰：敌人之旗帜与我相同，难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抗战，一面实行三民主义’为号召，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

“国共之合作，乃抗日联合阵线之基干，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

“武汉作战之目的，乃在分散国共合作，故武汉占领好似在国共间插入一个楔子，战略政略双方都在分散国共力量。”

(上文见《大公报》本年一月二十三日)

(29) 上海《导报》还在二月十七日就指出了远东慕尼黑的危

险：“一方面，它在实事求是，努力加强地方政权，组织所谓江汉政府之类。别方面，它在进行更大规模含有国际性的阴谋。这阴谋的主要企图是压迫和诱骗英、法两国来用国际会议的形式（公开的或秘密的）强迫中国与日本妥协，虽然日本曾声明不愿第三国参加解决中日冲突。”并且说：“认为汪精卫完事大吉，是不对的，他将来还可起极恶劣的作用。”

以上我举的二十九条材料，说明日本对华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下列三点：

第一，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它一定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第二，但它的实行方法是软硬兼施的，并且依时有所侧重，武汉以前以打为主，但亦战中有和；武汉以后，以和为主，但仍略打一打，压使投降。

第三，它还努力策动英、美、法召集远东和平会议，远东慕尼黑的危险就压在中国人的头上。

（四）上说三节，第一节指出它的基本方针坚定不移；第二节指出它的实行方法软硬兼施；第三节从二十九件材料说明其施行方法由硬到软的历史发展，证明投降是当前的最大危险。现在这个第四节从它的财政、经济、军事方面说明其主和的原因。日本已处于财政（三年一百二十亿元，第一年二十五亿五千万元，第二年四十八亿五千万元，第三年四十六亿五千万元）、经济（输入大增，输出大减，军事工业打倒和平工业，物价大涨，人民生活恶化，现金用尽，外汇不稳）、军事（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大见困难的境地，它还要准备应付国际战争，故极力策动中国投降，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汪精卫劝诱蒋介石，并准备利用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它的这个阴

谋是十分恶毒的。敌人战不可怕，和则十分危险，《大公报》曾称为“缢鬼式之和平”，中国将无疾而终。

(五) 为表示和之诚意给国民党看，给英、美看，日本用大力“扫荡”八路军(华北十五个师团)，现又企图进攻陕北，作为促进国民党降日反共之一步骤。

以上是日本的诱降政策。

二、英、美、法的压力

中国投降危险成为当前最大危险的第二个因素，是英、美、法投降主义者加于中国政府的压力。

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们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

他们开始即鼓励日本进行战争，说什么“三个月就可打败中国”。他们随即让出上海，使战争深入内地去打。他们宁可使香港受包围，让日本占领广州和海南岛。他们大量供给日本以军需品，使日本有可能进行消耗战争。

他们又声言援助中国，并且已实行有所援助，借点小款，供给点军需，使中国有可能与日本进行消耗战争。他们常鼓吹“中国必胜”，使中国在消耗战争中增加勇气。

一切这些，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双方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

他们纵容德、意在西方的侵略行动，也是这个目的。

他们希望德国和苏联打，而他们从容观战，然后乘其疲惫而掠夺之。

他们始终不赞成苏联所提普遍安全计划者以此。

他们不愿意保障波罗的海三国^[1]的安全者以此（开一缺口便于德国进攻苏联）。

战争的片面性（侵略战争是危害英、美、法利益的，但英、美、法却取旁观态度）的原因在此。

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

这些非侵略国与侵略国之间是有深刻矛盾的，但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

莫洛托夫^[2]谓“英、法有进步，但所谓进步是浮而不实的”，斯大林谓“不要被人利用”，即是说英、法的渔人政策并未放弃，不要上当。

英、法、苏协定有成立可能，但目前尚难乐观，成立了之后又有破裂可能。新慕尼黑危险并未消灭。

六中全会指出英、美、法政府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其人民。英、美、法人民反战反法西斯势力正在逐渐增长，只有这种势力才是最后可靠的。

苏联声明继续援助中国，但决不赞成中国投降。

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惫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

中国投降危险的第二个因素，就在这样的国际情况上面。

[1] 指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2] 莫洛托夫（1890—1986），当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

(一) 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1. 一九三七年五月苏区代表大会曾经指出：“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

2.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决定上说：“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平津的丧失就是东四省^[1]丧失后最严重的教训。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3. 六中全会指出妥协危机的严重存在，把反对投降妥协放在第一条。指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但同时指出其前途尚有障碍物，如不克服，则没有什么光明前途：“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

(二) 五中全会以后的国民党。

1. 五中全会还是以联共抗日为主要方向，但同时已包含反共降

[1] 东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1955年撤销，原辖地区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目的因素：（1）决定了依靠国际压力和平解决中日问题的方针；（2）决定了防共与反共的方针（但不是战争），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2. 主和空气笼罩一时：

禁止反对远东慕尼黑。最近到的一期重庆出版的《文摘》，把一篇题名《英国会在远东来一个慕尼黑吗？》的文章删去了。

许多刊物发表提倡依赖英、美制裁日本的文章，其意即开国际调和会议解决问题。

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

“国民党投降可能”这一点，历来就存在，但在今天已成了最大的危险，如不克服，中国抗战将受到极大挫折。

3. 国民党已在进行其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即是反共，反共是投降准备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半年以来，华北、华中、南方、西北反共活动特别厉害。在华北：八路军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国民党从共产党手里“收复失地”。在西北：共产党没有超越边区寸土，国民党则用武力侵入边区许多地方（镇宁、宁县、旬邑、靖边、瓦窑堡）。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

一切都是借口，进行投降准备工作则是实际。

制造了无数的假文件。

以上三个因素、三种原因，使目前时局处于投降派与抗战派的严重斗争中，投降可能成为当前的最大危险，而反共正是准备投降的一个必然步骤。

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如不自己动摇，则敌人的诱降政策无所施，国际的劝降压力无所用。

这种情况是与六中全会时不同的。那时，抗战还在高潮，十月

三十日蒋之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之驳斥近卫演说就是证明。现在，是在敌人以诱降为主并已生效的时候，是在英、美加紧策动投降的时候，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依靠英、美并执行反共政策之后。所以，那时，虽以反投降为第一条，但实际没有现在严重。

八个月以来，时局变到反共、投降最为严重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增加了新的具体的任务，这就是用全力反对投降。

准备投降的各种借口：

第一个借口——共产党捣乱，这是不对的。伪造文件。边区的被攻。八路军的无饷。全国执行良好的统一战线政策，拥蒋拥政府。全国无土地革命。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作战。

第二个借口——苏联阴谋，这是不对的。一九二七年帮助中国革命。两年来援助中国抗战最大。它没有阴谋侵害过任何一国。各国多与它通好结盟。

第三个借口——财政经济困难，这是不对的。只要采取六中全会的新政策就能克服任何困难。过去红军即现在八路军克服困难的经验是明证。

第四个借口——人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日本正作这种宣传，这样说不啻响应日本宣传。人民不满兵役法，是怨恨方法不对，不是怨恨抗战。又极端地压制民运。

第五个借口——军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污蔑抗日军。多数官兵的为民族解放而战。多数官兵的厌恶内战。

第六个借口——国际无援，这是不对的。抗战主要靠己不靠人。苏联的有力援助，各国人民的同情。英、美、法政府本不可靠的。

第七个借口——敌人太强，这是不对的。敌人已消耗了很大，三年要用一百二十万万元，兵力不足与分散。我之地形好，士气盛。

还有许多借口。

抗战的前途（大概估计，不能死看）

然而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

国民党投降可能与继续抗战可能是两个可能。有投降者，有抗战者，又是两种状况。

“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这是一方面。“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这又是一方面。（均见“八月决定”）

抗战可能有两个前途：第一前途——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第二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战。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第一前途，也是长期的曲折的；第二前途，则更是长期的曲折的。

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不发动全国人民，不实行国家民主化，可以克服投降，取得胜利。克服投降，取得胜利是要人民的大多数来干的，是要各党各派的一切爱国进步分子来干的。

不能设想，国民党整整齐齐一人不剩地投降。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全党投降帝国主义，举行反共

战争。但那时的情况是：（1）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来；（2）所有帝国主义都赞助蒋介石反共，各国在暂时稳定局面之下；（3）国民党没有吃过反共战争的苦，能够动员军队；（4）全国人民没有尝过反共战争的味道，没有受痛苦的教训，也没有被欺骗的经验；（5）共产党没有统一战线失败期间的经验，又没有武装力量（都失败了），主要的没有战争经验；（6）世界不是革命与战争时期，而是反动时期；（7）苏联没有今天强大。

然而还有宋、何、邓演达^[1]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

“九一八”以后，有冯玉祥，有蔡廷锴^[2]，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3]有吉鸿昌、任应岐^[4]，有张学良、杨虎城，有陈济棠^[5]、孙科。

[1] 宋，指宋庆龄。何，指何香凝（1878—1972），广东南海人。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他们都是国民党左派领袖。

[2]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1932年指挥十九路军参加淞沪抗战。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3] 赵博生（1897—1933），河北黄骅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董振堂（1895—1937），河北新河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1901—1934），河北沧县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旅长。1931年春，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同年12月，该军1万余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4] 任应岐（1892—1934），河南鲁山人，1934年5月与吉鸿昌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任应岐同在北平遇害。

[5] 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1936年5月28日，和李宗仁联合其他两广将领发表通电，表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对日宣战。

况在今天，有两年抗战历史。

假如有米亚哈^[1]，有哈恰^[2]——中国也不是西班牙、捷克。

一、有投降者（这是必然的，已有汪精卫，还会有张精卫、李精卫），也会有反对投降者。

二、有坚决投降，一往不返者，也会有一时投降准备再战者。

三、有先降后战者（有些人要当一回汉奸才能变好），也会有先降后战再降者。

四、人民与军官可能初受蒙蔽，后来觉悟反抗。如像“共产党捣乱”“八路军叛变”“国际情况不佳”“财政异常困难”“苏联要赤化中国”“暂时屈服徐图反抗”等欺骗，是必然会到来的。

五、敌人必不让有一个全国统一不受干涉的投降集团存在，它必然采取四分五裂政策。那时，可能有许多傀儡政权同时存在，以便利其统治。各种武装投降者之间可能发生内战——中国是内战最可能（地大，经济分散）与最有经验的国家。

六、敌人可能先让一步，然后干涉。当其让步时——可能投降；当其干涉时——又可能决裂。

七、佛朗哥^[3]并没有收容米亚哈，希特勒也没有收容哈恰。日

[1] 米亚哈，即何塞·米亚哈，西班牙内战期间任马德里城防司令。1939年3月5日，与卡萨多、贝斯泰罗发动反共和国的军事政变。3月28日，向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所领导的叛军投降。

[2] 哈恰，即埃米尔·哈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38年10月，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接受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逐步置于希特勒德国的控制之下。1939年3月，又被迫将捷克地区改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区”，划入德国版图。

[3] 佛朗哥（1892—1975），曾任西班牙陆军参谋长。1936年7月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1939年4月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统治。

本最后只会收容汪精卫一类。

八、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缴枪必打，这也是肯定的。

总之，那时必是一个混乱局面，不是一个统一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那时，日本与英、美、法的冲突是可能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正是中国革命长期性、曲折性的实际。

不能设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现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能设想，这种政府能够争取最后胜利。我们一次也未希望过，也未说过。

只有愿意动员全国人民的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府，才是能够领导抗日胜利的政府。

旧东西的改造，经过叛变与克服过程。

那时，可能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

那时，中国可能有三种性质的政府——日本的傀儡政府，半傀儡政府，抗日政府。这几种政府间的斗争，将组成所谓相持阶段的局面。所谓相持阶段，可能正是这样情况的阶段。

不能速胜也因这种情况。

不会亡国也因这种情况。

将来抗战局面不外二途，如前所述：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如果是第二种前途，则其可能情况如上所述。但第一种前途，目前并未绝望。原因在于：

在国内——一、许多军人拥护抗战；二、国民党中的抗战派；三、共产党的反对投降；四、人民的反对投降。

在国际——一、苏联的援助；二、西班牙、捷克的教训；三、

欧美人民的舆论。

在日本——财政、经济、军事的困难。

但是要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才能办到。

如果出现第二种前途，那就不但是政府的分裂，而且是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分裂：

日本人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在做，经过汪精卫，这是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

中间性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萌芽，正在奔跑，这是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

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发生，正在发展，这是真三民主义与真国民党。

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是否可以避免上述那样分裂（分裂是必然的），要看国民党、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如何。

因此，相持阶段的可能情况便有几种：

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的相持阶段——即克服投降可能，取得大部抗战，打下去，除开破坏日本的政治阴谋之外，还停止它的军事进攻。这是第一种情况的相持阶段，这是最理想最希望的。

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的相持阶段（共产党与一切不愿投降的人是要继续抗战的，即使是小部）——即使大部投降了，剩下小部抗战，但只要能巩固小部，巩固抗战根据地，亦能与敌相持，如同过去小部红军在根据地上与敌相持一样。不同的，过去是内战，今后是对日本与对汉奸，而不是内战。

在站住了脚，不是继续后退了这一点上说来，在它是全国唯一的抗日军这一点上说来，这也是一种相持局面。

这是第二种相持局面。

三、由小部再到大部的相持阶段——这是第三种相持阶段。

由于小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将投降派所把持的阵地分化过来，再争取大部抗战。那时，如果还不能对敌人反攻，则还是一个相持阶段。

我们力争第一种相持局面。不得已再是第二种，且其前途还有第三种。

危险是存在的。但总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还在一九三七年苏区代表大会就指出了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还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又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

十一月又指出民族投降主义与阶级投降主义的危险等。

这些，我们都预料到了的，它的发生并不是突然的。

抗战前途，不外好坏二途。我们力争好的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们也有办法。

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我们历来反对速胜论与亡国论，今天仍一样。

以为地主资产阶级叛变就等于亡国，这是没有看到：一、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二、抗日友军中的抗日情绪；三、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四、资产阶级中目前不愿投降者；五、沦陷区仍然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六、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七、苏联的援助。不看见这些正在生长的力量，只看见地主资产阶级投降了，就认为整个世界都黑暗了，于是发生惊慌失措、动摇逃跑等现象，

这是完全不对的。

六中全会说，相持阶段必是“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的阶段。更加困难，就是敌人之外，还加上投降叛变。更加进步，就是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抗日的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便能更加进步。一部叛变，大部抗日——这种情况是我们希望的，过去这样希望，现仍如此，要力争之。大部叛变（甚至一时表现为全体），一部抗日——这种情况不是我们希望的，但是可能的。如果出现，我们就要把它颠倒过来，这也是可能的，也要力争。

当前的任务

估计到上述好坏两种可能情况，特别是可能的坏的情况，党的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

第二，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

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

第三，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党的一般任务就是这样。

基于上述的任务，党应注意对下述各问题了解、解释并进行必要的工作：

一、六中全会的方针与现在的方针之间是否一致问题

六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六中全会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积极团结全国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因为六中全会文件的发布，更加深入人心了。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因为六中全会的指示在全国更加发展了。

现在，投降危险与反共阴谋成为当前主要危险，故须指出这种新的情况（过去还不是事实，只能一般指出，现在已有成为事实之可能，故须具体指出），才能克服投降危险，并准备如果投降由可能变为事实时及时采取必要的对付政策，但基本方针仍然是六中全会的，并且只要指导适当，可能使抗战的实际内容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二、为什么此时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问题

这里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

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

那时，不能再是民族战线，但我们也有太绝对的地方；现在，必须坚持长期的民族战线。

那时，是革命的整个失败，党的路线是退却然后进攻；现在，没有路线上的退却问题，现在是继续进攻中发生局部的暂时的战术上的保守或隐蔽随即准备进攻的问题（如果投降变为事实的话）。

那时，因为反动时期到来，党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以致队伍混乱，步骤错误（如盲动主义）；现在，则在沦陷区，并准备在投

降者占领地，应该作有秩序的退守（有的暂时的，有的长久的）或反攻，而在其他区域则继续进攻方针。

那时，新党员大批脱党或叛变；现在则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这类事情，故须先有准备。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但须注意好好带领新党员，尤其是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将来是有用的。

那时，国内国际的情况是黑暗的，现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时，中央是被机会主义统治着，改造后的中央亦无经验；现在没有这种情形。

那时，尚没有造成大批干部骨干；现在已经造成了。

以上，我作了八条比较。虽然如此，仍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便胜利地克服困难，发展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到一个更高阶段，而避免可能的失败。

三、为什么假如投降成为事实时还要坚持民族战线、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问题

主要理由已在说明抗战前途时说过了。这里只说：

（一）在全部抗日过程中必须都是民族统一战线，虽然由于叛变，许多地主资产阶级都走开了，并变成敌人，但地主资产阶级的叛变是逐渐的，不是同时的，留下的成分必须与之合作。忽视这一点，势将铸成大错。故全部抗日过程中，统一战线依然应该是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集团、各军队的统一战线。

（二）国共合作也是一样，若干国民党员离开了并成为敌人，但留下的若干仍应是合作的。我们要用真国民党反对假国民党，争取中间性的国民党。国共两党平等联盟的前途还是存在的。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忽视这一点，也将铸成大错。

(三) 三民主义也是一样，它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二者有其一致点，即在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那样解释时，二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上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党内党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骗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

(四) 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反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在旧式半封建政权没有改变为真正革命民主政权以前，边区与八路军是必须存在的，只有在革命民主政权成立之时，反共危险消失之时，二者才可放弃现在这样的特殊性，否则只是反革命的要求而已。

四、拥蒋问题

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

的表示。

但蒋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时，我们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当然，那时不能不有表示，但须是适当的表示，应以有利团结多数抗战、有利国共继续合作为原则，而不能随便地轻率地恢复“反蒋”口号。

蒋对于共产党存在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

五、反汪问题

“认为汪已完了是不对的，汪还能起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对的。汪之汉奸系统较之其他汉奸更大程度地危害中国，没有疑义。汪在政府中、党部中与一部分军队中有其群众与同情者。

反投降必须联系于反汪，是更便利与更实际的。

六、抗日除奸问题

在假如严重叛变事件发生之时，党应极力注意对付的适当，以不脱离国民党多数为原则。

那时，抗日除奸的口号是必须的，抗日除奸的战争（同时抗日又除奸）也是无可避免的，但决不可离开国民党多数而轻举妄动。只有在为多数人所了解与要求时才能（也必须）发动除奸战争。例如现在的反汪，是合乎这个原则的。

七、民主民生问题

没有革命民主政府，要领导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国广大人民之渴望一个抗日的、给人民以自由的、民主集中制的与廉洁的政府有如望岁，故“争取民主”应在今后“反对投降继续抗战”的运

动中与之联结起来。

“改良民生”的与之联结也是一样。不过，只有抗日才有实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与民主才有改良民生可能，这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实际，应该明白。

八、磨擦问题

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在边区所举行的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磨擦及武装斗争，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这种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

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严防挑衅，不要上当。

九、友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及从某些军队中撤退党的组织问题

半年来经验，在抗日的与我合作的军队中不去发展党，这个六中全会的决定，根本上是对的。在中国军队中发展共产党，一般应限于汉奸与准备变为汉奸的军队，目的是在破坏之，其他则不应发展。任何军队，只要变了汉奸军队，或直接准备变为汉奸军队，都应采取坚决的破坏方针。某些抗日军队中已因党的组织问题发生了有碍合作的问题时，应公开表示撤退，以求合作之继续。

十、援助友党问题

(一) 极力援助那些进步分子，但也依进步程度而定援助程度之不同。

(二) 拒绝援助那些退步分子、无希望分子，以免其扩充力量之

后反噬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有了许多教训。一句话，不作无条件的援助。

(三) 极力加强对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的工作，推动他们反对投降，必须要很多有能力的干部去做，一刻不能放松。对中间分子也要加紧工作。

十一、六中全会后中央各部的工作

三年来，特别六中全会以来，逐渐恢复与建立了各个中央工作部门，除军委会、组织部、宣传部、敌区工作部、青委建设较久外，统战部、妇委、工委、财政经济部、干部教育部、总政治部、党报委员会、华北华中委员会、西北委员会、南方委员会都是新建立的，秘书处亦改进了组织，共十六个机关。这些中央工作部门的恢复与建立，是在长征大破坏后的一大成绩，一大令人高兴的事。

十二、中央组织问题

(一) 政治局会议以后每周一次。

(二) 书记处处理日常事件。

(三) 通知，大事用中央名义，小事用书记处。

(四) 人员分配，以保证中央领导健全、同时加强地方领导为原则。

(五) 中央各部既紧缩又加强。

十三、干部教育

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十八年来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学

生现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绩，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见了。

今后仍应继续这个方针。为物质与敌情原因，分在边区、华北两地办。去华北的，指挥管理仍属中央，但委托北方局监督之。

十四、学习运动

(一) 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二) 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三) 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

(四) 是一种长期大学校。

(五) 每日二小时学习制。

(六) 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七) 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

(八) 勤学者奖，怠惰者罚。

(九) 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与人员。

十五、生产运动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

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

十六、青年运动

六中全会以来，有成绩。青委与青年联合办事处集中指导青运是对的。

青运方针：坚持青年统一战线，继续采取五四致三青团书的态度，用以争取青年的多数在继续抗战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十七、妇女运动

中央发布了妇女运动的方针，开始建立了妇委的工作。地方妇女工作指导机关亦正逐渐建立中。我们历来最缺少的干部是妇女干部，妇女运动经验亦没有总结，这个缺点必须补救。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开展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

十八、工人运动

发布工运工作方针，开始建立了工委，开办了一个工人学校。工人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是比较薄弱的，党的成分中工人亦太少，今后应该在这两方面有进步。

十九、锄奸工作

新环境下敌人破坏我党我军与边区政府的阴谋，已逐渐显得严重，今后必更严重，大大增加了我们锄奸斗争的重大性。因此全党必须增加这一方面的注意力，必须派出与训练有必要数量的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一部门中去。

凡国民党员因特务工作或武装向我进攻而被逮捕或俘获时，一般以不杀不降为原则（不降，谓不强迫其写自首书，不强迫其声明放弃自己信仰），以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

二十、党的组织问题

(一) 精干。现在不是普遍发展的时候了，一般应停止发展，以精干为原则。

(二) 严密。

(三) 消除破坏分子，保卫党。

(四) 阶级教育，马列主义。

(五) 严格执行秘密训令。

二十一、自力更生

党，军队，一切。

准备对付最恶劣环境。

二十二、华北问题

华北局面有变到极严重的可能，敌人主力有进攻华北的可能，因此八路军与华北党必须严重注意这种情况的可能到来，而从军事、政治、财政、党的组织、统一战线各方面进行准备，以适合坚持游击战争应付最大困难为原则。

华北的党有责任供给中央必要的经费，这种经费的政治意义是极大的。

二十三、华中问题

必须大大发展华中的党、游击战争与民众运动的工作，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必须有更好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新四军工作的发展与进步联系起来。边区的干部以主要输送华中为原则。

二十四、保卫边区

(一) 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央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地方，必须坚决保卫之；

(二) 敌人进攻边区是促进中国投降的一步骤；

(三) 敌人有进攻延安之可能；

(四) 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争生活，最艰苦但是最生动的生活；

(五) 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六) 学生与工作人员大批上前线；

- (七) 好好保护与教育青年学生、新干部、新党员；
- (八) 保存一个领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军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众，一定有办法。

二十五、动员大批学生及工作人员上前线

- (一) 加强教育，加强前线工作；
- (二) 毕业后依然上前线，早上前线为强；
- (三) 因为敌情；
- (四) 因为经费；
- (五) 决定去一万人；
- (六) 政治上、组织上好好动员；
- (七) 后方便于领导教育与打游击战争，但人员还是不少；
- (八) 干部须作适当的分配；
- (九) 学生必须酌量多留一些于后方；
- (十) 学校名义必须保存，前后方同。

二十六、七次大会^[1]

- (一) 八月一日前选举完毕；
- (二) 十月开会；
- (三) 为团结全党反对投降而斗争；

[1] 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37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同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准备“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讨论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正式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加紧完成准备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必要工作”。由于战争和交通等原因，大会迟迟未能召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才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

(四) 能够来与能够开的。

二十七、两条战线斗争

(一) 反对右的：

看不见投降反共危险；

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

对时局无出路（失却前途）；

没有阶级立场；

在艰苦斗争面前恐惧消沉。

(二) 反对“左”的：

黑暗的中国，黑暗的世界，黑暗的边区，黑暗的自己；

准备破坏统一战线，否认国共合作，不要三民主义，把自己孤立起来盲干。

(三) 老干部应做基干，带领广大新党员新干部向抗战的更高阶段前进，向困难阵地攻击。

二十八、团结战胜一切

(一) 必须更加团结：

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

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全国人民的救星是共产党。

(二) 必须更加集中。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三) 全国团结一致，集中指挥，战胜一切。

结论

(6月13日)

一、时局问题

(一) 投降因素中，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是主要的，这是很对的。

(二) 要克服两种可能的投降——1. 克服小部投降。2. 克服大部投降。前者是目前的可能，在大部抗战情况之下的；后者是将来的可能，在假如大部投降了的情况之下的。但做了目前工作即是便利于做将来工作，二者统一不可分。

(三) 按照六中全会的定义，敌我力量在某些条件下的平衡才是相持阶段，那末，不但现在不能说相持阶段，如出现李精卫，则是敌人已组成了（它正在努力组织）它的新的战略同盟军，并使用之于作战——迂回我抗战阵地之后方（民族反革命是帝国主义战略同盟军，这是无疑的），这种时候，更不是什么敌我相持，而是我又打了一个大败仗。那时特点，打我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加上李精卫（中国佛郎哥），故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而不是什么相持阶段。

(四)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在没有打退以前，没有什么相持阶段。

(五) 正面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还可能进行军事攻击，说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是不对的。它在财政、经济、人力、军力各方面虽困难，但依实力说，依时间说，都还有军事进攻的可

能。所以，不但一方面须要打败从侧面进攻的新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准备继续打败从正面进攻的旧的敌人，才能取得敌我平衡，取得相持阶段的到来。

(六)但这不是说，要把这些正面的侧面的敌人在实力上打到各方面都与我抗日军相等了，才能出现相持阶段。不是实力相等，而是：我之实力+敌人弱点+国际牵制=相持阶段。

(七)于是，相持阶段能在三种情况下出现：

1. 地域大，人数多，阵线巩固，造成敌我相持。例如，俄国内战的中期，欧战的中期。抗战到现在的中国，地域大，人数多，但阵线不固（政治腐败，投降者捣乱），故还没有相持阶段。如能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并在克服过程中改造政治，阵线巩固了，相持阶段就来了。这是第一种。

2. 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目前的华北局势，可以说是暂时的、小部的相持，把华北局势延长下去，就变成长期小部相持了。

3. 由上述小部相持再变到大部相持，经过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而达到。如果那时还不能举行战略反攻（还是战役反攻期间），仍然是相持阶段。

(八)假如大部叛变之事不可免地要在抗战行程中出现的话，那末抗战的过程也许就要以下述的公式组织成整个相持阶段：武汉以后的暂时大部相持（目前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相持，但因阵线不固，故此时还只能说是暂时的）——某时以后的小部相持——

某时以后再来一个大部相持。

这种变化的主要特点，就是由阵线不巩固到阵线巩固。要长期相持，就要阵线巩固，有此条件，虽小亦能相持，无之虽大也不能。所以应力争数量之大（人多、地大），但主要的还在质量之强。所谓阵线巩固，就是抗日根据地之巩固加统一战线之巩固。

（九）华北确有相持形势，但这还是暂时的，我们提出“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想把暂时变为长期。如果别处都黑暗了，剩下华北（同样，新四军，陕甘宁边区），那它虽在地域上人数上是局部的，但因已没有别的抗日军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军，也就取得了战略相持的意义。这是困难局面，但我们也应准备。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也能干下去的。这样干个三五年，唤醒人民，吸引友军，又逐渐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阵线，那时，我们就成了抗日救国的核心与领导力量。

所以，不论如何说，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道路是艰难的。

（十）目前，正是敌我关系（敌我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看谁争取多数，更看谁的质量较好，以决胜负之谁属。谁胜谁败，这问题目前未决，双方正重新准备条件。

阵线是必然会改组，也必然要改组的。我之同盟军的一部（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可能改变为敌人的同盟军，但我决不让其全调去，我必须争取其另一部，也可能争取其另一部。我还有广大同盟军没有动员，中国农民，日本工农兵，国际无产阶级，苏联的力量，动员起来，便能制敌死命。

敌是反革命的，我是革命的，这个质的不同，决定最后胜利之属谁。但指挥战争的策略，尤其决定胜负之谁属。没有后者，单靠本质优良，胜利仍然没有的。

二、转变问题

(一) 我们说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哈，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之下的。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哈（或恰恰），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哈占领地区采取暂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设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是说，如果有转变的话，不是路线的转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暂时的转变，以防意外的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线。

(二) 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 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三、几个策略问题

(一) 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三月会议^[1]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 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弄好，如弄不好，老党员老干

[1] 指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

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 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

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 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称呼。

(五) 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六) 友党友军中停止发展党并撤退党问题。从大局看，停止与撤退是有益的，否则将因此一事妨碍大局，破裂统一战线。不争取中国军队，革命不能胜利，而争取目前主要的是从政治上，若组织党则妨碍政治争取。

靠嘴巴不靠组织，靠上层不靠下层（暂时情况下）。

一面撤退党，一面加强联络，同意统一战线工作的某种独立性。

一般只在真投降者的军队中、政府中、政党中，取组织上的破坏政策，其余，一般只取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某些特殊部门不执行撤退办法。

(七) 不杀国民党员，有重要意义。不是不杀汉奸，不是不杀某些叛徒，也不是不杀紧急时机的革命危害者。

(八) 不应过分强调民主民生。不适当的。目前应强调反投降(强调抗战)，不能同时有几个强调。是联系不是强调。

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

征兵、捐税、生产等问题，取赞成而又批评的态度，不能取根本反对态度。

(九) 地方策略。要有明确的适合当地情形与各种情形的地方策略。中央以后要注意指导。

(十) 要加强群众运动。所谓准备群众即指此。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十一) 回民问题。

(十二) 开办党内刊物。立即就开始办，地方上也要办。

(十三) 其他。

总的结论就是这样：团结战胜一切。



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

对八路军参谋会议的意见^[1]

(1939年6月12日)

左：

抗战快届两周年，集总^[2]召开参谋会议是有强大意义的，我们对此有如下意见希考虑：

(一) 会议方针应是总结两年来抗战中我军参谋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定参谋工作的总方向与目前急需进行的具体工作，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素质与工作能力。望技术参谋达到战术、战略的参谋的水平。健全指挥机关，不仅特别善于进行游击战争中的参谋工作，并能准备为转入现代正规战中的参谋工作。

(二) 会议在检查过去工作中优缺点，寻找其原因以求纠正缺点发扬优点时，应联系到过去红军时代的优良传统的发扬，特别是各种制度法规的审定（此间寄上的机要规则与作战科机密规则，可作讨论基础。已否收到，望告）。

(三) 为适应目前整军时期的需要，应健全各级参谋处教育科。必要时，以参谋长兼科长，设副科长，主要任务在供给教材，指导与检查教育的实施。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给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电报。

[2] 集总，指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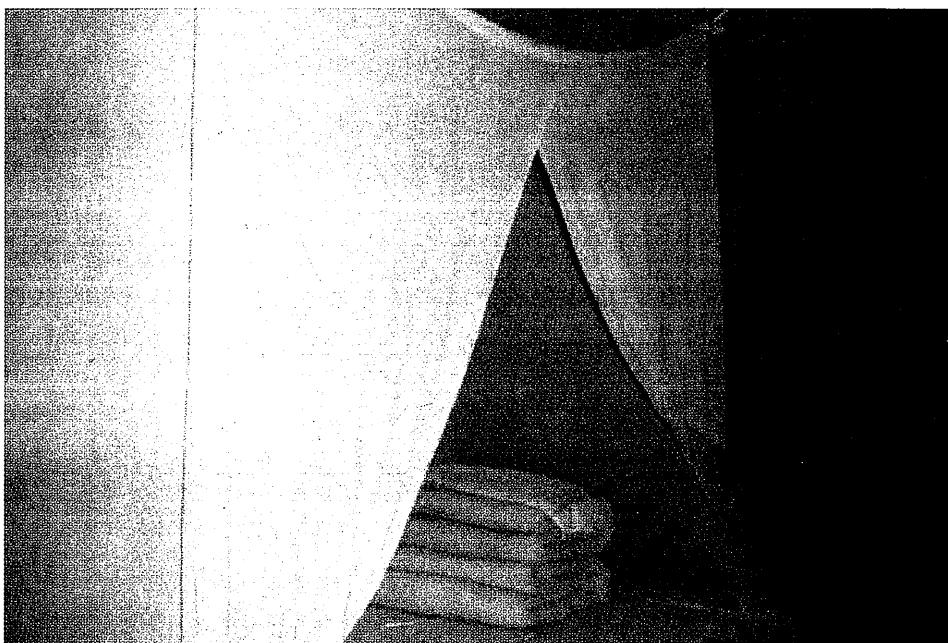
(四) 尽可能设法减少人员，在集总参谋处直接领导下办参谋人员训练班，以应各级参谋处的要求。

(五) 在职参谋人员的军政教育，应视为整军训练中的必要前提。

(六) 参谋人员政治条件、工作能力、政治地位与信仰的提高，是和提高参谋工作的效能不可分离的条件。

(七) 为使会议能顺利进行并获得完满结果，应作充分的准备，各个问题应分小组事先讨论，排除空洞的意见与琐碎的争论，要求有明确的方向与实际的具体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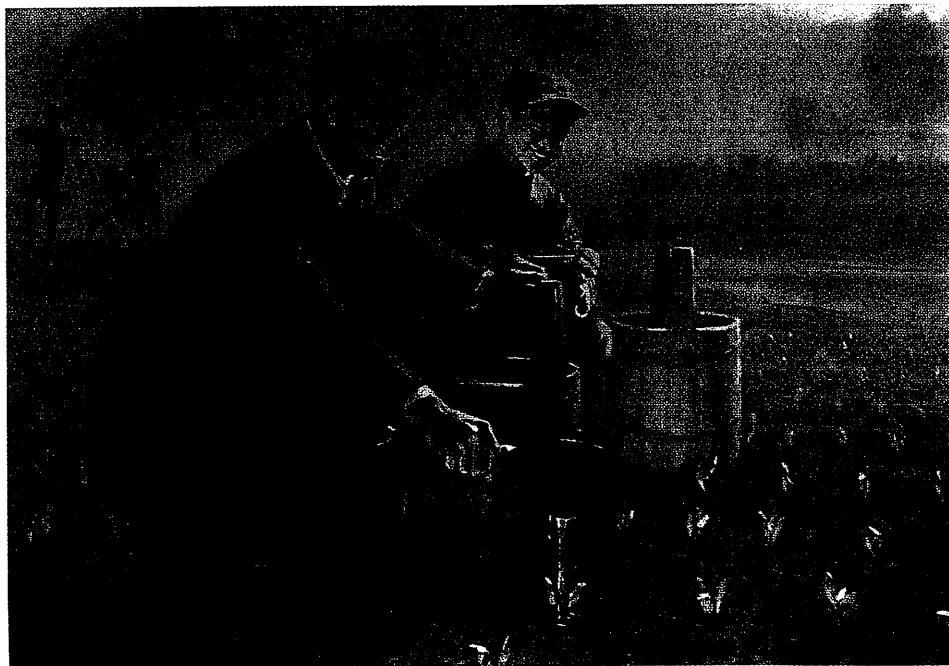
毛 王 滕



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故居中，彭德怀用降落伞为毛泽东制作的蚊帐。



毛泽东在杨家岭的故居。



《杨家岭的早晨》(油画)

给萧三^[1]的信

(1939年6月17日)

子暲同志：

(一) 大作^[2]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二) 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

(三) 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敬复。

毛泽东

六月十七日

[1] 萧三（1896—1983），原名萧子暲，湖南湘乡人，诗人。当时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部主任。

[2] 指萧三写的一本诗稿。其中一部分诗后来收入他的诗集《和平之路》和《萧三诗选》。

八月二日

- (一) 大作寄了，感谢你的批评，
但你对我的批评，我不能接受，因为
这些也都多是正确的，你对我的批评
(二) 《苏东坡集》已经放下。
来参加，你近来忙吧。
- (三) 是，待到你一下看，这封信
很急促。办得快点已耽搁时间长，
而你又不早些给我回信用一下；
不然的话，就将另立一个。

毛泽东

毛泽东致萧三信的手稿。

在鲁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

(1939年6月21日)

在敌人“扫荡”后，鲁南局面混乱。我应趁此机会，将第一一五师师部、第六八六团及萧华部队之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派得力的党政军干部任专员、县长、区长，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巩固鲁南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1]

(1939年6月24日)

在目前形势下敌探奸细与反共分子对我军的破坏工作一定积极化，并且他们可能相互结合。因此锄奸工作的重要性大为增加，我们必须用新的注意力对付新的阴谋破坏，从认识上、组织上以至技术上，改变到适合新的情况，这是当前锄奸工作的总方向。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谭政、吴溉之对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发出的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

反对投降活动

(1939年6月30日)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但是卢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1]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但是，主战派，乃是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说来，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的动摇分子。因此，所谓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雪片一样地制造所谓“共产党捣

[1] 国际投降主义者，指当时阴谋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英美帝国主义者。

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他们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许多所谓主和派分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让步，以便讲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你们看，国际空气如此，只得和吧！”“太平洋国际会议^[1]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2]，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这些，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

[1] 当时，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主和派阴谋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出卖中国。这一阴谋被称为“远东慕尼黑”或者“东方慕尼黑”。毛泽东在本文中所斥责的那种认为太平洋国际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说法。

[2]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交换条件。在1938年和1939年间，英美帝国主义曾经几次酝酿出卖中国来换取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1939年6月，即毛泽东作此文时，英日正在进行谈判，重新酝酿这种阴谋。这种阴谋同英、法、德、意在慕尼黑制造的阴谋类似，所以人们把它叫作“东方慕尼黑”。

整套做法，整套阴谋！^[1]。这一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2]，有些装红白脸^[3]。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4]，而不知其他。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5]、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内战的阴谋。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

[1]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就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观点、做法和阴谋。当时汪精卫是公开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蒋介石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

[2] 毛泽东这里指蒋介石和汪精卫彼此间的活动有如唱双簧的关系。

[3]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采取两面派的活动，一面还装着抗战的样子，另一面又用各种形式去进行投降的活动，就好像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演员，有的化装红脸，有的化装白脸一样。

[4] 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说出他的所谓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毛泽东因此特别提出抗战到底的界说，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以对抗蒋介石的投降政策。

[5] “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各种反动行为。

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让步的空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1]，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诱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国际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投降，同样是他们的阴险政策。他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如果寄希望于这些阴谋家，同样将大上其当。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

[1]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正与帝国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和发展”。同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日本政府利用蒋介石对于抗战的动摇，改取诱蒋投降为主的方针，在11月3日又发表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指导方针，更换人事，改弦易辙，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亦不拒绝”。

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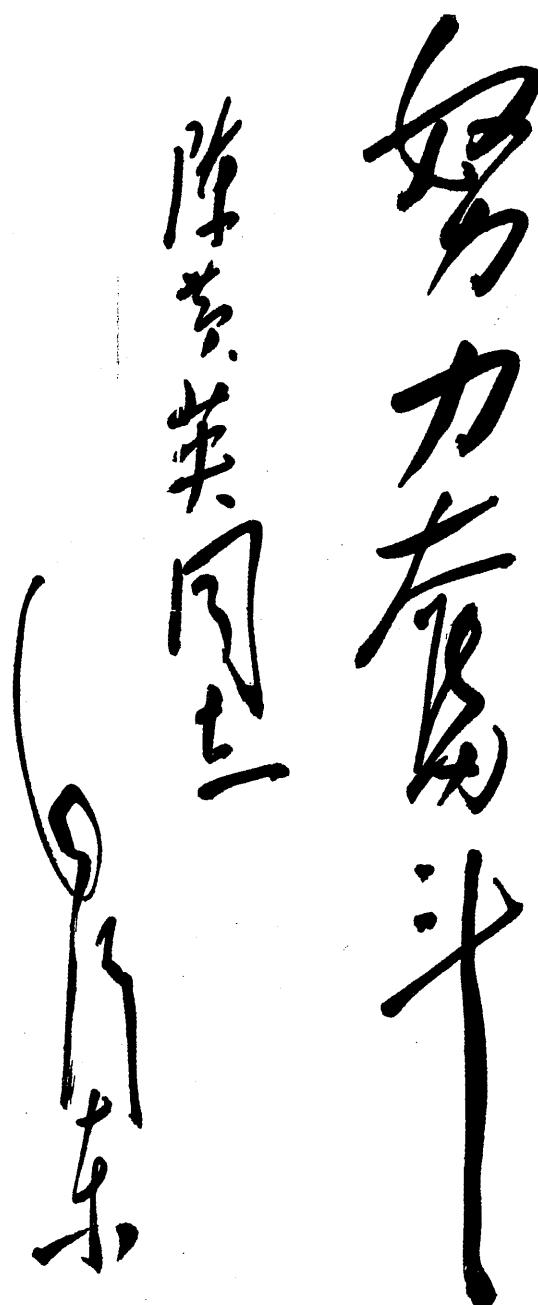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啊！

为陈黄英题词

(1939年6月)

努力奋斗。

陈黄英同志



毛泽东为陈黄英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7月3日)

这些文件指出反共、防共、限共，我认为防共、限共是国民党的防御口号，要强调反对内战危险，指出反共危险便是内战。这些文件中，都要强调反对内战。宣言中的文字要简洁些，纲领每条只要一两句话。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和致国民党书等文件时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反“扫荡”等问题 给李井泉等的指示^[1]

(1939年7月3日)

中国抗战已进入第二阶段，目前敌人在其占领区内的“扫荡”必较前加紧，我们在敌后反“扫荡”的任务也必然更加繁重和困难。因此必须加强我军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巩固党的组织，巩固部队的组织，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并乘绥东专员已逃的时机，大力建立当地抗日政权的工作，争取自卫军配合我军坚持抗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滕代远关于反“扫荡”等问题给李井泉、姚喆等的指示。

在华北联合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

(1939年7月7日)

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这是我们从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中国现在的革命，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武装斗争，其他就没有办法。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是指共产党要与共产党的同情者好好地团结起来。没有革命中心的团结，别的法宝就不能使用。

同志们，你们出发到前方去工作，要不怕困难，不怕麻烦，革命工作就是艰难而麻烦的工作。我们既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又要打汉奸，又要同反共顽固派作斗争，你们看多麻烦呀！

你们到前方去工作，要有远大的眼光，不但要争取民族解放，还要争取社会解放。

[1] 1939年夏，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工人学校、青训班合并，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在华北联合大学举行的正式开学典礼上，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为戴镜元题词^[1]

(1939年7月7日)

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

毛泽东

[1] 1939年夏，经过一年多的日夜奋战，戴镜元他们解读了敌军的“天书”。这是我军的一项重大胜利，它的成功对于前方作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副参谋长滕代远的陪同下，召见了戴镜元等同志，称他们为“无名英雄”，并挥笔为戴镜元写了这个题词。

坚持国共长期合作^[1]

(1939年7月9日)

统一战线这个问题，我想同志们讲得很多，听得很多，看得很
多，做得也很多了。今天同志们临别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讲这个
问题呢？同志们要知道，今天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克
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获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一切等等，都
得依靠统一战线这个法宝。

统一战线是什么？是抗战的团结，是各个党派、各个阶级、各
个军队、各个民族抗日的大团结，这个大团结就叫做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这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不但要是中国的，而且要是全世界的，
只有中国的是不够的。世界凡是能够反对日本侵略的，不管他反对
的程度如何，我们要统统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抗日统一战线。我
们这个统一战线有中国的力量，又有世界的力量，是一个伟大的团
体。总而言之，现在中国的统一战线已经组织起来了，已经成为一
个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

但是，在抗战的过程中，在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中，在这个大
团体中，许多人在打日本这条路上走着，有一部分人是会变的，现
在已经有变的了，将来还会有变的。走打日本的路，好像你们到华
北去一样，你们在路上日晒雨淋脸皮多少要变一点颜色，也可能跌

[1] 这是毛泽东对陕北公学赴前线同学演讲的一部分。

一跤脚上会掉一块皮，也许还有肚子痛等等，这些都是小变。还有大一点的变化，就是在路上也会有人开小差，不干了，就“逃之夭夭，溜之乎也”。同志们，你们这次到华北仅仅是一条短路，而我今天所讲的不是一条短路，而是一条长路，是要一直打到鸭绿江边的一条长路。在这条长路上，在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开小差的是一定会有的，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汪精卫。他一跑到越南，又一跑到香港，再一跑到上海。他说我们八路军“游而不击”，我看他倒是游而不击。他一游游到日本去见日本的天皇，再游游到北平，三游游到南京，但是他对日本侵略军从未击过，汪精卫才是真正游而不击。现在外边来的人说，在内地还有很多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等等，总之，有许多汪精卫一类的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就是暗藏的汪精卫。他们要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三国时代有一个张松，把西川的地图献给了刘备，因此刘备就入川建立了蜀国。今天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汪精卫第一个献了地图，还有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等等，他们也准备要献地图，他们企图把整个中华民国的地图献给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日本统治下的“中国”。所以我们说，现在有很大的危险，就是投降的危险，中途妥协的危险。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就是造谣，企图以此达到分裂的目的，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团体破裂，使国民党分裂。汪精卫在上海也组织了一个“国民党”，他的主义也叫做“三民主义”，所以现在有两个国民党、两个三民主义，一个是汪精卫的，另一个是蒋介石的。实际上，现在有三种三民主义：一种是假三民主义，汪精卫的就属于这一类；一种是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一种是真三民主义。我们首先是反对假三民主义，反对公开汪精卫与暗藏汪精卫的假三民主义、假国民党。汪精卫之流

分裂国民党，分裂三民主义，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整个的抗战阵线，他们的这种阴谋计划，一句话，就是企图以搞分裂达到投降的目的。这是当前时局的最大的危险、可能的趋向与重要的特点。这需要全国人民大家起来，首先是革命的青年，先进的各阶级，尤其是同志们，去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分裂、投降、妥协是退步的、倒退的，团结、抗战是进步的、前进的。投降分子反对进步，他们是向后倒退的。全国现在就有这种干倒退事情的人，干反共事情的人，干反科学事情的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的，他们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讲这个话的人就是汪精卫、张精卫、李精卫等等。我们问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呢？他们又回答不出来。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呢？中国的国情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问起中国国情是什么？回答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几个字。这是经过中外许多社会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所得出的结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病症，就是说我们中国有两种病：一种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种是封建势力的压迫。马克思主义是诊治这种疾病的最有效的良药，说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真是岂有此理！他们想用这一套反对进步的、倒退的、反科学的谬论来迷惑中国的青年，但是革命的进步的青年是不会上他们的当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在这条一直要打到鸭绿江边的长路上，有许多人会开小差的，汪精卫先开了小差，还有准备开小差的也相当不少，将来还会有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在半路上吃不了苦，也会开小差跑到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去的。但是，在他们没有跑出去的时候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跟他们讲亲爱，讲团结，大家共同抗日；要是他们跑出去了，那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它们就不客气了。在国际营垒里也是一样，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是

别的什么样的政府，只要是帮我们打日本的，我们都愿意跟他们做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统一战线。地主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他们只要是打日本的，我们就跟他们统统团结起来。但是，这里面有些人不想干了，要走，那就只好由他去吧！“阎王注定三更死，断不留人到五更。”现在的阎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他要请这些人去，被他请去的已经有汪精卫，还有张精卫、李精卫等等也准备要请去，这种事情在抗日过程中已经有过了，而且将来还会有的，这个道理我们大家一定要懂得。有人认为：这样，我们抗日战线的队伍不是缩小了吗？怎么办呢？我们看问题应当这样看：汪精卫当他还 在抗日战线内的时候，他总是设法限制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限制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组织的扩大；他跑掉之后，我们陕公、抗大可以多招收些学生，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等也可以多组织一些。抗战是长时期的，这些人出去的多一点，他们在统一战线中占的数量就减少，好的人进来的就越多。还有一个问题要说一下，就是现在看见汪精卫已经出去了，张精卫、李精卫也要准备出去，这样一来是不是地主资产阶级会全部出去呢？不会的，我们知道，地主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是要抗日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不要以为汪精卫开了小差，张精卫、李精卫也准备要开小差，恐怕就不是民族统一战线了，而变成人民阵线了，只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不包括地主资产阶级了，恐怕又要搞过去那一套，打土豪分田地了。现在有些人感到不痛快，土豪不能打，土地又不分。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知道，革命不是图痛快的事情，而是要艰苦奋斗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尽力做到：凡是能够多留他一天的，我们就多留他一天，能够争取多留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走也是好的。这一

点大家要懂得，就是要坚持统一战线。现在的时局有这个特点，就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不要把统一战线这个旗帜放下，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再讲长期合作的问题。现在开了小差的和准备开小差的相当的多，国共两党还有没有可能长期合作呢？我们回答说：有！汪精卫、张精卫、李精卫等等毕竟是少数人，留在抗日营垒里的人还是多数，我们把这个多数组织在统一战线里。这个统一战线依旧包括各党各派，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军队，仍然是一个抗日的大团结。长期合作依然存在，因为我们是跟抗日分子始终站在一起的。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合作，不然中国抗战是一定要吃大亏的。今天在同志们临别的时候，我送给你们“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我认为它就是姜子牙的“打神鞭”，专打妖魔鬼怪。我们有了这个“打神鞭”，就什么都不怕，可以打冒失鬼——日本帝国主义，也可以打怕死鬼——汉奸。同志们！历尽艰苦得来的经验，一定要好好地珍视它。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革命的经验，在遗嘱中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就是要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积十八年的革命经验，对于统一战线这个问题是有很深的体会的。

国共两党的关系，已经有了合作、分裂、合作三个阶段。十年的内战，大家都取得了经验，朋友们也有，我们也有，大家冷静地想一想，抗战胜利后两党还打不打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许多国民党的同志跟我谈这个事，抗战以后到底再打不打？我说：从前你们要“剿共”，所谓“剿匪”，我是土匪头，你们非“剿”不可，奇怪得很，越“剿”越多了。我们的党过去只是小指头那般大，多承

“围剿”，就大了起来，变成大拇指了。我们的枪是哪里来的？都是你们送来的。所有红军都是你们打出来的，红军的枪都是由你们送来的。所以，请朋友们想一想：到底打欤？不打欤？我们也想了一下，还是大家讲和吧！

但是，现在有些顽固分子总想反共，还想再打内战。我们说：我们是不想打的。从前我住在汉口，你们要打，没有法子，我就上了井冈山。现在你们要是再搞反共，又要打我们，我们就马上上山，但是我想还是大家都住在城里比较好。从前黎元洪说“有饭大家吃”，我们说再加一条“有敌大家抗”，吃饭、抗敌是大家都有份的，假使只是资产阶级地主有饭吃，工人农民没有饭吃，这就太不公平了。大家吃的粮食，住的房子，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饮水思源，这些都是由工人农民做出来的，但是工人农民倒没有吃，没有穿，这岂不太不公平了吗？我们主张大家都有吃有穿，就是说不要破裂统一战线。我们是可以长期合作的，虽然有开小差的，但长期合作还是存在的。你们上前线，一定要牢记这一点：坚持国共长期合作。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陕公同志们写信来提出过，学校方面间接地也向我提出过，这就是“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底是战略还是策略？”他们开讨论会，争论得非常热烈，大家弄不清楚。我想了几天，同志们不必争论了，把你们两方面的意见结合起来，也来一个“统一战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从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的主要打击方向，从制定革命力量的相应布置计划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它规定战略任务，确定和调动同盟军，这是整个战略计划。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作为骨干的无产阶级，它的同盟军在国内有农民群众、小

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及其他一切抗日分子，都组织起来共同抗战；在国外，美、英、法、苏等国是我们的同盟军，大家联合一起打日本。这样，在国内在国外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至于如何进行抗日，具体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这是策略的。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例如抗大、联合大学，工会、农会、青年救国会，等等。将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地主、资产阶级都组织起来开参政会，这也是一种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对于现在的参政会，我们本来是不赞成的，但现在开一下也好，因为这比没有总强一些。将来开参政会就够了，要由老百姓自己选举代表，召开代表大会。至于组织中央军、八路军等等在前线打仗，这也是一种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虽然形式繁多，各色不一，但都是执行战略的任务。所以，我们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

我们要紧紧地把握住统一战线，有了这个法宝，一切困难都可以打破。这个“打神鞭”——统一战线，是我今天送给你们的第一法宝，希望同志们用它去打尽一切妖魔鬼怪。

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 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7月12日)

创造边区是你们第一个功劳，现在保卫边区也一样要你们来建立丰功。我们反磨擦的目的在于讲和，为了把统一战线搞得更好，巩固团结，反磨擦是达到讲和的最好办法。边区的县长、区长、乡长，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要提高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和办事能力。我们的口号是：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又要生产。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939年7月20日)

同志们！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高兴。……

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女大现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维持下去，要维持下去，就要经过更大的持久的奋斗。我们办女大，有些人不赞成，首先就是那些“顽固分子”。他们不赞成，他们设关卡，阻止各地学生到延安来学习，不愿妇女得到彻底解放。

其次，还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

我希望女大教职员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准备长期工作的决心，我们党应该有很多专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

(1939年7月25日)

罗、王、张、朱、彭、杨，并转何、周、聂、彭、舒，并转陈、邵^[1]：

抗大以致一切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之办理方针，应当如下：

(一) 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用适当的方式组织学生中的思想上的争论与辩论，实际上这样的学校中一定有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二)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太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

(三) 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

1. 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2. 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1] 指罗瑞卿、王智涛、张际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何长工、周纯全、聂荣臻、彭真、舒同、陈伯钧、邵式平。

3. 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
4. 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四) 因过去公开招生，特务人员混进不少，现在必须立即提高政治警惕性，三个分校立即进行全体干部的审查，洗刷有特务嫌疑的分子，学生党员应重新登记，弄清每个学生的政治面目是最重要的工作。抗大领导者应认识这不仅关系抗大，而且关系八路军，因为特务人员经过抗大打入八路军，希望你们严重注意，但此工作必须很好的领导，避免及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

(五) 请北局前总领导一分校，分局与军区领导二分校，作深入的讨论与检查，定出今后具体计划电告我们。彭真所提意见我们都同意，分校必须在当地最高党及军事机关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不宜所谓独立自由及各自为政，而党军机关亦必须对分校工作负完全责任，抗大本校在到达目的地进行深入的讨论彻底转变工作。

就学习六届六中全会文件 给林彪校长的信

(1939年7月29日)

此次毕业生必须发给《解放》五十七期，六中文件，并须加以讨论之后，才走为好。需要多少，速去□□处交涉领取，先取少数每队发二三本也好。三十号下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一号下午的军事会我准备到，二号可以来讲六中全会总结。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九日夜十时

为蒋灿题词^[1]

(1939年7月)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抗日战争中人人努力，个个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

为蒋灿先生书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为受国际联盟防疫团派遣到延安做防疫工作的蒋灿所写的题词。

萬物到此皆成
枯朽，只有中國人，始能大
膽：奮鬥打三十年，
第一回的勝利。
毛澤東題

毛泽东为蒋灿的题词。

四言诗·戏改江淹^[1]《别赋》

(1939年7月)

春草碧^[2]色，
春水绿波。
送君延安，^[3]
快如之何！^[4]

[1] 江淹（444—505），南朝梁代文学家，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历仕宋、齐、梁三代。梁代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少孤贫好学，早年即以文章著名，晚年才思衰退，所作诗文不如前期，人谓“江郎才尽”。诗歌多拟古之作。赋以《恨赋》《别赋》最为有名。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江文通集》。

[2] 碧，青绿色。

[3] 君，你。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送君延安，在延安送别奔赴抗日前线或赴全国各地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

[4] 快，快活，舒畅。之，这里是语助词，无实义。如之何，即如何，怎么样。快如之何，快活得怎么样。犹言快活极了！

挽郭沫若父郭朝沛先生联^[1]

(1939年7月)

先生^[2]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3]，克享遐龄^[4]，明德^[5]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6]，戎幕奋飞^[7]，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8]。

[1] 1939年7月3日，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在四川乐山老家病逝，享年86岁。郭沫若当时在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他闻讯后，偕夫人于立群星夜奔回原籍治丧。由于郭朝沛在当地声望很高，加之郭沫若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因而治丧期间收到挽联近300副。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以“世侄”的名义联名送了这副挽联。郭朝沛（1853—1939），字膏如，四川乐山人。早年失学，自十三四岁开始从事酿酒、兑换银钱、粜纳五谷等生意，终生为家业奔走于四方，饥渴无常，寒暑不避。在儿辈的教育问题上煞费苦心，为人乐善好施，除行医治病外，乡中公益事如兴学校，设义渡，造桥梁，辟道路等都率首倡成，在当地声望很高。

[2] 先生，对年长有德业者的敬称。

[3] 衡门，横木为门，指简陋的房屋。潜隐，潜藏隐状。

[4] 克，能够。享，享有。遐龄，高龄，长寿。

[5] 明德，完美的德性。

[6] 宗匠，大师，指学问技艺为众所推崇的人。这里指郭沫若。

[7] 戎幕，军府。奋飞，鸟类振翼飞翔，这里是高举远引的意思。

[8] 勒，雕刻。勒石，刻文于石。来兹，来年。

为中国女子大学成立题词^[1]

(1939年7月)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

[1] 1937年1月，党中央进入延安城以后，就创立了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旧址，位于延安市王家坪市委党校后的山坡上。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王明担任校长，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并讲话。毛泽东为其题词：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

必须制裁反动派^[1]

(1939年8月1日)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2]。同志们！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抗日战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杀他们，第二是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他们。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些反动派，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说。

[2] 1939年6月12日，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这个惨杀事件，激起了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正义人士的公愤。毛泽东在这篇演说中所抨击的反动派，就是指的这次惨杀事件的指使者蒋介石和他的党徒。

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在全国抗日，全国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结。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

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有谁出来过问呢？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没有呢？没有。这件事应该由谁出来过问呢？应该由中国的法律出来过问，由法官出来过问。如果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过问了。但是，平江惨案快两个月了，法律和法官并没有出来过问。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不统一^[1]。

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应该赏什么人呢？应该赏抗日的人，赏团结的人，赏进步的人。应该罚什么人呢？应该罚破坏抗日、团结、进步的汉奸和反动派。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应

[1] 毛泽东在这里所解释的“统一”，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统一”的名义，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而提出的。自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日起，国民党在政治上用以打击共产党的主要武器就是“统一”这个口号，他们诬蔑共产党标新立异，妨碍统一，不利抗日。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后，这种反动叫嚣就更加猖狂了。毛泽东在这里把“统一”这个口号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夺取过来，变为革命的口号，用以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族的分裂行动。

该统一的没有统一。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现在涂正坤、罗梓铭等抗日同志不但没有受赏，反被惨杀了；而那些坏蛋，他们反对抗战，准备投降，实行杀人，却没有受处罚。这就是不统一。我们要反对这些坏蛋，反对这些投降分子，捉拿这些杀人凶手。第二个，统一于团结。赞成团结的应该受赏，破坏团结的应该受罚。但是现在赞成团结的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他们倒受了处罚，被人惨杀了；而那些破坏团结的坏人却没有受到一点处罚。这就是不统一。第三个，统一于进步。要全国进步，要落后的人向进步的人看齐，决不能拉进步的人向落后的人看齐。平江惨案的那些刽子手，他们把进步分子杀了。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

同志们还要懂得，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1]，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

[1] 参见《反对投降活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英美等帝国主义也不断劝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议和”。1938年11月，英国首相张伯伦表示愿意实行英日经济合作，共同参加所谓“远东建设”。1939年，英美帝国主义企图牺牲中国以便同日本侵略者妥协的阴谋活动更加露骨。这一年的4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往返于蒋介石和日本之间，企图拉拢中日“议和”。6月，美国示意国民党政府外交官员，要中国出面提议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日问题。7月，英日达成协议，英国完全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实际局势”。

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全场鼓掌）“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延安的人民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全场鼓掌）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1]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逐渐加紧反共活动。1939年春，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后又秘密颁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在这些反动的文件里，规定采用法西斯统治的方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实行“联保连坐法”，在保甲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民的活动；在华中、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



1939年，毛泽东在全军“八一”体育运动会上讲话。

挽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联^[1]

(1939年8月1日)

日寇凭陵^[2]，国难方殷^[3]，枪口应当向外；
吾人主战，民气^[4]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1]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平江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于8月1日在延安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并送了这副挽联。其他领导人也送了挽联。平江惨案，1939年6月12日，驻湖南平江的杨森奉蒋介石密令，勾结地方反动势力，派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包围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假借“商谈抗日紧急事宜”，将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引出办事处。涂正坤刚出大门，即遭枪杀。随后，敌人冲入留守处，逮捕了抗日干部20余人，并且当即杀害了特委秘书吴渊、罗梓铭等5人。

[2] 凭陵，同冯陵，侵扰之意。

[3] 方，正在。殷，深重。

[4] 民，人民。气，气势。

代中共中央撰挽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联

(1939年8月)

顽固分子，罪不容诛，挟成见，作内奸，专以残害爱国英雄为能事；

共产党员，应该警惕，既坚决，又灵活，乃是对付民族败类之方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8月2日)

对此次参政会采取积极方针是对的，因为现在是处在和战问题的重要关头。对上次参政会采取消极态度也是必要的。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目的，在于暴露坏分子的阴谋，暴露汪精卫派等的阴谋。要注意反对暗藏的汪精卫派及准备投降的某些银行家及军人派，使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基础转到中产阶级方面来继续抗战，现在有分化大资本家的可能。对党派问题及团结问题，我认为在国民参政会上要提出来，不提出反易于处于防御地位。保障民权、保证团结、保证在敌后的发展、保障财政问题、反对投降分子等提案都是必要的。会议还讨论对英外交政策问题，决定反对英日共同声明^[2]，反对张伯伦的妥协政策。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2] 指《有田—克莱琪协定》。

致八路军总部和一二〇师电^[1]

(1939年8月7日)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动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之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除三五九旅即由恒山地区开回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地区，加强绥德警备区外，第一二〇师在冀中之部队移至第三五九旅现在位置，并视情况再移至晋西北地区，以利指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我军调动部署致八路军总部和一二〇师电的主要内容。

在陕甘宁边区学联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8月13日)

我们很高兴，因为同志们非常热烈地在这里开会，同志们开会的目的没有问你们，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在我们中国开会有两种：一种就是防止中国独立自由的会，是汉奸他们开的，顽固分子开的；另一种是要求中国独立自由的会，共产党的会也好，抗日分子开的也好，都是要求中国的自由独立……没有民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最后胜利是不能够的。亡国好还是不亡国好，我们说不要亡国好，但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一定要亡国。民主是什么东西呢？民主就是走路的自由权，有了这一条就够了，有了这一条我们可以随便走到什么地方，可以去反对法西斯，反对汉奸托派，所以这两个字一定要。

孙中山有一个主义，叫民权主义，现在有些人不记得了，他偏偏说是孙中山忠实的信徒，信徒还不够，还是忠实的信徒。

致朱德等电^[1]

(1939年8月21日)

朱、彭、杨：

第三五九旅以调两个充实团到陕北为宜，其余可后调。第一二〇师师部暂在平西，准备将来必要时转移到晋西北。

毛 王

二十一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为谢子长^[1]烈士题词及碑文

(1939年8月23日)

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之墓。

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运动讲习班，组农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红二十六军之前身。一九三三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诸同志建造了陕甘宁边区。一九三四年于河口之役负伤，一九三五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墓之时书以叙之。

毛泽东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1] 谢子长（1897—1935），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人。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重与世长辞，时年38岁。

謝子長烈士

民族革命軍
左

毛泽东为谢子长烈士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8月24日)

一、南方工作，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这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南方工作的弱点是：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一战线中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二是实践上实行它，八路军、新四军、边区和党的工作，都是执行三民主义这一共同纲领。要公开号召、宣传解释三民主义，否则不能扶持左派与争取群众。一切策略的出发点不要脱离国民党的大多数。三民主义本身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叶青^[2]的三民主义和平转变论是错误的。是否要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我认为是必要的。在国民党退步、妨碍统一战线开展时的危险，是怕反磨擦破坏统一战线，不知道反磨擦的必要，忘记了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和博古（秦邦宪）的报告时讲话的一部分。

[2] 叶青，原名任卓宣，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叛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区别性；在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1939年8月26日)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1]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1] 林伯渠，当时是中国共产党驻西安的代表。毛泽东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给在莫斯科学习的孩子们，可惜这批书在邮途中丢失了。

岸英岸青二兄：

你们上大学快一年了，情况怎样？
你们立身如何？有缺点无？
学习如何，也别太累，但要学，还要
注意身体，不要太累，时间宝贵
时间不可浪费。

为你们父亲和小弟，毛林伯渠向
志同了一封信，寄给你们，不知收到没有？
来信告诉我。你们
要继续向上，愉快！毛岸英
毛岸青，八月廿四日

毛泽东致毛岸英、毛岸青信的手稿。

欢迎尼赫鲁先生来延安^[1]

(1939年8月27日)

重庆新华日报转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先生：

闻先生到重庆，中印两大民族从此更加亲密团结，为争取两大民族之自由解放而斗争。鄙人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先生致欢迎与慰问之忱，并欢迎先生来延安一行，以便亲聆伟论。贵会所派援华抗日之医疗队，现在八路军服务，全军振奋，并致谢忱。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七日

[1] 1939年8月尼赫鲁访华。这是毛泽东邀请尼赫鲁去延安访问的电报。

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 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

(1939年8月29日)

目前全中华民族的任务是，第一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第二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第三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抗战教育在抗战中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抗战教育，一是办学校，办小学、中学、大学；二是社会教育，设立夜校，推行识字运动等。教员应当在工作中学习，应当向学生学习，向老百姓学习。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2]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2] 陶行知，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

关于国际新形势 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1939年9月1日)

记者问：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1]，其意义如何？

毛泽东答：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问：人们还不明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反而以为英法苏谈判的破裂是苏德协定的结果。请你说明一下英法苏谈判为什么没有成功。

答：英法苏三国谈判所以没有成功，完全由于英法政府没有诚意。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

[1]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于1939年8月23日。

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因此，英法根本拒绝苏联历来提出的组织真正的反侵略阵线的建议，而采取“不干涉”的立场，纵容德意日侵略，自己站在一边看。其目的在于使战争的双方互相消耗，然后自己出台干涉。在执行这个反动政策的过程中，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1]。这一次又想牺牲苏联。这种阴谋，在这次英法苏三国的谈判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个谈判，从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英法则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它们却不肯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这就是谈判破裂的原因。在这个期间，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愿意放弃所谓《防共协定》^[2]，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就订立了。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

[1] 1935年10月，意大利开始武装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于1936年5月将埃塞俄比亚占领。1936年7月，德国和意大利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支持佛朗哥法西斯势力反叛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人民阵线政府领导西班牙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抗战，于1939年3月失败。1938年3月德国出兵占领奥地利，同年10月又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于1939年3月完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德意法西斯这些疯狂的侵略行动，都是在当时英法政府“不干涉”政策的纵容和鼓励之下进行并且获得成功的。

[2] 1936年11月，德日订立《反共产国际协定》和《反共产国际协定附属议定书》，同时还制定了一个直接反对苏联的秘密附件。1937年11月，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个协定。

伯伦上台开始，到去年九月慕尼黑协定发展到了顶点，到此次英法苏谈判就最后破产。往后的时间，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我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问：据你看，目前的时局将要如何发展？

答：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的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迫在眉睫了。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在目前，就是为了争夺波兰，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这样的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而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第二国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正在发生分化，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正在蹈袭第一次大战时的覆辙，准备赞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另一部分，则将和共产党一道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目前张伯伦、达拉第正在模仿德意，一步一步地反动化，正在利用战争动员将国家组织法西斯化，将经济组

织战争化。总之，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大屠杀的危险临到千百万人民的头上。这种情形，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运动。无论在德意，无论在英法，无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如果不愿充当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就一定会起来用各种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上述两大集团之外，还有第三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

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德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它的外交政策，正在两派斗争中。军阀想和德意建立联盟，达到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斥英美法出东方的目的；但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主张对英美法让步，把目标集中于掠夺中国。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1]的政治进

[1] “以华制华”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阴谋毒计。向来，日本帝国主义总是在中国培植可以供它利用的力量，以便分裂中国内部而达到它的侵略目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它不仅利用国民党中汪精卫派公开的亲日分子，而且利用蒋介石派的力量来牵制抗战最坚决的中国共产党。从1939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军队停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着重从政治上鼓励他进行反共活动，正是这种“以华制华”政策的实施。

攻和“以战养战”^[1]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2]；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不会变更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苏德协定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的可能，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日的可能。

这些就是我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将如何？

答：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

但是，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所以，从武汉失守后开始的敌人在沦陷区（主要是在华北）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今后不但还

[1]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占领区内实行残暴的经济掠夺，用以供给它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军阀把这种政策叫作“以战养战”。

[2]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集中主要兵力进犯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所到之处，极其野蛮地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政策。敌人把这种疯狂的军事进犯叫作“扫荡”。

会继续，而且还会加紧起来。更因敌人目前的主要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至于我国国力和敌人对比，还是相差很远，要准备实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国持抗战的任务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千万不要丝毫大意。

因此，毫无疑义，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

这就是：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

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他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来的，都应该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磨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

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

果能如此，中国就能好好地准备反攻的力量。

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

在现时，一方面，应当严正地支持正面的防御，有力地援助敌

后的战争；另一方面，应当实行政治、军事等各种改革，聚积巨大的力量，以便等候时机一到，就倾注全力，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

为延安新华书店题名^[1]

(1939年9月1日)

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

毛泽东为新华书店题写的店名。

[1] 1939年9月1日，新华书店门市部在延安凤凰山麓的平房里正式开业。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宣部、边区政府的领导和部队以及各界代表前往祝贺。毛泽东得知新华书店在新的地点开业的消息后，挥毫题写了新华书店4个大字，并派秘书送到新华书店。

给向隅的信^[1]

(1939年9月5日)

取名延生如何？如以为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复，是以为歉！此复向、唐二同志并庆祝你们的小孩。

毛泽东
九月五日

[1] 1939年7月1日，音乐家向隅、唐荣枚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想请毛泽东给孩子取个名字，但考虑到毛泽东那么忙，难以启齿。8月18日，孩子的舅舅柯蓝，当时是鲁迅文学院的学生，知道这件事后，自告奋勇，从练习本上撕下一页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小孩——一个男孩——是七月一日生下来的，因为他刚巧在伟大的日子里进入了这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希望得到你的光荣给他取一个名字……”18天后，他们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国式的信封上竖写着“鲁艺文学艺术研究院向隅同志收”。打开一看，毛泽东在他们的去信上作了批示。

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1]

(1939年9月7日)

从德国法西斯开始对波兰的军事行动后，就使欧洲已陷入严重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火焰中，而昨日电讯所传，英法已开始进攻德国，英空军前日飞赴威廉港轰炸德舰队，法军开始向德边移动，并突破德防线某处，而其他各国，或者是准备加入战争，或者是暂时宣布中立，这些事实，就说明实际上早已开始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范围，现在是更加扩大了。因为欧洲主要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如德英法等已卷入战争的漩涡，而其他帝国主义如意大利等亦正重整旗鼓，枕戈待发，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却竟不动摇的稳如泰山，仍坚持其一贯的和平政策。这些事实，就说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正以突飞的速度为战争的全面性所代替着。

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底扩大，是由于帝国主义集团间的矛盾到不得不采用扩大战争办法来解决，是由于法西斯的德国，不顾一切地贯彻其侵略战争，是由于英法等国采取不干涉的妥协政策，拒绝与苏联订立互助公约。而波兰虽然为首先发难的德国所侵略，虽然现在波兰人民参加抵抗法西斯的侵略，然而波兰在决定自己民族命运紧急关头，无自主的原则立场，拒绝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一任英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毛泽东撰写此文的时间不详，这里采用的是《新华日报》发表此社论的时间，即1939年9月7日。

法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摆布，这就使波兰等国，成为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间争夺的目标，这就使战争的性质，虽然在波兰人民方面充满民族的义愤，虽然在英法人民方面，充满反法西斯的正义愤怒，然而从“任何战争，只是一定阶级‘用另种方法’来继续其政策”这一观点来看，从战争双方所代表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利益这一观点来看，这次战争的性质，在基本上是帝国主义的战争。

中国人民与日本法西斯军阀进行抗战，已经两年多了。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民族解放而战，另一方面也是为世界和平正义而战，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很容易了解的，我们同情任何国家里的劳动人民反对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的革命运动，可是我们反对任何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牺牲劳动人民利益来重新瓜分世界的掠夺战争。同时，我们正在进行抗战，我们的外交路线，也是很容易了解的，“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敌者敌之，这是确实不移的原则”。我们过去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可是，中国人民必须了解，中国的抗战，不能无视于世界事变，尤其是不能无视于正在进行的欧洲战争。在新的帝国主义大战中，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可能的两个方面：

第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防共协定”破产了，在远东方面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使日本帝国主义更陷于孤立。德波战争爆发，英法卷入战争漩涡，过去日本从这些国家所得到的帮助基本是不可能继续了，这也打击了日本。这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灭华的政策，是一贯不变的，根据历来屡试不爽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惯于利用欧洲紧张形势，尤其是欧洲战争形势，来灭亡中国，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

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提出了二十一条的亡国条件。九一八以来，每次欧洲多事之秋，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每次进攻中国的步骤。现在欧洲大战既起，敌酋阿部已声明：日本当集中全力，解决“中国事件”，这就是说要利用欧战形势，集中全力，进攻中国。这就造成日本法西斯军阀不顾一切的更加紧对我国进攻的危险。而在远东有利益的英国，因参加欧洲战争而无暇东顾，可能与日本帝国主义在牺牲中国人民利益上与日本作某种的让步妥协，以保全在中国及其南洋一带的利益，这就造成东方慕尼黑可能的严重危机。

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么，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因此，中国人民要密切注视欧战的情形，注视欧战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同时，中国人民在坚定自己的正确的立场上，来分析目前抗战的形势，显然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政治状况，是不能顺利应付新的环境的，这就是妥协投降的危险依然存在，而反共正是这种妥协投降的具体准备底说明。而政治上的不进步和开倒车，又正是障碍民族团结，障碍新的有战斗能力的军队的继续产生，障碍人民新的有生力量的增长。所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全国人民应该在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化，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之下，动员一切力量，为准备反攻而奋斗”。

